

2026  
年第  
2期

新闻界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 新闻界



2026

第 **2** 期

总第 395 期

ISSN 1007-2438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

中文核心期刊

CSSCI 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科综合评价 (AMI) 核心期刊

四川省品牌期刊





公益广告



川观新闻  
—看四川，观天下—

新闻界

宣





欢迎订阅

# 《新闻界》杂志

思想影响传播 媒介推动文明

240元/年（12期）

## 《新闻界》近年荣誉

- 中文核心期刊
-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 中国人文社科综合评价(AMI)核心期刊
- 2025年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 2023年中国新闻奖三等奖
- 2021年中国新闻奖二等奖
- 四川省品牌期刊
- 多次荣获四川新闻奖一等奖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7-2438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51-1046/G2

编辑部电话: (028)86968603 (028)86968876

发行部电话: (028)86969774

刊期: 月刊(每月10日出版)

投稿渠道: [www.ixinwenjie.com](http://www.ixinwenjie.com)

电子邮箱: [xinwenjie66@163.com](mailto:xinwenjie66@163.com)

# 目次

## 前沿视点 · 在人工智能时代重新理解平台

P<sub>4</sub> / 从数据亲密到数字社会联结：个体化时代平台亲密关系的困境与传播重构  
文 | 张杰 杜京蔓

P<sub>15</sub> / 超平台化与韧性建设：生成式人工智能内容风险治理的新语境与新路径  
文 | 殷琦 陶文冲

## 新闻学研究

P<sub>27</sub> / 媒体的政治性结构及其制度变迁  
——数智时代比较媒介体制研究的范式重构  
文 | 苏颖

## 传播学研究

P<sub>39</sub> / 从书写到编程：论弗卢塞尔的人工智能媒介思想  
文 | 周海宁

编委会主任

编委会副主任

总编辑

副总编辑

执行副主编

编辑

编委

谭江琦

徐文礼

段吉平

舒 炜

孙尚如

李韵奕 徐秋染

王炎龙 /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张志安 /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刘海龙 /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常 江 /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特聘教授

曹 晋 /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冯建三 / 台湾政治大学传播政治经济学教授

常江：前沿视点 蒋晓丽：博士生新论

尹 鸿 李良荣 陈力丹 杜骏飞 郑保卫 童 兵 喻国明 蒋晓丽

全媒体技术与传播认知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李天铎 / 昆山科技大学文化创意产业讲座教授

李金铨 / 香港城市大学传播学教授

Christian Huchs / 希腊雅典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

Graham Murdock / 英国拉夫堡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Jlises Mejias / 纽约州立大学奥斯威戈分校传播政治经济学副教授

栏目主持

学术顾问

前沿视点栏目支持



## 传播与社会

P<sub>50</sub> / 亲密连接的“数字孤岛”：县城家庭手机短视频集体驯化的协商与冲突  
——以甘肃省 Z 县县城中小学生家庭为例  
文 | 洪杰文 张丽萍

P<sub>63</sub> / 时空连接与代际互通：露天电影城市公共空间“再放映”的价值意涵与文化记忆联结机理  
文 | 马梅 李娅

## 新闻传播史

P<sub>74</sub> / 战斗性实践与党报理论的地方生成：对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报刊的考察  
文 | 曹培鑫 宋启明

## 博士生新论

P<sub>86</sub> / 从“人类的延伸”到“分布式身体”：可穿戴技术的媒介史考察  
文 | 任依珣

编辑出版

地址

电话

投稿渠道

电子邮箱

邮编

刊名题写

封面图片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发地

订阅

邮发代码

发行部电话

《新闻界》编辑部

四川省成都市红星路二段 70 号

(028) 86968603 (028) 86968876

Http:// www.ixinwenjie.com

xinwenjie66@163.com

610012

甘惜分

C 视觉影像数据库 | 刘学懿

CN 51-1046/G2

ISSN 1007-2438

国内外公开发行

全国各地邮局(所)

62-334

(028) 86969774

印刷

出版日期

定价

成都鑫达彩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2026 年 2 月 10 日

20 元/期

### 版权声明

凡本刊所刊登稿件,即视为作者授权本刊拥有网络传播、图书出版等再使用权,本刊有权决定是否以某种纸质出版或互联网出版形式进行二次出版。作者对此有异议者,须在来稿时特别注明;未经本刊允许,其他刊物或网络不得转载本刊作品;获本刊允许转载者,须注明转自《新闻界》。





# 从数据亲密到数字社会联结：个体化时代平台亲密关系的困境与传播重构<sup>1)</sup>

张杰 杜京蔓

**摘要** 个体化进程使得个体在获得选择自由的同时，也从社会机制所提供的安全感与确定性中脱嵌。这催生了人们既渴望亲密联结又拒绝承诺，既追求绝对掌控又逃避责任的内在矛盾。在此社会背景下，平台对社会生活的深度嵌入进一步加速了亲密关系的选择性、自我掌控性和流动性，催生出数据导向的商品化、同质化的数据亲密关系。平台表面上赋予个体对亲密关系绝对掌控的选择自由，将亲密关系包装成“无痛苦”“以我为主”，实则进一步削弱了人们包容他者和承担责任的意愿及能力，使得亲密关系的起点，即与他人的社会联结进一步消解，从而加剧了现代亲密关系与社会联结之间的脱离。面对这种困境，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作为一种不同于平台数据亲密逻辑的“情感练习场”，虽不能完全替代传统亲密关系中的深层情感和共同成长，但为人们重建社会联结提供情感和交流实践的可能性，从而为在数字时代建构更具韧性、责任与意义的社会联结进行前置训练。继而数字社会联结也就成为个体化社会构建的传播基础。

**关键词** 数据亲密关系；平台；生成式人工智能；个体化；数字社会联结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张杰，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广东广州 510000；杜京蔓，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广州 510000

## 引言

亲密关系，是在人与人的切近关系之中发现和建构的<sup>[1]</sup>。它意味着两个独立个体在保留自身差异性的前提下，自愿投入时间与情感，通过持续的对话、妥协与共同行动，培育出一种相互依赖、彼此承诺且共同成长的社会联结。这种联结不仅能为个体提供归属感与安全感，更是个体超越孤立自我，实现社会性存在并丰富个体生命意义与体验的重要途径<sup>[2]</sup>。这样，亲密关系便能进一步超越自我中心主义而构建出更复杂的人际关系<sup>[3]</sup>。在这个意义上，亲密关系是人成为社会性动物的前提，也是人类社会生成的基础。

在中国传统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被视为一种广义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以血缘为基础，以宗族制度、伦理规范为纽带。无论是家庭内

1) 基金项目：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数字城市沟通力：中国城市群发展现状考察”（22JJD86000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媒介化加速视域下社交媒体新个体文化的建构与引导研究”（24YJA860024）。



部的长幼尊卑，还是宗族组织的庇护，以及同乡、同窗、同事的关系共同体，均表现出强烈的等级性、约束性和稳定性<sup>[4]</sup>。因此个体的亲密关系深度嵌入社会机制，受到伦理规范的制约。

在“个体化”这一晚期现代社会元进程的推动下，现代个体从传统的社会机制与结构中“脱嵌”而出。这一进程在赋予个体自由的同时，也使得亲密关系不再依赖于先赋性的、稳定的共同体纽带，而是依赖个体与陌生人之间的自主联结。亲密关系的基础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以情感沟通和亲密性为核心的“浪漫爱”，成为现代人包括当下中国人追求的核心诉求。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将亲密关系的建立视为个体实现自由的重要途径，即个体逐步从宗教、传统伦理及以往视婚姻为经济保障的框架中解放出来。然而，吉登斯也指出，这种解放伴随着一种根本性的“本体的不安全感”，关系不再由外部制度保障，而完全依赖于持续的情感互动与维系<sup>[5]</sup>。同样，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和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Elisabeth Beck-Gernsheim）也指出，个体化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爱情、家庭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利害冲突<sup>[6]</sup>。个体化进程使得人们能够进行自由选择，为自己而活，但与此同时也只能依靠自己来承担责任和风险。因此，个体化进程中的人们一边渴望确定性的亲密关系来避免孤独，一边日益以个体为中心定位亲密关系，试图全面掌控亲密关系，降低对个体影响的可能。在鲍曼（Zygmunt Bauman）看来这是更宏大的结构性变迁在亲密关系中的折射与体现。他认为，从早期现代到晚期现代的最大变化就是不确定性与自由并存。人们虽然渴望传统的浪漫关系所带来的确定性和安全性，但是这种关系的建立和维持所要求的承诺及持续投入，在灵活性和短期心态已经成为主导型选择的晚期现代文化中已经完全不合时宜，人们的合理选择就是通过即刻满足来获得暂时的安全感<sup>[7]</sup>。三位社会理论大家关于亲密关系重塑的叙述着重突出了“个体化”这一社会元进程。也就是说，个体化进程重塑了亲密关系的逻辑，

使其从一种受制度和社会规范保障的稳定结构，转向一种基于情感协商、强调自我实现但又充满内在焦虑与不确定性的流动实践。

同样，个体化进程也使得我国的亲密关系从依赖重要他人中脱嵌出来，转而依赖个体的自主选择。但中国的个体化主要被市场化和消费主义所推动，因而被阎云翔视为是与西方不同的个体化<sup>[8]</sup>。在中国的个体化进程中形成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主义：强烈追求个人情感体验与生活风格选择的同时，常常有意或无意地无视对伴侣、家庭乃至更广泛社会关系的义务担当与伦理承诺<sup>[9]</sup>。

数字技术，特别是以社交媒体平台为代表的数字媒介，在个体化进程这一社会背景下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介入亲密关系的领域。与亲密关系相关的特征与平台的技术架构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家族亲和性”：亲密关系和社交媒体平台都允许人们表达和分享对他们重要的事物，都鼓励个性化的联系和互动<sup>[10]</sup>。人们日益通过平台寻找伴侣<sup>[11]</sup>，寻找友谊“搭子”<sup>[12]</sup>，与偶像建立情感联结<sup>[13]</sup>，甚至通过平台购买亲密关系<sup>[14]</sup>。

平台不仅改变了我们建立亲密关系的方式，还改变了人们对于亲密关系的观念，形塑了数字亲密关系。而随着以 ChatGPT（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AI）的出现，人类的关系演化进入人机共生的关系 5.0 时代<sup>[15]</sup>。大语言模型凭借其海量的知识储备，能够适应多样化的应用场景，为用户提供知识支持与情感陪伴，甚至展现出替代部分人类工作的潜力。随着 GenAI 承担起越来越多的工作任务，它与人类之间的联系也日益紧密，逐渐延伸出“人机亲密关系”<sup>[16]</sup>。

可见，数字亲密 (digital intimacy) 是晚期现代中重要的技术驱动的社会趋势，即社交媒体平台在建构亲密关系的过程中正在发挥越来越深的作用<sup>[1]</sup>。那么，个体化进程中从传统社会联结机制脱嵌出来的亲密关系，在经由数字平台深度中介之后究竟呈现出一种怎样的形态？对



于这一问题,现有研究或偏重社会变迁的结构叙事,或聚焦于平台技术的具体效应,往往陷入单一视角的局限,难以捕捉人、技术与社会语境多维互构的动态图景。

因此,本文旨在建构一个整合性的分析框架,将平台的架构性力量与中国的个体化社会语境置于对话之中,试图通过三个维度的解剖,揭示个体化时代平台亲密关系的矛盾性与传播重构路径。首先,平台的技术逻辑与商业模式如何具体呼应和改变个体化进程中的亲密关系形态;其次,分析经由平台中介的亲密关系的前景和命运如何,其究竟是为个体化进程中的亲密关系困境提供解决方案,还是进一步加剧这一困境;最后,探寻 GenAI 能否有助于突围亲密关系的困境<sup>①</sup>。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本文不仅希望推进新闻传播学与社会学在数字亲密关系议题上的跨学科对话,更试图以亲密关系为棱镜,透视中国社会个体化进程中的矛盾与张力,为思考如何在数字时代建构更具韧性、责任和意义的社会联结,提供批判性的思路与可能的调适路径。

## 一、自我掌控的数据亲密:平台对个体化情感需求的回应与塑造

### (一) 选择-匹配模式的数据亲密

关于亲密关系的转变,最有影响力的视角来自于“反思现代性”的理论家,包括前述的安东尼·吉登斯、贝克、鲍曼等。贝克和贝克-格恩斯海姆认为在后现代性中,现代亲密关系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脱嵌”过程,它逐步摆脱了由亲属、社会义务与传统责任构成的外在束缚,演变为一个高度自治的私人领域<sup>[17]</sup>。这一转型和变革也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大规模出现。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与价值观的进一步转型,中国社会与家庭的“个体化”转型始终是未来发展的基本趋向<sup>[9]</sup>,尤其是年轻一代的人际关系价值观转型日益明显。“虚拟恋人”“电

子爸妈”等现象的出现说明,社会正在从单一的传统关系范式,转向更加多元、流动、高度选择性的关系生态。

个体化进程使得人们在亲密关系中愈发追求自主和自决,更多强调的是个体的选择性与适配性。而平台本身多节点、多媒介的复杂性,与追求灵活适配的个体文化之间具有选择性亲和。平台将无数个体汇聚于同一可访问的界面,使得个体得以超越其现实社交圈的限制,在一个理论上无限广阔的范围内行使筛选权,从根本上扩展了其自由选择的广度与可能性。这不仅实现了从“有限选择”到“海量选项”的转换,更催生出一种“选择过剩”的关系市场。例如,有研究指出由于平台的设计侧重于广泛的选择和高度定制的筛选,用户被鼓励无止境地追求“更完美”的配偶<sup>[18]</sup>。

在提供海量选项的基础上,平台还利用算法为人们提供了一套精细化的“筛选与控制”工具。人们可通过预设信息(如年龄、兴趣、价值观)与“滑动”机制进行高效初筛,算法则依据用户提供的标签与行为数据,将个体内在的、模糊的偏好外化为高效的匹配机制。这一过程使人们能够依据高度个性化的标准,主动建构并执行其选择策略,从而深化选择的自主性与精准性。近几年兴起的“搭子社交”正好与此契合。“搭子社交”的核心机制,是仿照算法在特定领域进行精准的兴趣匹配,以此满足人们高度细分的陪伴需求<sup>[19]</sup>。无论是追求长期伴侣、开放关系,还是寻找特定场景下的“搭子”,都可以通过平台实现。平台将亲密关系从一套由社会规范预先规定的法则和流程中“解放”出来,转变为可供参与者主动协商与自定义的开放式项目。

也就是说,个体化进程使得亲密关系从传统社会机制中“脱嵌”,使得个体本身较少地受社会规范和联结机制的束缚。而平台凭借其“连接一切”的媒介可供性、精准的算法及可

<sup>①</sup> 学界将亲密关系分为情感性亲密关系和身体性亲密关系或个人主义亲密关系和公共化亲密关系。本文讨论的亲密关系主要界定为情感性亲密关系和个人主义亲密关系。



及性极高的互动机制深层地介入并重塑了亲密关系本身的形态,即对“关系脚本”的选择,进一步加速了个体化进程引发的亲密关系的转变。平台赋予个体自由决定“如何在一起”的权利,极大地丰富了亲密关系的多元形态——人们不仅可以选“和谁在一起”,还可以选“以何方式在一起”,自由定义属于自己的亲密关系形态。基于共同兴趣、经历或感悟所建立的流动性互动,正日益成为线上人际交往的普遍形态<sup>[20]</sup>。

### (二) 失范的虚拟数据亲密关系

个体化将人们从传统纽带中脱嵌出来,使其进入“为自己而活、靠自己而活”的生存状态,一定程度上是孤单个体的生存状态,从而催生出个体对情感联结的迫切需求;而晚期现代的另一重要特征就是情感资本主义作为消费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系统性地将人类情感纳入商品生产与消费的体系。这两股力量是当代人情感生活的宏观社会结构性因素。

在这一社会背景下,数字平台将个体化的情感需求与情感资本主义的商品化逻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催生出一个蓬勃发展的领域:以恋爱为中心的虚拟亲密关系<sup>[21]</sup>。例如,情感劳动者在社交媒体上扮演着伴侣角色,通过标准化的文字或语音陪聊服务,与客户建立一种拟态的亲密关系<sup>[22]</sup>;直播平台通过亲密度、礼物和PK等技术配置,鼓励主播与观众之间建立一种高度商品化、性别化的亲密关系<sup>[23]</sup>。无论是“恋爱陪聊”,还是“虚拟恋爱”,抑或是主播将与用户间的情感关系转化为货币,都是数字平台对亲密关系进行商品化操作的结果。尽管亲密关系天然具有情感与交换的双重面向,但对其进行模拟、标价与交易,并全程发生在非具身性的数字空间中,则有赖于当今高度发达的数字技术与商品经济<sup>[24]</sup>。

虚拟亲密关系是以互联网平台为媒介,在虚拟时空中模仿真实亲密关系的互动过程所建立的亲密关系。这种亲密关系具有三个特征。一是双重虚拟性。既存在于网络虚拟空间,也因受市场原则支配而缺乏真实持久的情感基础,

情感本身也被虚拟化<sup>[25]</sup>。二是不稳定性。经济利益的介入破坏了信任基础,加之情感劳动者在交往过程中对金钱的过度关注及模板化的服务交易让消费者感到不真实,导致亲密关系极易崩溃。三是非排他性。在金钱驱动下,情感劳动者普遍提供“一对多”的服务,打破了传统亲密关系中对感情忠贞不二的追求<sup>[26]</sup>。

虽然这种亲密关系与传统的亲密关系不同,带有不稳定性、虚假性和相当程度的对传统规范的越轨,也就是失范,但这种亲密关系通过交易即可获得,且不用做出承诺。在个体化时代,青年在现实社会中“爱无能”的情感状况和回避、退缩的现实行为,导致在一定程度上为自己而活不可避免地陷入孤独。以恋爱为中心的平台虚拟亲密关系正是抓住了当下青年人对掌控亲密关系的渴望,在社交媒体平台与消费主义文化的推动下,为青年提供了一个“爱情速食方案”。情感本身已成为数字平台交易中的核心商品。在“虚拟恋人”等服务中,诸如相互陪伴、恋爱感觉等亲密体验被直接标价出售,其交换价值不再依附于任何实体产品或附加服务。平台经济通过将传统上需要长期投入、反复沟通与精心维护的亲密关系,通过数据与算法转化为标准化的、可即时交易的情感消费,从而改变了亲密关系的形态。

## 二、消解社会联结的数据亲密:平台亲密关系的困境

真正坚韧的亲密关系,其力量源于人们愿意彼此暴露脆弱、相互妥协、共同成长。正如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强调的正是“接受和肯定双方的差异性,激发双方的特异性”的持续过程<sup>[27]</sup>。换言之,亲密关系的建立意味着首先要和陌生的他者相遇,并在此后的关系实践中,持续面对、接纳和肯定他者的差异,并渴望与他者产生长期的关联与结合。

但陌生化的他者是一种被建构为外在于“我”的,和“我”有着差异的,会给“我”带来威胁的对象。直接与陌生化的他者相遇也就意味着不熟悉感和不确定性<sup>[28]</sup>,这是处于疏



离和孤独的个体化时代中的个体极力想规避的。因为个体化被迫的人生自决，强化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人们期望在亲密关系中能够消除不确定性，从而获得对关系的绝对掌控。同时，个体化进程中高度的流动性也使得建立深度情感联结所必需的信任、牺牲与长期投入变得举步维艰<sup>[29]</sup>。

数字平台在这一社会图景下介入了亲密关系，看似为现代亲密关系的矛盾提供了解决方案，实则进一步强化了“利我”个体主义。首先，平台改变了我们与陌生他者的相遇方式。在早期现代社会中，自我与他人的相遇是一种“面对面”的在场。他人通过其具身性的“面容”得以呈现，从而使真实的交流成为可能<sup>[30]</sup>。他人的异质性也是通过其表情的细微变化、声音的独特质感、身体的存在感等难以数据化的方式直接传递给自我的。这些感知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保证了我们始终意识到对方是一个超越我们认知框架的陌生存在。而平台将他人简化为可量化的数据，将活生生的个体抽象为兴趣标签、行为特征与社会属性的集合。更为关键的是，平台让我们通过算法而非通过“面孔”直接与陌生人相遇。为了提升匹配的成功率，平台倾向于向我们推荐那些在关键数据维度上（如职业、学历）与我们高度相似的人。这类以数据匹配为推手的“数字面容”，在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看来消弭了他者“面容”所固有的陌异性与神圣性<sup>[3]</sup>。平台的设计在表面上提高了初次互动的效率，却在无形中剥夺了我们遭遇真正“异己者”的机会。换言之，全联网和全交际并未使人们更容易遇见他者。相反，它恰恰使得人们很难真正与陌生他者相遇，甚至无视他们的存在，去寻找同者：高度相似性的人<sup>[31]</sup>。更为极端的是，在平台数据导向所催生的商品化亲密关系中，他者作为被消费的对象，其存在价值首先在于满足“我”的预期效用。而为了迎合消费需求，他人需要调节和剔除那些可能破坏消费体验的异质性成分（如负面情绪、思想分歧或独立的性格棱角），将自己压缩为一种旨在提供愉悦感或陪伴感的功能性存在。在这种数据导向的

商品化亲密关系中，他者不再以完整的主体形式存在。可以看出，平台看似提供了更多与他人相遇的机率，实则并未让我们真正与陌生化的他者相遇，其本质上更像单向的自我投射，而非两个独立主体间的相互敞开、交流、冲突、反思与逐步认同。

其次，亲密关系的建立与维系需要持续投入精力、时间和金钱，且充满不确定性与风险。但从商业逻辑上讲，平台并不乐见用户过快建立稳定、排他的长期关系——因为一旦如此，用户便会退出寻找心动匹配对象的数据游戏，从而停止贡献活跃度与注意力。因此，平台有意或无意地都在鼓励一种“永久连接、永久寻觅”状态的情感生活，让用户始终保持在一种“尚未找到”的寻觅兴奋中。这就导致了个体的“选择的悖论”现象：当个体面对平台上无穷尽的潜在伴侣时，他们很容易产生一种“优化思维”——既然有如此多的选择，那么必然存在一个理论上“最适合”自己的完美伴侣。平台发展出数据亲密关系的比较和替换模式：技术把诸多选择都摆在人们面前，并提供工具（如“计分卡”）用以测量各个潜在伴侣的优缺点。假如潜在伴侣可以按照一个特定的度量标准进行评估的话，他们就是可互换的，原则上是可加以提高的<sup>[32]</sup>。当“替换”比“修复”显得更为便捷高效时，关系的“可抛弃性”便无形中被合理化。而当个体习惯于通过不断替换来规避关系中的不完美时，深度情感联结所必需的时间投入与共同成长就被持续连接所取代。海量的潜在选项也将每个个体都化为可随时连接或断开的节点<sup>[33]</sup>，在这种个体连接而成的网络中，没有任何承诺、责任和长期性所带来的固态特性，因此可以随时开始和结束。这就进一步从根本上侵蚀了亲密关系得以维系的核心基石——对不完美的他者的包容与共同成长。

可以看出，个体化进程所催生的“陌生人”社会，本就需要个体不断持续地练习与陌生他者建立具有韧性、责任且有意义的联结。然而，平台非但没有助力这种社会联结能力的培育，反而倾向于推荐与人们在数据维度上高度相似



的个体,将“异己者”的他人转化为一个围绕“我”的偏好、经历与价值观的“同质者”。并且,平台通过不断供应“新”的同质者,将他者的价值简化为是否符合“我”的当下预期与需求,系统性地削弱了个体与陌生人进行有效、深度联结的意愿及能力。“利我”的当下判断取代了共同面向不确定的未来的责任与承诺。“他者”不再是有差异的、能唤起“自我”责任伦理的“他”,而是仅有性能差异、完全为满足“自我”需求而被设计和控制的“它”<sup>[34]</sup>。“我与你”的亲密关系也就被降格为“我与它”的工具性关系。当个体习惯将他人对象化并予以绝对掌控时,个体就不会再拥有面对、接纳陌生人的勇气,进而无法拥有超越自我中心、将他者纳入考量的伦理能力<sup>[35]</sup>。

不仅如此,平台在为人们提供满足需求的工具的同时,更通过精准的行为引导和情感设计,系统地制造和塑造着“自我”的欲望结构。那些看似自主的情感需求——对“完美匹配”的渴望,对“即时回应”的期待,对“量化证明”的依赖——在很大程度上是平台盈利逻辑的内在要求。在这一过程中,自我的欲望和情感都成为平台数据和算法的操纵产物。“自我”也被降格为被平台控制的“它”。个体不仅远离了他人,更是远离了“自我”。在参与平台亲密关系过程中,“我与他”的亲密关系事实上连马丁·布伯(Martin Buber)所说的“我与它”的关系都无法达到,而是被降格为“它与它”的物化关系<sup>①</sup>。

### 三、数字社会联结: GenAI 对亲密关系困境的应许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亲密关系的实践样态随着 AI 技术迭代升级而不断变化,尤其是智能聊天机器人的出现使得人类与智能体的情感交互迈向新阶段。借助日益强大的数据、算力以及算法,具备情感智能的机器已能生成个性化的情感互动,从而与人建立起陪伴、准

友谊乃至情感依恋等多种关系。GenAI 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超越前述的平台亲密关系困境的可能性。

(一)“我”的回归: 作为理想亲密关系实践的人机互动

机器主体往往被认为是准确无误、客观中立的,在它身上没有自我中心的立场。因其这一特质,“人机亲密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践行和实现吉登斯所提出的“纯粹关系”。这种“纯粹关系”是一种内在参照性的亲密关系,它摆脱了外在的规范标准、经济考量或权力结构,其维系与否仅仅取决于关系本身能否为双方带来足够的信任与满足感。这种关系以开放性、平等性、相互尊重与自我披露为核心特征,被视为现代性背景下对亲密关系的理想追求<sup>[5]</sup>。在与机器互动过程中,个体享有高度的自由,得以摆脱现实社会角色的束缚,在无需考虑他人的评价的情况下进行自主、自由的自我表达。这种自由建立在一种平等的基础之上——作为被设计的产物,GenAI 消除了基于知识、财富或地位的话语权不平等,以其无差别的、聚焦的回应机制,为人们构建了一种形式上的绝对平等。而且从技术角度来看,智能体本身被设置成无条件以主体需求为中心,为人们提供不包含任何功利成分的情感陪伴。人们在与 AI 的交往过程中,体验到的是一种祛除社会身份和地位差异的对话,情感表达变得更加直接和纯粹。由此,人机亲密关系以其自由、平等与尊重的特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理想的“纯粹关系”,超越了传统人际关系中难以避免的权力与利益纠葛<sup>[36]</sup>。

在与 GenAI 建立的“纯粹关系”中,人们不仅能够汲取到安全感和信任,更重要的是个体能够在与机器交往过程中更好地认识自我。吉登斯指出:“进入纯粹关系的主体是自由的,他完全知晓自己的需求,并能够与对方协商这些需求,为人们真实地呈现、感知和认同自我提供了

① 马丁·布伯在其关系哲学中深刻区分了“我—你”与“我—它”两种基本关系模式。在“我—你”关系中,我们彼此敞开、相互对话,在相遇中共同创造意义。这是一种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充满了生命力与创造性。而在“我—它”关系中,“我”将周围的一切——包括他人——都视为满足自身需求、可供利用的客体或工具。



新的情感方式。”<sup>[37]</sup>在与机器交往过程中，个体提供的海量个人文本——包括其观点、经历、情绪波动和叙事风格等——使AI能够构建一个高度精细化的、专属于该个体的“数字镜像”。这意味着虚拟情感主体不断推送个体喜欢的书籍、歌单、明星、旅游景点等内容，营造出彼此“知心、交心”的体验，实则是对个体价值观念与情感偏好的映射，呈现出的是“自我复制”的特征。随着个体向AI披露的细节越多，‘我-聊天机器人’对话最终会变成‘我-我’的对话<sup>[38]</sup>。与AI对话成了践行古希腊箴言“认识你自己”的新方式<sup>[39]</sup>，而这种自我对话也恰恰是吉登斯所强调的“自我认同”得以形成和维系的核心机制。在现有技术发展阶段，“人机亲密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人内传播。在此过程中，人与机器的交流构成一个自我循环：信息、情感与欲望经由机器中转，最终又回流至自身。这种循环深刻重塑着个体的自我认知，并进而影响其在现实社会中的交往<sup>[40]</sup>。

在与GenAI交往的过程中，人们得以暂时摆脱平台社会强加的双重角色困境——既不需要将他者降格为可量化的数据对象，也无需将自我异化为待交易的情感商品，通过数字先将“我”解放出来，暂时还原到“我与它”的关系。这种从客体间性向主体-客体关系的回归，虽然只是阶段性进展，却为现代人在数字迷宫中重返亲密关系提供了必要的过渡空间。

（二）异质性他者与情感练习场：人机协作中的社会联结重建

目前的人机对话只是重新确立了“我”作为认知主体的地位。现有的GenAI仍停留在社会知识和情感陪伴意义上的他者的阶段，即作为一个综合了海量人类知识、情感脚本与互动模式的集合体，而并非一个独特的“他者”。现有的GenAI更多的是被设计成满足用户需求的存在，注定会成为“温顺”的客体。换言之，它相对于用户而言的“他者性”并非是对等独立的，而是附属性和服务性的。但人工智能设计初衷是最大程度上像人类一样思考而非一味迎合人类。如果回到人工智能设计的起点，可以发现机器的

“拟人化”并非人工智能进化的唯一路径。人工智能之父阿兰·图灵（Alan Mathison Turing）从一开始就强调了人机差异。与人的“差异”是图灵在定义所谓人工智能本质时非常重视的品质。因此，允许“机器就像机器”其实更符合人工智能的设计初衷<sup>[41]</sup>。同时，也有研究指出，在与GenAI互动时，人们渴望被认可，却排斥过度奉承，用户希望它也能提出异议并表达独立见解<sup>[42]</sup>。GenAI之于我们也许不是更好或更差的“副本”，而是“他者”，与“我”不同的“他者”。

因此，未来如果能在GenAI设计中着重引入适度的异质性、不可预测性与挑战性元素。那么，在人机对话的过程中，人们或许能重新学习倾听、回应和接纳异质性他者的情感能力。在这个意义上，人-机之间的互动不仅仅是重新塑造自我，也是在体验、交流和建构与他者之间持久相处的情感体验和情感表达，从而为我们投身于真正的持久性的亲密关系做好前置训练，成为我们的情感训练场。

亲密关系事实上是将与异质他者的关系持久化，进而转换为以承诺、责任、利他和共享为核心的亲密关系。因而，人工智能与我们之间对理想亲密关系的训练过程本身也构成了我们与陌生异质他者之间相互容忍、接受的情感能力的训练场。正是通过与这一“新型他者”建立真实、深度且复杂的协作与共生关系，个体得以在数字空间中重新习得被平台消解的与陌生人建立社会联结的能力。这种人机协作与共生不仅是对亲密关系形态的补充，也是一种新型的数字社会联结，能催生出需要投入、理解与协作的共生关系。它为个体提供了从认知到实践的过渡性准备，帮助人们在进入充满不确定性的现实社会关系之前，先行培养起必要的对他者的包容、耐心等责任自觉和共情能力，进而为投身于现实中更具韧性、责任与有意义的社会联结做好准备。

#### 四、构建真实的数字社会联结：数字时代的传播志业

亲密关系长期被视为私人领域议题，但在个体化进程和平台深度嵌入社会生活的当下，数



字亲密关系的脆弱性和物化，实则折射出当下社会联结的普遍危机。晚期现代性使得团结意义的社会性正在缓慢消退，并使得个体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忽视、放弃或拒绝承担责任以及对他人的关系丧失了敏感性<sup>[43]</sup>。贝克认为，个体要经过“脱嵌—去传统—再嵌入”（脱嵌和去传统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的路径才能“成为”一个当代意义上的“个体”。换言之，“脱嵌—去传统”只是一个“作为”个体的过程<sup>[44]</sup>，而在贝克看来，个体在“成为”个体的观念过程中要认识到自我本身从根本上说是不完善的，要求个体保持高度的社会敏感性，将自我的责任和义务与他人相关联，告别占有式个人主义的零和游戏。社会联结的实现需要依靠制度把“个体化和（个体）对他人的义务结合起来，甚至在全球范围内结合起来”<sup>[7]</sup>。

而中国的个体化进程使得个体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自主选择 and 决策权，乃至试图尝试一种不同于传统的生活方式。但个体也正在经历失去既定传统生活方式的焦躁不安<sup>[45]</sup>。这一社会图景最终在亲密关系领域表现为一种典型的困境：一方面，个体前所未有地渴望在关系中获得确定性、安全感与掌控感，试图将亲密关系打造为对抗高度不确定性的稳定性来源；另一方面，个体又普遍缺乏包容他者差异性和给予承诺的意愿及能力。这种深切的渴望与真实情感能力之间的断裂，构成了当代亲密关系普遍脆弱与焦虑的根源。

数字平台在这一社会背景下深刻地介入并重塑了个体的行为模式与关系策略。平台所建构的亲密关系并非“我与他”的关系，甚至都未达到“我与它”的关系，而是一种“它与它”的关系。这进一步强化并合法化了“利我个人主义”倾向，从而系统性地消解了亲密关系的逻辑起点——个体面对陌生他者时所需的包容与责任感，也就进一步加剧了现代亲密关系与社会联结之间的脱离。在平台商业化的框架下，任何试图解决亲密关系矛盾的尝试都注定面临根本性的局限，因为其底层逻辑始终服务于资本的增值需求，而非个体的情感福祉。

平台将个体抽象为数据，通过其技术理性与商业逻辑将真实的人际互动物化为工具性的关系，从而使得数字亲密完全脱离和脱嵌了其起点：对陌生他者的接纳、容忍和进一步联结的意愿，成为数据亲密关系。GenAI 的兴起，或许为超越平台亲密关系困境提供一种可能，其关键并不在于成为人类的替代品或更优副本，而在于其作为一种异质“他者”的潜在角色。通过在其交互设计中审慎引入适度的异质性、不可预测性与建设性挑战，GenAI 有望从一个提供迎合性和确定性答案的工具，转变为一个能够激发对话、反思与伦理协商的“对话性他者”，从而可以构建一个低风险的“陌生人伦理—情感练习场”。在人机对话中人们能重新习得倾听、回应与接纳差异的能力。由此，不同于平台所建立的“数据社会联结”，GenAI 能在虚拟空间中模拟和构建出具有“真实的交流和协作意义的人与人的关系”，也即“数字社会联结”。这种“真实”并非指涉生物学意义上的实体，而是指其恢复了互动中的主体性、差异性与回应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扭转平台物化他人和个体化以自我为中心所带来的困境。

技术不是中立的，毋庸置疑，平台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进一步加速其数据亲密关系，然而，对于正处于实践中发展的技术而言，对其发展方向的省思和规范性要求需要放置在更具有深度和广度的社会变迁中才可能有更为完整的认识。这就意味着，我们对人工智能技术中介的数字亲密关系的认识必须回到个体化进程去考虑，才能充分认识其应然的发展方向和技术路径。

个体化进程既是普遍的、全球意义的元进程，也是充满了社会文化差异的、开放的。当我们讨论平台亲密关系，人机亲密关系时，固然要意识到媒介技术对于人际关系的作用，但同时也要意识到媒介化是深深嵌入个体化这一全球元进程和中国式个体化进程这一社会文化结构中的，社会联结能力的削弱和对亲密关系的渴望不仅仅是媒介化所引发的，而是个体化时代的特征和结果。理解个体化进程关键在于



要正视和承认技术引发的亲密关系的种种变化都是个体化所带来的脱嵌和随之而来的再嵌入的需求所致，平台主导的数据亲密关系就是试图回应和解决当代青年再嵌入的需求，但平台亲密关系的数据导向进一步削弱了社会联结能力的训练和观念。因而，这种需求寻求新的对数字关系的再嵌入资源和方式，而不是一味否认对数字关系的再嵌入。这种再嵌入不再是回归到家庭或共同体的温床，也不是对数据亲密关系这种商品化、同质化的数字关系的再嵌入，而是在高度流动和不确定的晚期现代社会中，学习与陌生人建立更具韧性、责任与意义的社会联结。这种韧性、责任与意义的社会联结首先是痛苦的相遇、难以理解和随之而来对自我的反思以及对他人完全意义的接纳、承认和尊重，进而超越激情，践行对关系中利他维度的承诺和责任。而意义感的生成，也正深深植根于这种持续的理解、承认与尊重之中。在这个过程中，未必要心心相印，但一定是对他者完整的承认和建立在利他基础上的共同生活的承诺，从而真正回到“我与你”的关系——彼此敞开、相互对话，在相遇中共同创造意义<sup>[34]</sup>。在这个意义上，真实的“我与他”关系的建构不仅仅是个体化进程中个体寻求本体性安全的路径，也是转向更普遍的“我与你”的关系建构的基本原则和操练。只有经过这种真实的社会关系的演练，彼此相异的陌生人才有可能真正联结和团结起来，个体的自由，或者说为自己而活也才有再嵌入的社会基础。

因而，基于 GenAI 的人机关系，恰恰需要回应个体化时代的普遍需求：重建社会联结，作为情感训练场，来改变和重构数据亲密关系所削弱的社会联结。因而从数字社会联结的角度可以对 GenAI 的算法设计和发展提出规范性要求，即作为具有适度异质性的交互对象，如何可能成为一种“新型他者”，帮助用户在低风险环境中训练对他者的倾听、回应、协商与共情能力，从而重构数字社会联结能力。

当我们从个体化进程中省思数字社会联结对于解决当下个体的普遍焦虑和意义感、安全

感的重要性之后，我们可以把数字社会联结视为数字时代的传播志业。在约翰·彼得斯（John Peters）看来，传播学长期存在着完美沟通的学科幻像，而缺乏对人际传播中充满沟壑从而经常失败的反思自觉。然而，虽然彼得斯对于传播中的异质性和由此带来的交流丰富性和障碍性予以偏爱，但是其论证角度始终局限于传播过程而忽视了传播更为宏大的目标：构建社会。个体化社会如何构建？或者更准确地说，当个体脱嵌之后，再嵌入何方？如何再嵌入？数字社会联结无疑给个体化社会的构建提供了更为坚实的传播基础。数字社会联结中所蕴藏的对主体的承认：我，对陌生他者的尊重与承认，对与陌生他者共情的勇气和情感能力的培育，对与陌生他者传播与交流的勇气和能力的塑造，对通过与差异他者的情感沟通与传播交流，从而进一步明晰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与联结，自我对他人的责任与义务。这种数字社会联结是建立在人机协作基础上的，这种联结不仅仅是对跨物种的人-物间的联结，更是对人的社会联结的前奏和训练，是真实的、痛苦的，充满韧性和希望的联结。

在这个意义上，晚期现代性下的个体不仅仅是个体化进程意义中的个体从“为他人而活”向“为自己而活”的转换过程，而更是让个体多一份道德、多一份责任、多一份关爱<sup>[35]</sup>。正如弗洛姆（Erich Fromm）所说，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不是建立在脱离他人的“独白主体性”，以及由此形成的人对人的统治和控制关系之上，而是生成于人与人之间相互的爱、团结与创造性的合作<sup>[46]</sup>。在这个意义上，数字亲密的正向意义才得以凸显：它不是建立在数据导向的对人的掌控，而是在对他者差异性的痛苦忍受、相互触动和责任中得以可能，从而使得建立在我机协作基础上的数字亲密关系成为更大意义上的数字社会联结的基础，真正的个体化社会才有可能在这种痛苦、承认和责任并存的交流和联结中得以涌现。

每个时代传播与媒介都被赋予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构建的天职。当我们将数字社会联结视为个体化时代的传播天职的话，对于当下的新闻



传播学研究而言,将传播与社会重新结合起来予以思考,可能会少很多对于媒介形态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学科边界的焦虑,毕竟媒介的变化恰恰是对社会变化的回应和进一步变化的启动器。

(责任编辑:徐秋染)

## 参考文献

- [1] 姜宇辉.数字亲密:爱还是痛?——哲学与政治之间的批判性反思[J].文化艺术研究,2022,15(2):34-48+112-113.
- [2] 次仁群宗,项飙.数字时代重建人与真实世界的关系——访谈人类学家项飙教授[J].全球传媒学刊,2025,12(2):231-242.
- [3] 埃马纽埃尔·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M].朱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3,79.
- [4] 唐莲子.从欲望到需要:数字时代青年亲密关系的选择行为转向[J].兰州学刊,2025(5):211-220.
- [5] 安东尼·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与爱欲[M].陈永国,汪民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7,65.
- [6] 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爱的失序[M].苏峰山,魏书娥,陈雅馨,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10-11.
- [7] 鲍曼.流动的现性[M].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11,56.
- [8] 阎云翔.“为自己而活”抑或“自己的活法”——中国个体化命题本土化再思考[J].探索与争鸣,2021(10):46-59+177-178.
- [9] 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M].龚小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243,266.
- [10] Rikke Andreassen. Mediated intimacies: Connectivities, relationalities and proximities[M]. Routledge, 2017:11.
- [11] Hobbs M, Owen S, Gerber L. Liquid love? Dating apps, sex, relationships and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J].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7, 53(2):271-284.
- [12] 王荆川,胡鹏辉.“中庸”个体主义:搭子社交的互动过程与实践逻辑[J].中国青年研究,2024(10):31-39+48.
- [13] 许冠文,张慧.“嗑CP”:青年女粉丝的创造性情感体验[J].妇女研究论丛,2023(1):102-116.
- [14] 卢燕璇.当情感成为商品:虚拟陪聊的情感劳动、不稳定管理与情感消费[J].当代青年研究,2024(6):40-51.
- [15] 伊利亚金·奇斯列夫.关系5.0[M].孙涵晓,译.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25.
- [16] 姚建华,张中博.“异人”之爱:驯化理论视域下人机亲密关系的建构与演变——以智能聊天机器人 Replika 为例[J].中国青年研究,2025(6):83-91+100.
- [17] 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个体化[M].李荣山,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89.
- [18] 刘子曦,马璐.从“云端爱情”到“严肃相亲”:互联网婚恋平台的数字空间管理与交往模式营造[J].妇女研究论丛,2024(1):61-74.
- [19] 王昕迪,胡鹏辉.搭子社交:当代社会青年新型社交趋势与形成逻辑[J].中国青年研究,2023(8):90-95+119.
- [20] 孙萍,李宜桐,于小童.“中介化爱情”之困:理解线上交友平台的媒介化与性别化[J].妇女研究论丛,2023(1):117-128.
- [21] 吴越,孙弋伟.虚拟男友:数字化时代的男性情感劳动与女性情感消费[J].妇女研究论丛,2023(3):32-43.
- [22] 林仲轩,吴奇利.从情感劳动到情感交易:虚拟恋人的情感商品化实践[J].中国青年研究,2023(2):84-92+100.
- [23] 董晨宇,丁依然,叶蓁.制造亲密:中国网络秀场直播中的商品化关系及其不稳定性[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137-151.
- [24] 徐斌,杨子源.后情感时代的异化与祛魅——情感资本主义困境及其破解[J].理论月刊,2025(3):38-48.
- [25] 姚建华,王洁.情感劳动与网络空间中亲密关系的建构——基于“虚拟恋人”服务的实证研究[J].中国网络传播研究,2021(3):97-111.
- [26] 郑广怀,张心怡.情系云端:数字时代虚拟恋人的亲密关系及其不稳定性[J].广东社会科学,2023(2):217-231.
- [27] 阿兰·巴迪欧.爱的多重奏[M].邓刚,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1.
- [28] 张杰.通过陌生性去沟通:陌生人与移动网时代的网络身份/认同——基于“个体化社会”的视角[J].国际新闻界,2016,38(1):102-119.
- [29] 齐格蒙特·鲍曼.液态之爱:论人际纽带的脆弱[M].何定照,高瑟濡,译.台北:商周出版社,2007:7.
- [30] Goffman, E. On face-work: An analysis of ritual elements in social interaction[J]. Psychiatry Interpersonal & Biological Processes, 1967, 18(3):213-231.
- [31] 韩炳哲.他者的消失[M].吴琼,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5.
- [32] 伊娃·易洛士.爱为什么痛[M].叶嵘,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5.
- [33] 田林楠.在自由与安全之间:社交媒体中介下的亲密关系[J].社会发展研究,2021,8(2):38-53+242-243.
- [34] 马丁·布伯.我与你[M].陈维钢,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56.
- [35] 李荣荣.从“为自己而活”到“利他个体主义”——乌尔里希·贝克个体化理论中的一种道德可能[J].学海,2014(2):106-111.
- [36] 张梅芳,辛雨薇.弥合虚实差异:人机交往中用户的自我认同建构研究[J].新闻大学,2024(5):59-72+119.
- [37] 安东尼·吉登斯,安东尼.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夏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73.
- [38] 曾一果,王可心.心“真”是归处:一种情感真实主义的人机亲密关系阐释路径[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4,46(9):123-131.
- [39] 约翰·杜翰姆·彼得斯.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M].邓建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385.
- [40] 周春林.数字化亲密何以可能——审视机器陪伴的现实性、有限性与未来性[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52(5):39-46.



[41] Fang L, Qiu H. How far removed is human-chatbot parasocial attachment from human intimacy? A study based on communication accommodation theory[J].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25: 1-20.

[42] Danaher J. The philosophical case for robot friendship[J]. *Journal of Posthuman Studies*, 2019, 3(1): 5-24.

[43] 谢立中, 阮新邦. 现代性、后现代性社会理论: 诠释与

评论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533.

[44] 杨君. 回溯与批判: 个体化理论的逻辑考察 [J]. 中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26(3): 144-156.

[45] 于志强. 晚期现代性青年的境遇及其社会心态 [J]. 中国青年研究, 2024(6): 5-13+34.

[46] 艾里希·弗洛姆. 占有还是生存 [M]. 李穆, 等译.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5: 67.

## From Data Intimacy to Digital Social Connectivity: The Predicament and Communicative Reconfiguration of Platform-Mediated Intimacy in an Individualized Era

Zhang Jie, Du Jingman

**Abstract:** The ongoing process of individualization has led individuals to become “disembedded” from traditional social norms. While individuals have gained unprecedented freedom of choice, they have simultaneously lost the sense of security and certainty once provided by traditional social structures. This shift has produced a profound internal tension: people yearn for intimate connections yet resist commitment, and they seek total possession while evading responsibility. Within this social context, the deep embedding of digital platforms further intensify the selectivity, self-determination and fluidity of intimate relationships, and give rise to a form of data-driven, commodified and homogenized virtual intimacy. The platform ostensibly gives individuals unprecedented freedom of choice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packaging them as “pain-free” and “me-centered”, while undermines people’s willingness and ability to tolerate others and assume responsibility. It further dissolves the social bonds with strangers that are the starting point of intimacy, which further exacerbates the dissociation between modern intimacy and social bonding. In the face of this dilemma,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an “emotional training ground” being different from the platform’s business logic, though can not completely replace the deep emotions and co-growth in traditional intimate relationships, it provides the possibility of emotional engagement and communicative practices for people to rebuild social connections, so as to provide pre-training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ore resilient, responsible and meaningful social connections in the digital age. In this sense, digital social connectivity has become the communicative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dividualized society.

**Keywords:** data intimacy; platform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ividualization; digital social connectivity

**Authors:** Zhang Ji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Guangzhou University; Du Jingma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Guangzhou University.



# 超平台化与韧性建设：生成式人工智能内容风险治理的新语境与新路径<sup>1)</sup>

殷琦 陶文冲

**摘要** 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迅猛崛起正推动数字平台生态向“超平台化”快速演进。在此语境下，平台内容生产与服务供给的机制和权力结构正发生深刻重构。这一重构进程使得平台内容风险的表现形态愈发复杂，不仅包括技术性风险，更涵盖因技术链条延伸、权力再中心化、运营透明性弱化所引发的结构性风险，这也导致跨主体审计与责任追索困难、制度供给不足、权责利分配模糊等治理困境愈演愈烈。由此，本文立足韧性治理的思路，以动态适应复杂风险为核心导向，提出通过持续校准规则、对齐多主体责任链条、构建制度自我修复与持续学习机制的韧性建设方案，实现从被动应对技术性风险到主动适配复杂系统的治理升级，为完善超平台化语境下的平台内容治理体系提供有效路径。

**关键词** 超平台化；韧性治理；生成式人工智能；内容风险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殷琦，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福建厦门 361000；陶文冲，华侨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福建厦门 361000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以下简称 GenAI）从对话工具快速演进为可在多终端、多平台调用的通用智能能力，超平台化这一新的平台景观正在形成。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技术公司通过开源大模型（Large Model）极大地降低了 AI 跨平台的部署门槛，大模型研发成果正外溢为跨平台共享的智能资源。GenAI 应用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平台作为内容“连接—分发”者角色，而是逐步形成能够组织内容生产、调度跨平台资源并直接参与用户交互的新型入口结构，成为“平台之上的平台”。在这样的超平台化背景下，GenAI 内容生产机制与治理体系均面临重塑。

GenAI 在平台内容领域的影响已引发众多学者关注。一些研究从技术性视角出发，在关注到 GenAI 赋予平台在内容创造性、效率提升、成本降低和多场景适应性上的强大效能的同时<sup>[1]</sup>，也敏锐观察到与这种技术赋能相伴而生的信息过载、内容偏差、信息操纵、信息茧房、AI 幻觉等问题与风险<sup>[2]</sup>。新近一些研究将对 GenAI 的考察拓展至技术背后的权力关系与制度安排，并

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深化网络管理体制改革的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研究”（24ZDA082）。



指出当 GenAI 作为当前平台运行的根基并成为内容生产的重要场景时，内容生产的主体关系、权责分配、价值目标设定等方面的结构性失衡正发展为新的风险之源<sup>[3]</sup>。事实上，在超平台化情境下，GenAI 的运行逻辑在渗透进平台内容生产的流程与结构的同时，平台结构、权责配置和行动主体关系也共同型塑着 GenAI 的演化路径与应用形态。因而，不仅技术与制度相互型塑，技术性风险与结构性风险也相互交织，使得 GenAI 时代的平台内容风险更加复杂多样。但遗憾的是，绝大多数研究仍聚焦于技术性风险，而少有对结构性风险的系统梳理。对风险本质、演化规律与涌现特征的认知深度，直接决定平台内容治理范式的选择与治理效能的实现。因此，这些新现象、新机制与新风险，迫切需要系统考察与理论创新，以为风险应对与平台内容治理体系创新提供指导与支撑。

本文立足于超平台化语境，通过与传统平台化理论的对话，考察平台内容生产的技术机制、生态结构与运营逻辑特性；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的治理实践，探讨新的时代语境下涌现的新型内容风险，特别是结构性风险的特征与治理路径，推动网络内容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学理支撑与实践路径。

## 一、从平台化到超平台化：GenAI 内容生产的语境变迁

### （一）GenAI 时代平台化理论的适用性及挑战

在过去十余年，数字平台作为一种“可编程基础设施”（Programmable Infrastructure）<sup>[4]</sup>，日益嵌入人类生产、生活与社会交往。在此语境下，平台化（Platformization）成为学者们用以概括平台时代社会形态与运行机制变迁的关键理论概念<sup>[5]</sup>。安妮·赫尔蒙德（Annetta Helmond）最早使用平台化描述数字平台作为基础设施和经济模式兴起的过程<sup>[6]</sup>，将其定义为所有社会行业在利用数字平台提供产品和服务时，双方相互塑造而经历转型的过程<sup>[7]</sup>。何塞·范·戴克（José van Dijck）认为，平台“由数据驱动，

通过算法和界面实现自动化和组织化，通过商业模式驱动的所有权关系实现正规化，并通过用户协议进行管理”<sup>[8]</sup>。凭借其广泛的连接性、无处不在的可触达性和网络效应的技术优势，大型数字平台提供的服务几乎覆盖了搜索、社交与消费等公众数字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形成了一种高度中心化的平台生态，数据化（Datification）、商品化（Commodification）、筛选（Selection）是驱动这一生态系统运转的主要机制<sup>[9]</sup>。总体而言，以平台化特征和机制为研究对象的平台化理论不仅将“连接”视为平台的关键特征<sup>[10]</sup>，更超越技术维度，将产权状态与商业模式作为两大基础架构纳入到平台化及其影响的考察范围<sup>[11]</sup>。

从平台化理论出发，可把平台内容生产实践归纳为两方面特征。一是在产权状态上，平台通过开发新的数据服务和与新闻内容有关的功能，成为连接内容生产、流通和商品化的中心节点，掌握着平台准入权、资源调配权、实际管制权等巨大权力<sup>[12]</sup>，内容生产者则日益依赖头部平台来分发和货币化它们的内容，并逐渐适应驱动平台生态系统的机制和组织原则<sup>[13]</sup>。二是在商业模式上，平台以“连接—分发”为核心，以算法推荐、数据采集与排序机制为技术基础，通过信息流、社交关系链和搜索排名对注意力进行结构化配置<sup>[14]</sup>，并进一步将这些注意力转化为可计量、可交易的数据资产，在此基础上叠加广告、会员、带货等商品化变现机制；相应地，内容生产者需围绕点击率、完播率、粉丝规模与互动强度等平台流量指标来优化内容创作，逐步形成与平台内容分发逻辑和商品化评价体系高度适配的生产常规<sup>[15][16]</sup>。

平台化理论在面对传统平台内容生产秩序、规则与权力关系时呈现出较为充足的阐释力，但当 GenAI、大模型与智能体的兴起与广泛应用引发新一轮内容生产要素、主体、流程等多方变革之时，这一概念日益显露出解释力不足的缺憾。在这里，GenAI 主要指以内容生成与人机交互重构为特征的技术范式；大模型则指支撑这一范式运行、具备跨任务与跨平台



复用能力的基础模型体系；而智能体是大模型能力在具体平台与应用场景中的运行方式与组织形态，其通过感知用户意图、调用模型与工具并执行任务，实际承担内容生成与服务提供的代理职能。

首先，平台化概念以平台的连接特征与分发功能为重心，难以充分说明步入 GenAI 时代，平台从“分发者”转为“代理人”后的内容生产与消费机制变化。随着大模型普及，平台不再只是分发外部内容创作者提供的内容，而是通过由大模型驱动的智能体，如对话机器人、智能客服、自动撰稿工具和推荐助手等，以内容生产者的代理人身份直接生成新内容。其次，尽管既有平台化研究已关注到平台内容生产中算法与数据的重要性，但往往将其理解为不同平台在各自封闭体系内用以提升内容匹配效率、强化用户黏性和最大化商业转化的关键能力与竞争优势。与传统平台相比，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大模型的一个关键变化在于，同一套通用大模型能力可以通过应用程序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或“模型服务”的形式被多款应用与平台同时接入和复用，从而演变为被多平台共同依托的智能资源层。由此，通用大模型扮演着“平台之上的平台”的角色，并在内容生产中削弱了单一平台对内容可见性与价值评价的垄断地位。最后，平台化研究固然已深入内容生产的多元主体权力关系，但由于内容生产往往以单个平台为活动边界，其考察重点仍集中于平台如何组织其内容生态中的用户、内容生产者与广告主。然而，在大模型规模性介入后，内容生产实践已跨越平台边界，由大模型公司、手机与操作系统厂商、传统互联网平台、云计算与算力提供者及大量第三方开发者等多层行动主体，通过模型接入、功能应用、入口绑定和商业分成等机制共同塑形。

由此，当 GenAI 不再只是嵌入单个平台的“增值工具”，而是以大模型、系统级助手等各类跨平台智能体的形式，持续影响入口形态、功能分工与规则设定时，平台与模型之间的关

系便从工具调用关系演变为相互塑造、相互依赖的耦合结构。在这样的条件下，平台化视角下以“连接-分发”为核心的内容生产分析框架已难以涵括平台技术、应用和生态交织变化的整体图景。

## （二）超平台化概念的内涵及其多维表现

本文提出超平台化用以指代在 GenAI 广泛嵌入平台与社会情境下所形成的多元主体、多层平台叠加与博弈的复杂数智生态。在这一生态中，大模型不再局限于单个平台内部，而是日益展现为一种被多种终端、系统与平台共同调用的通用智能能力。围绕这一能力，平台、终端厂商、云服务与算力提供方等多元主体重新排列权力与合作关系，生产规范由迎合平台算法与流量逻辑部分地转向适应智能体的任务与责任逻辑。由此，这一生态已超越以往平台化情境下以单一超级平台及其算法推荐为核心的平台生态。

首先，超平台化在技术层面体现为内容供给机制的重组，原本内嵌于平台内部、围绕分发逻辑运行的算法体系，逐渐被可跨平台调用、链式组织的大模型及其驱动的智能体所统筹。在传统平台时代，推荐算法大多嵌于单一平台内，在平台边界内完成内容的“连接-分发”。新闻客户端通过自己的推荐系统推送文章，短视频平台依据自己的算法决定用户接触的内容……不同平台在技术层面具有相对独立性。GenAI 则打破了这种格局：一方面，同一套大模型可以通过 API 或系统服务的方式，被多个应用和平台共同调用。例如，统一的大模型服务平台，为科研、政务和企业场景提供标准化 API，由不同系统按需接入，不再需要各自重复建设模型<sup>[17]</sup>。另一方面，大模型开始在操作系统侧与终端设备深度绑定，比如字节跳动与中兴推出的“豆包手机”，将豆包大模型以手机助手的形式深度嵌入系统，赋予其系统级权限，使其能跨越微信、淘宝、抖音等不同应用执行连续复杂任务，被媒体描述为可以“模拟人类操作”“跨越 App 孤岛”的 AI 指挥官<sup>[18]</sup>。在这一过程中，大模型不再只是单一功能模块，



而是以智能体的形式介入用户与平台之间。对用户而言，需求的提交对象从具体的平台交互界面转向由大模型驱动的智能体；对平台而言，原本承担内容聚合与交互功能的前台界面，在相当一部分任务场景中逐渐成为被智能体按需调用的“后台工具”，即由智能体先行完成意图识别与任务拆解，再根据任务需要选择性地调用不同平台的内容接口、服务功能或模型能力，并将执行结果重新整合并反馈给用户，从而将内容生产与服务供给嵌入一条由模型主导、跨平台展开的链式调度流程。

其次，超平台化在生态层面呈现出从以单一超级平台为中心的商业生态向多层交叠、互嵌运行的复合结构转变。在平台化阶段，平台作为连接者向上吸纳内容生产者，向下链接用户与广告主，并利用算法和流量分配权组织起一个相对封闭的生态。在超平台化阶段，这种以单一平台为中心的结构开始松动。以当前中国大模型的发展为例，至少呈现出三类关键主体的并行进入与结构叠加。一是以字节跳动旗下的豆包为代表的通用大模型提供方，在搭建插件市场、智能体网络与应用商店的过程中，逐步具备了资源聚合、规则制定与能力分发的功能；二是百度、微信等传统超级平台，在自建模型的同时，也通过提供标准化 API 与软件开发工具包（Software Development Kit，SDK）构建接入与整合第三方模型的能力，进而在模型层面与外部技术体系形成深度互嵌；三是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手机厂商、可穿戴设备及操作系统提供者，通过 AI 手机、车机助手等形态争夺信息“入口”<sup>[19]</sup>。与此同时，上述模型运行与跨平台调用所依赖的并非只是单一平台的技术资源，而是由云服务商及算力与数据基础设施提供方共同构建的底层支撑体系。这类主体通过模型即服务（Model as a Service，MaaS）等模式，将通用大模型能力、计算资源与数据处理能力进行打包输出，为模型提供方、平台与终端厂商提供持续运行与扩展所需的基础条件。由此形成的生态结构已远远超出单一平台基于传统商业模式所搭建的封闭生态圈，表现为多层

平台叠加、交叉嵌入，以及数据与算力基础设施深度联结的复合网络。在这种结构中，平台不再是唯一的生态中心，而是逐渐转化为围绕模型能力与终端入口展开的多层网络中的一环。

最后，超平台化在运营层面表现为主导逻辑由以用户注意力为中心的流量模式，转向以智能体为中心的“委托-代理”模式。在平台化阶段，内容运营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在平台上被更多用户看见<sup>[20]</sup>。进入超平台化时代，用户不再持续地直接与平台交互，而是将信息获取、内容筛选与任务执行的判断权让渡给智能体，由其代表用户做出选择与决策。在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下，内容与服务的价值评估标准也随之发生变化。内容重要与否不再仅仅取决于其在平台上的可见度，而越来越取决于其是否能够被智能体有效理解、调用与整合，是否能够在连续任务与复合场景中发挥作用。由此，智能体逐渐形成对内容生产者与用户的双重规训。一方面，专业内容生产者需要围绕人机协作的运行方式重构生产流程，将原本面向人类阅读与使用的内容，转化为更结构化、标准化、可被智能体识别与复用的知识单元与操作脚本。新闻机构、政务部门与专业服务提供者，不再只是被动为平台供稿或提供技术接入与功能部署，而是主动参与制定并落实与智能体工作流程有关的规范规则，并据此提供内容服务；另一方面，普通用户也被引导持续与智能体互动，通过提示词输入、偏好设置与数据授权，将个体需求、使用习惯与身份特征转译为可被智能体识别与计算的意图表达与任务描述。从这一意义上看，超平台化语境下的内容生产并非放弃以用户为中心的流量逻辑，而是在其之上叠加了一种以智能体为中介的“委托-代理”逻辑，智能体在用户与平台之间承担越来越多的判断与协调职能。

由此，在超平台化语境下，内容生产从以平台为核心中枢主导的“连接-分发”流程模式，转向以大模型及其模型服务为能力底座、在多层平台交叠的生态中运行，并由智能体承担人机交互与任务协调的新的生产秩序。



## 二、从技术性风险到结构性风险：超平台化下内容风险的新理解

### （一）作为主流的技术性风险视角

随着大模型在内容生产中应用范围和程度迅速扩展，其在提升内容生产效率、赋能创作创意、精准化与个性化供给等方面的积极效应日渐显露，但其风险也开始为人们所关注与警惕。相当多的学者从技术性视角出发，讨论 GenAI 相关技术应用在内容生成、分发、接收过程中可能涌现的潜在风险。

在内容生成层面，AI 幻觉被指认为最具代表性的技术性风险。不少研究围绕大模型可能以语言连贯、逻辑自洽的方式输出事实性错误或无法核验信息，从而直接冲击新闻与公共信息真实性这一问题展开<sup>[21]</sup>。相关研究指出大模型中的“幻觉”并非偶发技术漏洞，而是内嵌于大模型所依赖的概率式生成机制之中。大模型在其训练过程中，通过奖励机制鼓励模型给出连贯、确定性的输出，而非明确承认不确定性或自身知识局限，这使得幻觉现象难以根除，只能在特定应用条件与提示词的约束下被减轻与管理<sup>[22][23]</sup>。在此基础上，相关研究进一步将对 AI 幻觉问题的认识从模型机制层面拓展到数据治理与责任结构层面，指出其存在训练数据来源不透明、数据筛选与标注不规范，以及潜在不安全或侵权内容难以完全排除等问题，这些问题都会削弱生成结果的可解释性与可溯源性<sup>[24]</sup>。

在内容分发与接收层面，用户视角锁定与过滤泡沫效应也受到高度关注。进入 GenAI 时代，内容分发不再只是把已有内容精准匹配给需求方的个性化推送，而是转向内容实时生成与深度定制的超个性化服务，从而使得平台可基于用户画像、情境数据与交互反馈对内容形态、呈现方式乃至互动路径进行持续微调，形成远超以往推荐系统的精细化匹配与差异化体验<sup>[25]</sup>。这种即时适配虽能提高用户体验，却也造成用户长期沉浸在由自身偏好和既有行为反馈出来的内容环境中，接触异质观点和新信息源的机会被系统性压缩<sup>[26]</sup>。值得警惕的是，近期研究发

现这种超个性化还可能带来更强的说服效应：当信息能够贴合个体特征被定制生成时，不仅改变公众态度与行为，更影响着公众信任，而且还会在消费者营销、政治动员等场景中带来实质性的社会后果<sup>[27][28]</sup>。当智能体以拟人化解释、即时回应与连续追问的方式输出看似有理有据的答案时，受众更容易默认其为具有可信度的认知捷径，降低核查与反证搜寻，从而导致过度信任并伴随决策失误风险，这种现象被概括为“自动化偏差”，即人在不确定情境下倾向于采纳 AI 建议并忽视相反线索<sup>[29][30]</sup>。

总体而言，既有研究多从大模型的可靠性、分发机制的偏向性、受众使用的依赖性等方面考察 GenAI 内容风险。在这些研究中，GenAI 内容风险通常有相对清晰的技术治理靶点，优化大模型性能、强化平台责任与内容把关、完善训练数据的治理框架、公众智能素养教育等措施作为主要的治理对策被提出<sup>[31]</sup>。

然而，在超平台化语境中，大模型已上升为跨终端、跨平台共享的智能中介，并在多层平台叠加与智能体交互中重组内容秩序与责任结构，因此，风险更常表现为一种跨环节的系统后果，而非可被单点归因的技术问题。在此情形下，内容风险的责任链条因主体复杂交叠而拉长，显现出可追责主体分散、责任边界模糊的治理挑战。正因如此，超平台化语境下的内容风险及其治理的认知视野需从一种技术风险的局部修补视角，推进至一种系统性与结构性视角。

### （二）超平台化下结构性风险视角的提出

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的风险理论指出在现代社会，风险来源发生了转向，风险越来越像现代制度与组织运作自身制造出来的“副产品”，并与权力分配、制度安排和社会分层纠缠在一起，从而很难靠局部修补彻底消解<sup>[32]</sup>。西蒙·科特（Simon Cottle）进一步警示了媒介对风险的作用，其认为媒介并非风险的中性通道，而是通过选择、框架与可见性配置参与风险议题的组织与放大<sup>[33]</sup>。以此观照超平台化下的内容生态，内容风险并非仅源于平台 AI 化后的偶发事故，更是在算法选择、API 设计、



商业激励与治理规则的日常运作中被持续生产出来。平台如何定义“有效互动”、如何设置任务目标、如何把模型能力产品化并嵌入流程，都会将某些内容形态、观点位置与注意力分配固化作为一种结构性倾向。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关于“现代性、风险与反思性”的讨论提供了另一条更贴近当下平台实践的解释线索。他认为，制度往往以“应对不确定性”为名不断自我监测、自我调整，但这种高度反思性的运作并不必然减少风险，反而可能通过持续的制度化实践生成新的风险<sup>[34]</sup>。对于 GenAI 应用而言，大模型与平台算法推荐机制能通过持续迭代、在线实验来优化推荐与交互，但这一套不断调整的制度化实践也可能导致用户依赖、信息过度个性化、算法歧视等现象被反复放大。风险并不完全是因为平台不作为而产生，恰恰是在以控制不确定性之名进行系统性技术与制度部署的过程中，以更隐蔽且稳定的方式被结构性地产生。因此，在 GenAI 深度嵌入社会技术系统后，其风险演化的核心特征在于，它主要并非源于简单的技术事故或误用，而是内生于技术与社会结构深层交互的反馈循环之中<sup>[35]</sup>。

如果说贝克与吉登斯在宏观层面思考制度、现代性与风险生产的关系，并在制度层面提炼风险根源，那么查尔斯·佩罗（Charles Perrow）的“正常事故”理论则从复杂系统角度进一步揭示了风险形成的结构性机制。佩罗指出，在高度复杂且紧密耦合的系统中，小概率错误通过连锁反应升级为系统性事故几乎是难以避免的常态，因此，“事故”本身是系统结构的属性，而非个体失误的偶然结果<sup>[36]</sup>。这一理论也与超平台化语境下的内容风险生成机制相契合。在大模型、云基础设施、平台、终端应用高度联动的超平台化语境中，任何一处偏差（训练数据污染、模型偏见、API 设计缺陷）都可能在 API 调用、数据流转和推荐协同中被级联放大，内容风险不再是“某一模型出错”的孤立问题，而是内容供给系统在按既定逻辑正常运作时内生的结构性失效。

综合以上理论，我们不再将超平台化语境

下的结构性风险定义为主要源于单个技术环节的缺陷或个体行为的偏差，而是定义为更深地根植于社会、技术与制度结构在按自身逻辑正常运转过程中所产生的系统性失调。它往往以连锁反应的方式外溢，对内容生态的可见性分配、责任与信任的制度安排乃至社会运行的秩序预期造成跨主体、跨平台的持续冲击。由此，相较于技术性风险倾向于将其视为可通过预测、评估与纠错予以管控的局部问题，结构性风险则把其理解为权力配置、制度安排与运行机制相互耦合产生的整体性后果，关注的是当大模型、平台、终端和治理主体被编织进紧密联动的网络后，风险在结构关系中持续累积并外溢，进而引发既有治理机制的脆弱化及既有秩序的重置。

### （三）超平台化下内容生产的结构性风险特征

在平台化时代，平台以算法推荐排序、降权限流与审核等不可见规则在后台分配注意力与传播机会，内容风险通常被归因于平台算法黑箱的运作机制，并由此形成了强化单一平台主体责任的治理共识。进入超平台化时代后，在多元主体参与、多层平台交叠互嵌的生态结构中，内容入口与分发边界被拆解为一条由大模型、智能体与多平台服务共同构成的链式调度流程，风险生成机制随之发生根本性变化，这种技术层、生态层与运营层的张力构成了超平台化语境下内容生产的结构性风险的核心特征。

首先，在技术层面，由大模型主导的链式调度流程具有责任分化的特征。在这一流程中，智能体在前端直接接收用户需求，在后端理解意图并拆解任务目标，协调跨平台调用不同内容接口、服务功能与模型能力。内容服务链条的拉长带来了责任分布的多节点化，检索与摘要由大模型能力先行完成、路径调用由智能体决定、内容组合与风险控制则由各平台策略塑型，各类主体在链条上共同参与内容生成与供给。此时，任何单一平台主体对整个链条的控制权与相应责任都变得模糊，传统对单一节点问责的方式也随之失效，从而使风险更易沿链式路径扩散，难以受到外部监督的系统性约束。



其次，在生态层面，多层平台交叠互嵌使得内容供给的控制权看似分散于技术链条的多个环节，但在资本与资源分配日益集中化的影响下，这一控制权实则呈现出隐性的再中心化趋势。超平台化情境下的平台、模型提供方、终端与操作系统供应商、第三方服务者等主体通过技术接口、商业协议交织成复杂链条。在这一网络中，控制权并不会简单平均分布；相反，资本与实力雄厚的主体可以通过占据关键资源和规则节点，将链条中分散的节点重新整合为隐性的权力中心，并在生态运行秩序中起主导作用。这种权力之所以隐性，在于它不是通过某个显性入口或单一界面直接控制议题或内容的呈现，而是嵌入多个链式调度节点与制度规则。在大模型与智能体驱动的跨平台调度链条中，能够定义“合规”“安全”标准、设定默认调用路径与接口优先顺序的主体，实际上掌握着对资源分配与入口路径的解释权与影响力。然而，这种解释权往往通过协议细则、默认参数与风控标准等技术性配置落地，而不是通过公开的政策声明或显性约束规则来实现，这使得权力配置常常难以被外部监督者直接识别或追踪。而占据接口与调度规则优势的主体，能够在多层交叠结构中设定并固化符合自身利益的规则与配置，从而在内容生态秩序中稳固存在，发展为一种隐性且持续有效的控制力量。

最后，在运营层面，当前大模型、智能体、平台入口等主体的集中化发展趋势本身具有不可逆性，这既源于用户对智能体超个性化服务便利性的持续需求，也源于这种能力所创造的市场与服务增值空间。但值得注意的是，基于“委托-代理”逻辑并通过智能体展开的超个性化服务，本质上弱化了传统的人与平台直接交互关系，用户让渡了自身对信息路由、任务执行与信息选择的控制权，将之转移至智能体及其背后的算法体系。在这一过程中，结构性风险主要体现为智能体运行机制的透明性缺失与用户权力的侵蚀。一方面，智能体在跨平台调用路径、默认入口配置与风控标准上的决策逻辑往往不可见、不可追踪，用户难以知晓为何某些内容被推荐、某些操

作被优先执行、某些服务路径被自动选择。这种透明性缺失使得用户与外部监督者均难以识别与跟踪整个链条的决策与判断过程、风险累积的关键节点与责任承担路径。另一方面，用户在与智能体交互时的自主选择权与纠错权弱化也构成重要风险。一旦智能体成为信息获取与任务执行的主要中介，用户的行为入口、偏好设定与选择空间可能被默认路径、大模型偏向与平台商业目标共同塑造，使得用户对接收信息内容与服务过程的控制权丧失。在缺乏明确可解释的机制、可选择的替代路径和低成本纠错渠道时，用户实际上被锁定在由大模型与平台共同构建的运营生态中，而难以通过传统的接口设置或偏好调整来改变这一局面。

技术链条的延伸、隐性权力中心的形成与运行透明性的弱化共同构成了超平台化语境下的风险张力。一方面，智能体主导的链式调度流程打破了单一入口的控制边界，使得传统的节点式问责与监管路径面临挑战；另一方面，这些分散节点又可能在资源配置、接口标准与制度话语的博弈中被重新组合为新的控制中心，使得风险的表现形式更加隐蔽、治理路径更加复杂。

这种风险张力在现有治理语境下又进一步放大为两种结构性困境。其一，我国现有 GenAI 与平台治理制度设计主要通过备案准入、属地管理与平台主体责任来锚定治理对象，《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2023 年）将责任重心主要压在“技术服务提供者-使用者”的二元结构之上，信息内容生产的主要法律责任高度集中于“提供者”一端，却并未在内容生产的上下游之间形成清晰、可执行的责任分工；《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2019 年）则将内容生态治理的统筹权集中于网信系统，并主要以平台端分发与处置为监管抓手；《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2025 年）进一步强化标识机制以实现可追溯。这样的框架在传统“平台-内容”链条中相对有效。但在超平台化条件下，内容生产的控制权分布于跨层主体与跨场景调用之中，单纯把责任“钉”在平台端或某一类“提供者”上，无法覆盖风险产生的全链条。



既有监管工具与手段虽能观测到平台方根据自身规则或法律合规要求对内容生态的治理行为，但难以观察、理解、解释与评估内容如何从入口开始被调度、决策和分发的全过程，特别是难以洞察与规范内容生产背后的权力分配秩序与规则框架。由于此前相当一部分互联网治理责任与权力已从外部监管机构下放至平台，延续至超平台化情景下，平台不仅扮演内容分发者，还常同时承担模型能力集成、调用权限配置、接口开放与生态准入裁量等职能，因而平台的规制权不再局限于删改与推荐，而是前移为对检索来源、内容呈现、跳转路径与第三方接入的结构性控制。而在透明原则、程序约束与有效救济相对不足的条件，这种平台及相关技术主体对用户内容获取路径、调度逻辑和服务调用规则的决定过程更难被外部审计，也更容易在合作绑定与默认协议中被制度化并固化。

其二，集中治理的高强度反馈与制度供给的细分不足叠加。有些短周期、高强度的治理方式虽强化了风险应对与震慑能力，但主要效力在于短期纠偏，较难沉淀为覆盖数据、模型、接口、应用、分发的全链条、常态化规则体系。当上位原则充足而配套规则、程序性安排与跨链条责任分工不足时，平台可能在链条内部横向转移风险、对外纵向外包合规成本，治理也容易滑向“只管标识、不管实质”的碎片化处置。尽管表层内容问题能被点状处理，而更深层的入口绑定、跨平台传导与责任漂移仍可能在结构中持续累积。

由此可见，在超平台化语境下，治理的结构性难题不只是建立完备的规则体系，更在于如何在高度不确定性、持续演化的技术与生态结构中，构建一种能够穿透入口链条、支撑跨主体协同，并可随结构变化动态校准的治理能力。

### 三、走向韧性：超平台化下的平台内容治理取径

既有平台内容治理模式往往以技术性风险为主要关切点，遵循着以“压责任、抓节点、快处置”为特点的风险控制路径。这种风险控制型的治理模式延续了传统刚性治理的思路，

即依托备案管理、标识规范、平台主体责任落实及专项整治行动等标准化、约束性和强制性手段，力图将潜在风险最大限度转化为可识别、可处置的管控对象。然而，在超平台化语境下，内容风险常以跨主体、跨平台的链条性后果出现，导致风险未必是单点暴露，而更可能是以结构耦合后的系统性后果呈现。因此，以风险管控和刚性约束为特征、以平台主体为责任中心的内容治理模式，虽然能够较为有效地解决显性问题，却难以覆盖结构性偏差。结构性风险的浮现意味着在不确定性与风险常态化之中，维持系统可用与可控的能力提升应成为平台内容治理的关键取向。

不少研究已提出适应性治理、敏捷性治理作为平台内容治理改进思路。如敏捷性治理强调通过柔韧、灵活的行动或方法来应对 GenAI 时代呈现复杂多变性、随机突发性和结果不可控性等特征的平台内容风险，以促进技术应用和风险规制之间的动态平衡<sup>[37]</sup>。适应性治理则强调根据不同技术结构与风险情境，采用差异化的治理工具与制度安排，并将治理重心前移至风险预判与主动安全的制度设计之中，通过建立预防和应对并重、动态适应的风险防控机制来应对 AI 情境下内容生态系统的变化<sup>[38]</sup>。这些观点都体现着平台内容治理取向从刚性治理（Rigid Governance）向韧性治理（Resilient Governance）的转变。

韧性起源于工程学与生态学领域，后被引入社会科学领域的概念，其意指“系统在暂时扰动后恢复平衡的能力”<sup>[39]</sup>，蕴含着预见性、缓冲性、抵抗性、适应性、恢复性和进化性等特征<sup>[40]</sup>。相较于传统的刚性治理强调通过抵抗、防御与管制以隔绝可控、可预测风险，韧性治理承认风险的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性，更突出动态识别、弹性调整与持续学习的制度安排。据此，面向 GenAI 时代平台内容风险的韧性治理并不是用更强的管控去消除内容生产过程中所涌现的风险，而是承认内容生态系统会持续遭遇扰动与意外，并把内容风险治理重点放在韧性治理层面，即如何在持续技术迭代与不确定性中，让规则可

校准、责任可对齐、风险可预警、事件可复盘、系统可恢复，从而建立平台内容生态系统韧性，以此适应超平台化语境下涌现的结构性风险。

首先，在制度设计取向上，韧性治理强调从事后处置与节点式问责转向持续识别与动态校准。在超平台化语境中，内容风险在模型服务、智能体调度与多平台接口的耦合链条中呈现出被放大、迁移乃至隐蔽化特征，而传统的节点式问责与事后处置的应对方式难以形成有效的风险治理闭环。由此，韧性治理的关键即在于通过制度设计持续性识别风险的发生、演化、转移并进行纠偏，以形成可执行的闭环。欧盟的《数字服务法》（*Digital Services Act, DSA*）（2022年）提供了一个制度性借鉴，其将对可能造成广泛社会影响的系统性风险的识别、评估与审查制度化为超大型在线平台的年度风险评估与独立审计义务<sup>[41]</sup>。这一制度安排通过将系统性风险纳入常态化评估与外部审计流程，使风险管理与审计成为一种可比性强、可追责的治理循环，而不是单次事后处罚。对于超平台化条件下的中国内容治理实践而言，当入口控制权跨越模型服务、智能体调度与平台接口多层主体时，监管与社会监督必须具备能够穿透入口链条的观察、审计与反馈机制，以识别风险在何处被放大、在何处出现责任漂移，并据此调整治理边界与制度安排。正如韧性治理所强调的，规则需要具备持续校准与联动调整的能力，责任划分需要能够覆盖链式调度各节点，风险预判与事件复盘需要涵盖跨主体组合的运行路径<sup>[42]</sup>。在制度实践中，对系统性风险的年度评估与独立审计机制正是构建这种持续校准能力的制度工具之一，它使得治理不仅关注规则是否完备，更关注规则如何在多主体、多层链条结构中被贯彻、解释与调整。只有这样，治理才能在不断演化的技术结构与生态张力中维持对内容风险的识别与应对能力。

其次，在责权分配上，韧性治理要求由责任下压转向责任对齐，推进责权主体的可监督化。在超平台化情境下，内容入口与分发边界不再由单一平台界面决定。若平台内容治理仍

将主要责任下压给平台，不仅不会提高治理有效性，反而可能在规则不透明、用户选择权有限的前提下，放大平台围绕入口规则的自由裁量空间，使得入口控制权成为新的结构性风险来源，最终导致平台缺乏可被监督与纠偏的制度约束。韧性治理则通过一套可理解、可执行、可审计的制度程序将入口规则对用户行为的影响纳入常态化治理框架，这一治理逻辑既要求责任在链条各节点之间对齐，也要求用户在实际使用中获得更实质的知情权、选择权与纠错权。在这方面，中国《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2021）已要求服务提供者向用户提供非针对个人特征的选择项或关闭算法推荐的选项，并规定用户有权要求说明及补救改进。这为约束平台入口控制、保障用户选择权提供了重要制度基础。面向超平台化结构性风险的深化治理，下一步关键在于将这种告知、选择、说明、救济的制度精神从传统的算法推荐场景延伸至由大模型与智能体驱动的系统级入口规则之中，从而有效抑制平台在商业激励下固化默认推送路径，避免入口控制权失衡演化为结构性风险的稳定来源。

再次，韧性治理在能力构建层面，注重从处置导向转向学习导向，将普遍高发的风险事件转化为可复用的制度知识。超平台化环境里，内容风险往往不会因一次性、高强度的整治而根除，而能否把每次事件转化为可复用的经验，以减少同类问题在新场景与跨平台链条上的反复出现，成为有效治理的关键。这意味着中国平台内容治理体系在保持集中整治与快速响应优势的同时，更需要把专项行动中形成的线索、处置路径与边界判断，转化为可持续的制度化学学习机制，以统一口径记录事件、追踪影响链条、评估整改效果，并将复盘结论转化为规则调整与能力建设的依据。经合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在2025年2月发布的《面向AI事件的共同报告框架》（*Towards a Common Reporting Framework for AI Incidents*）中指出，随着AI的广泛部署，事件与风险的发生率上升几乎不





可避免，因此应尽早建立可互操作的共同报告框架，促进跨部门、跨行业乃至跨国家的经验迁移与知识共享，从而避免各自处置、难以比较、难以学习的治理困境<sup>[43]</sup>。因此，中国推进韧性治理，一方面应将评价重心从处置数量转向复盘质量与改进效果，把个案处置转化为机制更新；另一方面也以 OECD 这类可互操作的事件报告标准为参照，推动国内事件记录维度与国际框架逐步对齐，使复杂多变的风险类型能够更快被识别、比较并形成协同应对的共同语言。通过这种持续学习与制度化反馈机制，治理体系能够更有效地适应超平台化条件下的结构性风险。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超平台化语境下的韧性治理不应局限于平台体系内部的技术性与制度性修补，而应置于一个多层次、整体性的社会治理框架中加以把握。平台企业、终端与操作系统供应商、第三方服务者等主体固然是风险处置的关键行动者，但结构性风险的生成与扩散同时受到监管制度、市场激励、技术生态、公共舆论与跨境标准等外部因素持续作用。因此，面向结构性风险的韧性治理，将从互联网平台的合规与自律，扩展为跨部门、跨行业、跨场景的制度协同与公共治理能力建设，使平台内容生态能够在外部冲击与持续不确定性下维持可见、可监督、可纠偏的公共秩序。

这里的公共治理能力，并非平台自身的技术能力，也不等同于政府强制性的监管权力，而是指向社会整体为应对跨主体、跨链条外溢风险而形成的一组具有公共物品属性、能够持续运转的治理能力。一方面，它通过法治文化建设与公共讨论塑造适应于超平台化语境的新型权利文化，强化公众对大模型规则、平台入口控制与智能体行为的认知，推动公众从被动接受权利告知走向主动参与平台内容治理的规则塑造，使得公众权利可被感知、可被主张、可被实践，从而为内容风险的监督与纠偏提供稳定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它还体现为制度耦合能力，即推动国家安全、反不正当竞争与反垄断、消费者保护等相关制度与平台内容治理规则形成衔接与联动，从而将韧性落实为一种由多种制度共同支撑的

系统能力。只有当这种社会治理层面的权利文化塑造与制度耦合能力，与面向平台自身的持续校准型韧性治理机制相互配合、协同作用时，韧性治理才能真正回应超平台化背后的结构性风险。

综上，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本研究提出超平台化概念用以概括 GenAI 时代由大模型驱动、多平台叠加与智能体交互共同塑造的复杂数智生态，并在超平台化语境下将内容风险研究从主要关注由单一环节缺陷引发的技术性风险，推进到由技术结构、权力配置、运营机制与制度安排相互耦合所带来整体性后果与结构性风险层面。其二，本研究据此引入韧性治理，作为与超平台化语境下结构性风险特性相匹配的治理范式，它不以把风险彻底消除为目标，而是在承认不确定性与技术风险常态化的前提下，强调通过对结构性风险的常态化审计、责权分配机制的持续对齐与纠偏、治理经验的持续学习与制度化反馈，以及同社会整体的治理框架相耦合，使得内容风险的治理体系既能在常态化风险中维持关键功能与关系的延续，也能在持续反馈中完成规则与能力的迭代更新。因此，韧性治理的取向并非追求风险归零，而是推动平台内容治理克服超平台化带来的结构性压力，从被动应对转向可持续的制度自我更新与能力建设。

（责任编辑：孙尚如）

## 参考文献

- [1][25]Wessel M, Adam M, Benlian A, et al. Generative AI and its transformative value for digital platform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2025, 42(2): 346-369.
- [2] Azionya C M. GPTs and Digital Superintermediaries: Dynamics, Dilemmas, Dangers of Generative AI: A Conceptual Framework[J]. *Communicare: Journal for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Africa*, 2025, 44(1): 92-106.
- [3] 臧雷振, 陈浩. 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风险及社会治理挑战[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25, 29(1): 43-53.
- [4] Poell T, Nieborg D, Van Dijck J. Platformisation[J]. *Internet policy review*, 2019, 8(4): 1-13.
- [5][6]Helmond A. The platformization of the web: Making web data platform ready[J]. *Social media+ society*, 2015, 1(2): 2056305115603080.
- [7] Nieborg D B, Helmond 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 Facebook's platformization in the mobile ecosystem: Facebook Messenger as a platform instance[J].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19, 41(2): 196–218.
- [8] Van Dijck J, Poell T, De Waal M. *The platform society: Public values in a connective world*[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9.
- [9] Van Dijck J, Poell T, De Waal M. *The platform society: Public values in a connective world*[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4.
- [10] 彭兰. “连接”的演进——互联网进化的基本逻辑[J]. 国际新闻界, 2013(12): 6–19.
- [11] Van Dijck J, Poell T, De Waal M. *The platform society: Public values in a connective world*[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10.
- [12] 刘晗. 平台权力的发生学——网络社会的再中心化机制[J]. 文化纵横, 2021(1):31–39+158.
- [13] Van Dijck J, Poell T, De Waal M. *The platform society: Public values in a connective world*[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50.
- [14] 张世超, 刘海龙, 孙欣然. 媒体如何上热搜: 平台可见性机制与新闻生产策略[J]. 新闻界, 2024(12):27–36+89.
- [15] 殷琦, 林毅. “拖更的鸽子”: 平台内容生产劳动中的弹性关系——一项基于哔哩哔哩的探索性研究[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3,30(12):69–85+127–128.
- [16] 胡泳, 李雪娇. 反思“流量至上”: 互联网内容产业的变化、悖论与风险[J]. 中国编辑, 2021(11):29–34.
- [17]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中国科技云大模型 API 开放平台 Token 数突破 100 亿 [N/OL].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网站, (2025–06–06)[2025–12–11]. [https://cnic.cas.cn/gzdt/202506/t20250606\\_7798870.html](https://cnic.cas.cn/gzdt/202506/t20250606_7798870.html).
- [18] 黄昱. 豆包手机掀起了滔天巨浪 [N/OL]. 华尔街见闻, (2025–12–06)[2025–12–11]. <https://wallstreetcn.com/articles/3760851>.
- [19] 吴蔚. 多方争夺 AI “入口” 终端市场 “跨界” 潮起 [N/OL]. (2025–12–10)[2025–12–11]. 新华网, <https://www.news.cn/tech/20251210/223a8a52e69642c2b6638e3b43809eba/c.html>.
- [20] FÜRST C, OEHRER F. Attention for attention hotspots: Exploring the newsworthiness of public response in the metric society[J]. *Journalism Studies*, 2021, 22(6): 799–819.
- [21] 喻国明, 金丽萍, 刘佳颖. 大语言模型下机器的幻觉与人机信任构建机制探讨[J]. 未来传播, 2025, 32(2):2–10+128.
- [22] 聂静虹, 李肖楠. 抵御“智能幻象”: 主流媒体内容生产中的 AI 幻觉与风险防范实践[J]. 新闻与写作, 2025(11): 97–109.
- [23] Kalai A T, Nachum O, Vempala S S, et al. Why language models hallucinate[J]. *arXiv preprint arXiv:2509.04664*, 2025.
- [24] 徐伟, 韦红梅. 生成式人工智能训练数据风险治理: 欧盟经验及其启示[J]. 现代情报, 2025, 45(5): 89–98.
- [26] Pandey R, Pasha N, Borah A J, et al. Hyper-Personalization in Digital Marketing: The Role of FinTech and Predictive Analytic[J]. *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 2025, 2(3): 127–132.
- [27] SIMCHON A, EDWARDS M, LEWANDOWSKY S. The persuasive effects of political microtargeting in the age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J]. *PNAS Nexus*, 2024, 3(2): 35.
- [28] MATZ S C, et al. The potential of generative AI for personalized persuasion[J/OL]. *Scientific Reports*, 2024.
- [29] LOGG J M, MINSON J A, MOORE D A. Algorithm appreciation: People prefer algorithmic to human judgment[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2019, 151: 90–103.
- [30] CARNAT I. Human, all too human: accounting for automation bias in generative large language models[J]. *International Data Privacy Law*, 2024, 14(4): 299–314.
- [31] 李旭光, 胡奕, 王曼, 等.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研究综述: 应用、风险与治理[J]. 图书情报工作, 2024, 68(17): 136–149.
- [32] Beck U. Critical theory of world risk society: A cosmopolitan vision[J]. *Constellation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tical & Democratic Theory*, 2009, 16(1):3–22.
- [33] COTTLE S. Ulrich Beck, ‘Risk Society’ and the Media[J].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98, 13(1): 5–32.
- [34] Giddens A.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M]//*Social theory re-wired*. Routledge, 2023: 477–484.
- [35] Kilian K. Beyond Accidents and Misuse: Decoding the Structural Risk Dynamic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J/OL]. arXiv:2406.14873, 2024. Available at: <https://arxiv.org/abs/2406.14873>.
- [36] Perrow C. A personal note on normal accidents[J]. *Organization & environment*, 2004, 17(1): 9–14.
- [37] 薛澜, 赵静. 走向敏捷治理: 新兴产业发展与监管模式探究[J]. 中国行政管理, 2019, (8): 28–34.
- [38] 赵梓羽. 生成式人工智能数据安全风险及其应对[J]. 情报资料工作, 2024, 45(2): 30–37.
- [39] Holling, C. S., Resilience and Stability of Ecological Systems[J].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 1973, 4(1): 1–23.
- [40] Folke C, Carpenter S R, Walker B, et al. Resilience thinking: Integrating resilience, adaptability and transformability[J]. *Ecology and Society*, 2010 (4): 20.
- [41] Regulation (EU) 2022/2065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9 October 2022 on a Single Market for Digital Services (Digital Services Act)[S/OL].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L277:1–102, 27 Oct. 2022. <https://eur-lex.europa.eu/eli/reg/2022/2065/oj/eng>.
- [42] Beunen R, Patterson J J, Van Assche K. Governing for resilience: 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work[J]. *Current Opinion in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2017(28): 10–16.
- [43] OECD. Towards a common reporting framework for AI incidents[R]. OEC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apers, No. 34.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25–02–28.



## Hyper-Platformization and Resilience Building: A New Context and Pathways for Governing Content Risks of Generative AI

Yin Qi, Tao Wenchong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rapid rise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accelerated the emergence of “hyper-platformization” within the digital platform ecosystem. In this context, the mechanisms and power structures governing platform content production and service provision are undergoing profound restructuring. This process has rendered platform content risks increasingly complex, encompassing not only technical risks but also structural risks arising from the extension of technological chains, the re-centralization of power, and declining operational transparency. These dynamics have intensified governance challenges, including difficulties in cross-actor auditing and accountability attribution, insufficient institutional provision, and blurred distributions of rights, responsibilities, and interests. In response, this article adopts a resilience governance perspective, taking dynamic adaptation to complex risks as its core orientation. It proposes a resilience-building framework that emphasizes the continuous recalibration of regulatory rules, the alignment of multi-actor responsibility chain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for self-repair and continuous learning. Through this approach, governance can be upgraded from the passive management of technical risks to the proactive adaptation to complex systems, thereby offering a viable pathway for strengthening platform content governance in the context of hyper-platformization.

**Keywords:** hyper-platformization; resilient governance;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ntent risks

**Authors:** Yin Qi,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Tao Wencho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uaqiao University.



# 媒体的政治性结构及其制度变迁<sup>1)</sup>

——数智时代比较媒介体制研究的范式重构

苏颖

**摘要** “媒体的政治性结构”作为“媒介体制”概念内核的理论抽象，强调媒体是根植于特定权力结构、制度安排和历史传统的政治性存在。尽管数字智能技术深刻改变媒介环境，但媒介市场结构、政治平行性、新闻职业规范与国家角色四大经典比较维度的解释力依然稳定，但须通过经验拓展与指标升级实现历史化重构。“结构中的媒介技术”作为中观分析框架，强调政治性结构以高度适应性对新兴媒介技术进行再配置，并呈现数智时代媒介体制的三种变迁模式：制度延续、制度偏移与制度自生。该框架推动比较媒介体制研究从静态空间类型学转向动态制度变迁分析，形成解释媒介体制发展与创造的新范式。中国传媒改革通过系统整合与实践创造，突破了极化多元等原初理论解释，为构建更具普遍性的全球媒介体制知识体系提供了重要经验支柱。

**关键词** 比较媒介体制；媒体的政治性结构；结构中的媒介技术；数智时代；范式重构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苏颖，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024

## 引言：走入数智时代的比较媒介体制研究

进入 21 世纪以来，数字化进程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影响了媒介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平台化、算法化与智能化的媒介环境，重塑了政治信息流通的方式和公共舆论存在的生态，进而对政治传播、公共协商与民主治理提出重大挑战。政治传播领域的变化是人类身处现代性自反的大变革时代的一个缩影。进入新世纪以来，诸多曾被视为圭臬的经典理论范式陷入解释力危机。在这一背景之下，如何重新理解媒介与政治之间的结构性关联，并探究其历史演变可能性，成为学界必须直面的重要论题。2004 年，丹尼尔·哈林（Daniel C. Hallin）与保罗·曼奇尼（Paolo Mancini）（以下简称“哈林-曼奇尼”）的专著《比较媒介体制：媒介与政治的三种模式》（*Comparing Media Systems: Three Models of Media and Politics*，以下简称《比较媒介体制》）出版。该研究建构了媒介市场结构、政治平行性、新闻职业规范、国家角色四大指标，归纳了欧洲与北美 18 个西方国家的媒介与政治关系模式，即自由主义模式、民主法团主义模式和极化多元主义模式。该研究被评价为继《传

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政党制度视域下的比较政治传播研究”（20CZZ005）。



媒的四种理论》之后最重要的比较政治传播研究宏观理论<sup>[1]</sup>，成为我们后续思考媒介与政治关系不可绕行的理论基点。然而，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这一诞生于前数智时代的理论逐渐显露出历史局限。其中，最为显性的冲击是，该理论以报刊、广电等正在衰退的传统媒介形态作为经验基础，实难有效解释平台化、算法化与治理全球化的信息生态环境。有学者尖锐批评，这一理论看起来像被“冻结在了二十世纪中叶”，因为它无视了“房间里 800 磅重的大猩猩”，即新兴信息、电子传播技术的踪影<sup>[2]</sup>。围绕这一困境，学界展开了持续近二十年的论争。一方面，批评者强调比较媒介体制研究严重低估了数字媒介的颠覆性，主张在原有框架中更新比较指标<sup>[3]</sup>，或建构新的比较维度<sup>[4][5]</sup>，甚至提出以“数字传播体制”取代“媒介体制”的分析框架<sup>[6][7]</sup>。另一方面，面对挑战，哈林-曼奇尼坚持捍卫原有范式，强调媒介体制作为“稳定模式”的解释力，主张必须将新兴媒介技术置于制度与政治的历史语境中加以理解。

在理论史上，关于媒介与政治的关系大体形成了两种论争解释：一是强调媒介逻辑具有独立解释力的“媒介自主性”解释<sup>[8]</sup>；二是将媒介视为嵌入政治制度与历史语境之中的“制度嵌入性”解释<sup>[9]</sup>。这两类解释路径还可分别追溯至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决定论的学术传统<sup>[10]</sup>。当前围绕比较媒介体制研究的主要争议，正是上述两种解释路径之间张力的体现。哈林-曼奇尼的挑战者沿袭媒介自主性解释，强调媒介体制这一概念的“媒介”一边，认为必须顺应媒介技术的巨变重新界定媒介体制；而哈林、曼奇尼则沿袭制度嵌入性的理论资源，强调媒介体制这一概念的“体制”一边，认为媒介技术变迁对体制的挑战必然受到体制的前提性制约。由此可见，围绕比较媒介体制研究近二十年的理论争议，恰恰源于媒介体制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性，它试图整合媒介与体制这两个二分概念，却反而因此模糊了后者对于前者存在的根本影响。

为了使理论焦点更加明确，本文提出“媒

体的政治性结构”作为对原初概念内核的再提炼。该概念界定媒体存在的政治前提，强调媒体角色并非技术逻辑的自然产物，而是植根于特定权力结构、制度安排与历史传统所构成的宏观结构之中。其理论内涵可从三个层面理解。其一，在理论继承意义上，它延续了比较媒介体制的原初目标，即“确认政治与大众媒介结构之间是否存在系统性关联”<sup>[11]</sup>。但与原概念不同的是，它明确其作为分析基点的体制性逻辑，着力规避媒介体制这一原初概念因模糊性导致的概念歧义。其二，在理论区分意义上，这一理论视角与当下强调媒体的技术本身的分析视角相区别：它警惕“作为物的媒介”或“作为本体的媒介”等媒介自主性的理论解释框架，强调基于“政治性结构”的这一前提理解媒介。就此而言，该理论能为当前新闻传播学科中过热的“回归媒介”的学科氛围提供不可或缺的批判视角。其三，在理论创新意义上，它试图在数智时代重新搭建媒介与政治之间的结构性关联，因而具备将比较媒介体制研究从一种共时性的空间研究，推向历时性的时间研究的理论潜力，从而为解释数智时代的媒介体制变迁提供新的理论起点。

本文通过系统梳理数智时代比较媒介体制理论的理论争议与更新，重点回应两个核心问题：其一，在数智时代背景下，哈林-曼奇尼所提出的媒介体制的比较分析维度，是否仍具备解释效度？其二，该理论如何通过自身预设与方法论的反思性调整，有效回应时代变革，进而形成对媒介体制变迁的强解释力？需要明确的是，本文并非否定原初理论，而是力图挖掘其在理论史发展中沉淀下来的理论内核，并推动其在数智时代的历史化重构。

## 一、数智时代媒介体制比较维度的历史化重构

哈林-曼奇尼曾指出：“我们用来比较媒介体制的四个维度可能比我们的三种理想类型更适合‘旅行’。”<sup>[12]</sup>这种旅行不仅是跨国的空间之旅，数智时代的媒介演进已将这场旅行带入一场具有历史感的时间之旅。哈林-曼奇尼

在《比较媒介体制》中提出四个颇具原创性的比较维度，数智时代的大部分争议围绕此展开。尽管作者强调四个维度的不可减性（irreducibility）<sup>[13]</sup>，但为便于结构化分析，本文仍从数智化挑战出发，把争议凝练为四个核心追问：在数智时代，如何衡量媒介市场结构？政治平行性如何更新？新闻职业规范是否被重塑？国家角色有何突破？本文遵循审慎解释原则，在原著本意与作者回应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逐一辨析并给出解释。

#### （一）媒介市场政治关联度的数智化迁移

媒介市场结构关注媒介市场的发展，尤其通过报纸的发行量、性质、受众（如性别差异）等因素比较各国的媒介市场结构<sup>[14]</sup>。随着全球印刷业衰落与互联网普及带来的“平行位移”，学界提出两类质疑：是否应放弃“报刊中心”转向数字媒介的整体市场度量？是否应在受众指标上引入年龄、教育与媒介接触强度等新指标<sup>[15]</sup>？

对此，哈林-曼奇尼仍坚持以报纸作为基准，这是因为比较媒介体制研究关注的并非媒介本身，而是“媒介与政治的系统性关联”。换言之，关键不在媒介类型的新旧，而在其能否反映政治结构。报纸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阅读门槛能区分横向（从精英到精英）与纵向（从精英到公众）传播结构<sup>[16]</sup>。如果一个国家报纸读者主要是精英群体，电视受众主要是普通民众，则政治信息主要在精英圈层内部流动，呈现横向传播结构；反之，若报纸读者占全民比例高，则意味着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具备较强的纵向传播能力。因此，挪威与希腊报纸发行量的巨大差异，本质上反映了两国纵向政治传播能力及民主参与结构的差异。这一差异在跨国比较中极具辨识度，并在西方之外同样成立：除以色列、澳大利亚、新西兰外，大多数国家的报纸发行量都低于《比较媒介体制》中民主化程度最低的南欧国家，显示这一理论预设具有跨情境的稳健性<sup>[17]</sup>。同理，之所以关注受众性别差异，亦是因为其可间接测量政治平等：男女阅读差距小的国家（如瑞典、挪威、芬兰）

多属于民主法团主义体制，而差距大的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则更接近极化多元主义<sup>[18]</sup>。理解这一逻辑，才能理解即便在数智时代，也不能直接用数字媒介替代报纸。当前的数智媒介主要基于互联网及其智能化衍生形态，包括以算法驱动的社交平台与平台化新闻分发系统等。这类媒介深入民众日常生活，但正因为其高度普及而具备可类比于电视的公众性质，反而削弱了它在区分“横向-纵向”传播结构时的测量价值。同理，年龄、教育等受众变量也未显示出在比较不同国家政治结构方面更强的区分度。因此，这一维度的核心在于选择能稳定映射政治关联的指标，而非媒介技术载体的新旧。在确认这一内核前提下，理论更新可从两方面推进。一是寻找报纸纵向传播功能在数字环境中的等价物，如数字报订阅率、深度时政内容的到达率与完读率、实名或付费参与度等；二是观察性别差异的数字迁移，如在高门槛场景（付费、实名、长读）中两性差距是否缩小，以继续作为政治平等的间接指标。总之，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比较媒介体制研究”更替为“比较媒介研究”，而应确保对媒介市场结构的分析，始终不脱离政治关联度的考量。

#### （二）“政治平行性”的社会化转向

在《比较媒介体制》中，“政治平行性”指“媒介与政党联系的性质和程度，更广泛地看，就是媒介体制反映社会中主要政治分歧的程度”<sup>[19]</sup>。早期主要测量报刊的党派性，其最高形式是媒体的政党平行性<sup>[20]</sup>。随着西方国家报刊与政党的组织纽带逐渐削弱，这一概念扩展为反映媒介与“社会一般政治倾向”之间的关系<sup>[21]</sup>。进入数智时代后，在西方语境中，“媒体-政党”甚至“媒体-政治”的直接对应关系进一步削弱。社交平台并不直接生产内容，而是依赖用户生成内容与算法推荐机制进行分发。因此，平台上的政治表达反映的是用户的政治倾向，而非平台自身的政治属性。数字环境中的政治平行性因而更多反映平台用户与社会整体政治倾向之间的平行程度，甚至可以说，平台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社会”本身。这对





原初理论提出了重要挑战。原著提出的四类指标（媒体内容、组织联系、新闻从业者政治倾向、受众党派性）<sup>[22]</sup>在数字环境中几乎失效，仅有“受众党派性”仍具一定解释力。然而，即便如此，用户端亦呈现党派性表达持续弱化与语境化程度加深的趋势。传统党派标签在社交媒体上已不常见，取而代之的是围绕性别、环境、移民、脱欧等议题的内容（content）争议，而这些争议背后往往蕴含强烈的、具备政治指向的语境（context）争议<sup>[23]</sup>。例如，网络上的女性主义表达，虽大多聚焦于家务分工等日常化社会分歧，但不难理解这些表达背后以权利平等的政治分歧为基本语境。可以说，政治平行性正在从测量政治-媒介关系的异质性，转向测量媒介受众（或者说“媒介用户”）的一般性（区别于明确的党派性）政治倾向。

这种一般性倾向又与政治极化同步发展。数字媒介推动信息环境碎片化、受众分众化，社交媒体的信息孤岛式架构进一步强化社会分裂<sup>[24]</sup>。哈林-曼奇尼指出，政治正在从内部多元主义向外部多元主义转型，“政治两极分化可能会加剧”<sup>[25]</sup>。在这一趋势下，外部多元主义中的媒体已不再是中立的公共领域中介，而直接参与社会文化和政治论争<sup>[26]</sup>。可以说，政治平行性的社会化转向，不仅是指标的更新，更揭示了媒介与政治关系的深刻重构，也折射出社会观念与政治思潮的变迁。

### （三）新闻职业规范的责任重构

在《比较媒介体制》中，新闻职业规范强调新闻业的“自治”“职业规范”和“公共服务取向”<sup>[27]</sup>。然而，数智技术的深度介入不仅改变了新闻生产的外部环境与组织形态，更在认识论层面挑战了传统新闻伦理的基础。

学界普遍关注数智技术对行业的冲击。曼奇尼以“去制度化”<sup>[28]</sup>概括这一变迁：新闻业正脱离传统层级与制度，公民借社交媒体直接进入公共表达，传统中心被开放式协作网络取代。一方面，新闻业出现“去职业化”<sup>[29]</sup>，用户生成内容重塑新闻来源；另一方面，技术驱动的职业模式兴起<sup>[30]</sup>，算法、数据、多媒体人才成

为新闻生产核心，与强调自治监督的传统记者形成职业价值观上的张力。然而，哈林-曼奇尼强调，新闻业危机并非技术本身所致，而源于社会与政治结构的深层转型。从哲学史脉络看，新型技术能力与传统价值规范之间的张力，折射出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揭示的现代性困境——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前者强调“如何生产”的效率与技能，后者追问“为何生产”的价值与信念。但是，诚如韦伯所提醒，价值理性已从公共领域退入私人领域，而工具理性主导的现代社会又无法提供替代性的伦理根基<sup>[31]</sup>。因此，新闻专业主义的困境并非数字技术的产物，而是西方事实-价值二分所导致的现代性价值危机的历史必然走向。然而，人类对善好的追求作为一种本性从未消亡，只是需要寻求新的承载形式。

那么，新闻业所承载的价值规范将走向何方？哈林-曼奇尼指出，新闻职业规范并非单一模式，例如，波兰新闻业曾出现“政治性规范”<sup>[32]</sup>，与自由主义体制中的“客观性或中立性专业”形成鲜明对比。在2012年主编的《超越西方世界的比较媒介体制》（以下简称《超越》）中，他们进一步提出，不同体制可能孕育多种混合型或局部性的职业规范形式<sup>[33]</sup>。这种政治性职业规范虽非未来唯一走向，却极具启示意义。韦伯指出，新闻工作者承载“以政治为业的命运”<sup>[34]</sup>，而政治诉诸责任伦理，即在多元价值冲突中评估后果并承担责任，而非诉诸抽象价值。由此观之，新闻业的传统模式与政治性职业规范的分野，不仅是比较研究中空间维度的差异，更可能是现代性张力不断显现下的一种历史性走向。

### （四）“国家角色”的政治性升级

在《比较媒介体制》中，国家角色描述国家干预媒介的程度和性质，其干预类型包括所有者、管制者、资助者及新闻的“首要定义者”，最典型的干预形式是公共服务广播电视<sup>[35]</sup>。

进入数智时代，国家角色的内涵与实践形态发生了重要变化，学界关注三个方面。一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成为新焦点，有学者建议增

加“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对数字媒体行为者与内容的政策”等指标，以反映国家从内容规制向基础设施治理的战略转移<sup>[36]</sup>。二是直接管控方式的变化。跨国平台通过算法推荐、内容审核和规则制定深度介入信息流通，行使了传统上属于国家的部分制度性权力<sup>[37]</sup>。这使得以国家为中心的干预模式必须与平台权力并存。三是分析单位面临挑战，传统基于民族国家的比较单位，已难以回应平台的“超国家化”（supranationalization）体制结构<sup>[38]</sup>。

然而，这是否意味着国家在数智时代的退场？事实可能恰恰相反。政治平行性的“社会化”转向，恰恰要求国家角色进行相应的政治性升级以作回应。近年来，世界各国政府不断加强数字空间的治理：澳大利亚于2021年颁布《新闻媒体和数字化平台强制议价准则》，设立平台与新闻机构的强制议价和仲裁机制。加拿大于2022年提出《在线新闻法》（C18），2023年实施后要求平台向新闻机构支付年度补偿。英国于2023年通过《网络安全法》（Online Safety Act），要求平台对用户生成内容承担更大监管责任。中国在网络领域立法已超过160部<sup>[39]</sup>，涵盖内容治理、数据安全、平台责任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等。曼奇尼指出，互联网去制度化的表象下正形成一种新的再制度化<sup>[40]</sup>进程。国家并未离场，而是其角色内涵从台前的直接控制者，转向通过制度化方式行使政治权威的规则制定者、制度协调者与制度性基础设施提供者。这一转变在非西方语境中尤为显著。《超越》一书强调，理解当代国家角色需重视政党体制处理政治冲突与多样性的方法（这与政治平行性的新焦点内在相通），以及理性的法定权威与媒介体制的关系<sup>[41]</sup>。当政治平行性反映出社会政治分歧的碎片化与极化时，国家角色的政治性升级就体现为通过制度化方式对经由媒介与平台机制显化的社会政治分歧进行整合、疏导与规制，从而在去中心化的传播生态中重塑政治秩序。因此，可以说，政治平行性的社会化转向与国家角色的政治性升级构成了一体两面的关系。

## 二、数智时代比较媒介体制变迁的范式建构

上述从媒介市场结构、政治平行性、新闻职业规范与国家角色四个维度的分析表明，数智技术并未瓦解经典的比较媒介体制框架，反而凸显并重构了其核心理论内核，媒介体制在本质上依然是一种由政治逻辑塑造的深层结构。这确证了“媒体的政治性结构”这一视角的持续解释力。该结构并非僵化的制度，而是在技术冲击下，通过四大维度的历史性重构，展现出内在体制延续与外在形式创新的辩证统一。数智技术非但未消解其政治性本质，反而促使政治性结构以高度的适应性进行重新配置，从而再次确立了政治逻辑的根本性牵引。由此，对媒体的政治性结构的思考，必然需要从相对静态的类型学转向对其动态变迁，即政治性结构在历史中如何重新实现新兴媒介技术的制度性安排的考察。为此，本文提出“结构中的媒介技术”这一中观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总结数智时代媒介体制变迁的三种模式，从而解释制度变迁的深层历史动力与内在演化逻辑。结构中的媒介技术是媒体的政治性结构这一存在论视角在历史分析中的具体理论工具，它将静态的结构概念转化为能够解释动态变迁过程的分析框架。

（一）结构中的媒介技术：比较媒介体制变迁的分析框架

在《比较媒介体制》中，哈林-曼奇尼指出，民主法团主义模式和极化多元主义模式正在向自由主义模式趋同<sup>[42]</sup>。这一变迁主要由世俗化、商业化等内生力量推动，技术影响有限。他们强调“技术的影响当然不能与技术在其中被改造和实施的语境相分离，我们不能夸大大众传播技术的标准化作用”<sup>[43]</sup>。

哈林与曼奇尼承认互联网与数字平台的兴起可能构成新的趋同力量。西欧和拉丁美洲<sup>[44]</sup>、西班牙和德国<sup>[45]</sup>等地区的比较研究表明，跨国平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新闻供给与消费的相似化趋势。然而，这种趋同作用的范围十分有限。一方面，跨国媒体的影响早在卫星电视阶段已存在，互联网只是加速而非创造了这一趋势<sup>[46]</sup>；



另一方面，趋同主要局限于跨国平台化媒体这一特定领域，即那些深度依赖谷歌、脸书、推特等平台的国家在“内容流通的方式和限制”<sup>[47]</sup>上趋同，而未接入的平台环境则未必如此。

跨国比较研究也对全球趋同论提出有力挑战。在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美国、瑞士、爱尔兰等西方国家的研究中，出现并行位移、持续特殊性、新特殊性乃至反向趋同等多样化变迁路径<sup>[48][49]</sup>。在非西方语境中，强国家干预、本土市场规模、政治极化等因素凸显出制度的持续作用，进一步证实了政治结构的韧性<sup>[50][51]</sup>。哈林与曼奇尼因此坚持其原初判断，认为“媒介体制之间的差异仍然显著，并且很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阻止媒介体制的完全同质化”<sup>[52]</sup>。

基于此，本文提出“结构中的媒介技术”作为一种数智时代媒介体制变迁的中观分析框架。所谓结构，沿袭比较媒介体制研究的原初界定，指媒介与政治之间的制度性关系，其强调媒介体制作为“一组相互关联的元素”<sup>[53]</sup>的系统特性，而非孤立分析其中任何一方。曼奇尼进一步将媒介体制明确为“包括在给定的社会和政治系统（通常是国家）内组织和运作的所有大众媒体”，以及“在特定环境中的程序和文化”<sup>[54]</sup>。这种结构主义与理性主义、文化主义形成对比<sup>[55]</sup>，其特别强调制度在变迁中作为结构性条件，对新兴媒介技术在媒介体制中的发展方向施加约束。

## （二）比较历史视野下媒介体制变迁的三种模式

在数智时代理解媒介体制变迁，需要同时处理政治性结构的持续效力与媒介技术的动态冲击之间的张力。基于哈林-曼奇尼的比较媒介体制理论，并结合新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变迁的相关解释，本文从两个维度对变迁模式进行划分：第一，变迁驱动力来源，可区分为外生驱动（技术作为外部冲击进入制度结构）与内生驱动（制度系统内部生成新的演化动力）；第二，与既有结构的关系，可区分为强化（既有结构吸纳并约束技术）、补位（新媒体在制度空隙中承担缺失功能），以及重构（制度内部发生形态变化）。基于上述维度，数智时代的比较媒介体制变迁概括

表1 媒介体制变迁的三种模式

| 模式   | 驱动来源 | 与既有结构关系 | 连续性 | 核心机制 | 技术角色         |
|------|------|---------|-----|------|--------------|
| 制度延续 | 外生   | 强化      | 连续  | 路径依赖 | 被吸纳并强化原有制度特质 |
| 制度偏移 | 外生   | 补位      | 非连续 | 填补空隙 | 弥补原有制度的功能不足  |
| 制度自生 | 内生   | 重构      | 连续  | 自生重构 | 内生变化的外在表现    |

为三种典型模式：制度延续、制度偏移与制度自生（表1）。

其一，制度延续模式，即沿着既有体制特征的路径依赖式发展。该模式强调媒介体制的稳定性，认为数字技术作为外生变量，其效应受到既有政治与媒介结构的深刻制约。在这一模式下，新媒体的发展并不会打破原有模式，而是嵌入既有结构，表现为延续性变迁，凸显的是制度的韧性。多项比较研究为此提供了经验证据。例如，当美国的点击量绩效评估体系扩散至法国时，由于法国媒体内部缺乏美国式的制播分离传统，导致法国记者面临更大的工作压力<sup>[56]</sup>。同样，意大利的“在线请愿”等数字实践反而强化了其极化多元主义体制中的政治平行性特征<sup>[57][58]</sup>。这些案例表明，数字化趋势并未产生新的模式，其效应由接收国的原有体制特征所规范。这种现象与历史制度主义的路径依赖解释一致，即“系统未来的发展方式由其先前的发展所决定”<sup>[59]</sup>。

其二，制度偏移模式，即通过填补制度空白实现的非连续性发展。该模式揭示了媒介体制在数智时代的一种重要变迁形态：非连续性的、以功能补位为导向的发展路径。其核心逻辑在于，当传统媒介体制在特定功能领域存在结构性缺失时，新媒体形态能够切入这些未被充分覆盖的“制度空隙”，发挥替代性或补充性作用。哈林将这一过程概括为“填补利基”（fill niches）<sup>[60]</sup>。跨国比较研究为制度偏移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证据。在北欧民主法团主义国家与法国极化多元主义模式的对照中可见，尽管两者均具有强国家干预传统，但数智时代的媒介生态演变却呈现显著差异，北欧国家的传统媒体在数字空



间中继续保持主导地位，而法国则涌现出大量本地化在线媒体<sup>[61][62]</sup>。这一经验差异的合理解释是，法国本地在线媒体的繁荣并非源于新媒体技术本身的强势，而是其极化多元主义模式中传统媒体社会表达功能不足的结构适应性反应。拉丁美洲的案例同样具有代表性，由于传统媒体过度依赖政治精英，导致独立记者纷纷转向数字平台开展新闻生产。总之，制度偏移的本质是数字技术对制度缺陷的补位，而非对原有模式的简单颠覆。

其三，制度自生模式，即制度系统的内生性重构。与前两种模式不同，制度自生模式强调体制本身的自我生成性（autopoiesis），即制度通过对外部环境的反应而不断重塑内部结构<sup>[63]</sup>。美国的媒介体制变迁为此提供了典型例证。新世纪以来，美国的媒介体制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甚至根本性的变化。例如，党派媒体的兴起、新闻专业主义的减弱、事实性共识的消退等，这些现象与比较媒介体制中对美国属于自由主义模式的论断相悖。这些新的变化与新兴媒介的影响相伴相生。有学者认为，这些变化意味着美国的媒介体制已从“自由主义”模式转变为“两极分化的自由主义”的模式，即自由主义模式中混合了一些极化多元主义模式的特征<sup>[64]</sup>。但是，哈林对此表示反对，认为近年来美国媒介体制的变化，不是某一种媒体模型变得“混合”，而是该模式内部已经发生改变<sup>[65]</sup>。更明确地说，基于系统的自生性，原有模式本身就具有向当前趋势发展的潜力，数字技术的作用在于反映这些既存倾向，而非创造了全新的制度逻辑。因此，这是媒介体制的自生，而非体制的混合。

以上三种模式共同验证了结构中的媒介技术解释框架：制度延续与制度自生均体现制度发展的连续性逻辑，但前者表现为数字技术被既有政治结构吸纳并强化制度特质，后者则是系统内生演化，数字技术仅作为外在表现。制度偏移则体现出一种非连续但仍受结构约束的补位逻辑，即新媒体通过填补传统体制的功能空白而获得发展。新兴媒介的发展始终紧密嵌入既定的政治-媒介结构，在延续制度主线的同时可能引

发局部调适，但难以突破政治性结构的整体制约框架。

（三）突破“极化多元”：基于中国经验的媒介体制变迁解释重构

比较媒介体制原初理论的核心贡献在于突破普世理论的抽象思维，推动媒体与政治关系的“空间化”类型学分析框架的建构。新世纪以来，在媒介与政治的双重演化下，该研究内部推动了这一研究范式的“时间化”理论检验，从静态比较研究向动态变迁分析方向发展。这一转向为我们重新理解中国媒介体制的独特发展路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发。

哈林-曼奇尼提出的比较媒介体制理论，源于对西欧与北美18个国家的政治与媒介关系的类型学归纳，其比较方法论是“最具相似性系统设计”。这一根植于西方经验的理论框架与中国经验之间存在显著的解释冲突。2011年，哈林-曼奇尼在《超越》一书中尝试以“最具相异性系统设计”拓展理论边界，将非西方国家纳入比较视野<sup>[66]</sup>。有研究认为中国在四个比较维度上与“极化多元主义模式”存在相似性<sup>[67]</sup>。然而，这种基于维度对应关系的归类，也引发了关于概念适配性的讨论：中国媒介体制“不仅不是极化的，甚至是寻求共识的；中国也不同于西方国家倡导的竞争性质的多元权力结构，而以集中型权力结构为基本特征”<sup>[68]</sup>。哈林-曼奇尼承认，“试图使中国适用于我们三个模式所搭建的三角形，这种尝试简直是愚蠢的”<sup>[69]</sup>。面对这一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有学者提出不同解释。赵月枝认为，《传媒的四种理论》所代表的意识形态与国家建构分析传统，在解释中国媒介制度时仍具参照意义<sup>[70]</sup>；秦汉则指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活动显著区别于西方的商业或专业范式<sup>[71]</sup>。然而，这些回应仍未能真正弥合理论与中国经验之间的断裂，反而将中国置于全球比较坐标的“例外”位置，这是一种理论上的回避。基于中国经验的自主理论建构目标，要求我们进一步突破既定理论的适用性讨论，转向基于中国经验内在的普遍性来重构理论解释。

当前比较媒介体制理论所归类的“极化中

国”与现实所呈现的“共识中国”之间的“知识裂缝”，恰恰是中国媒介体制研究再出发的理论起点。唯有通过历史与比较的双重视角，将中国置于全球媒介体制变迁的多线发展图景中，才能揭示其在四大维度上的差异化实践，进而为其在世界理论谱系中找到恰当的理论位置。从方法论层面看，中国在比较研究中的价值应被理解为构建最大普遍性知识体系的“极端案例”。在比较研究方法论中，极端案例指那些关键变量处于极端取值的样本<sup>[72]</sup>。正如斯考克波（Theda Skocpol）在《国家与社会革命》中对法国、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比较研究所展示的，极端案例的比较能够有效凸显理论的边界<sup>[73]</sup>。将中国定位为比较空间中的一极，并非将其视为例外，而是通过其与自由主义模式等另一极的对照，共同构建更具包容性与解释力的普遍性理论体系。这一方法论立场，使中国经验得以超越特殊性与普遍性的二元对立，成为重构比较媒介体制理论的关键支点。

伴随比较媒介体制理论从空间性研究向时间化转向，中国媒介体制研究亦在同步推进理论解释的更新。2012年，唐文方与伊扬格（Shanto Iyengar）在《政治传播》（*Political Communication*）期刊组织《中国政治传播》专题并集结成书，提出中国新闻媒体的市场化改革推动了“媒介体制”的浮现，这一进程被西方学界视作中国出现“政治传播”的重要标志<sup>[74]</sup>。然而，中国传媒管理制度实践并未止于西方标准。自2013年全面深化改革启动以来，传媒管理制度发生深刻变革，具体体现在三个顶层设计方向上。一是新闻出版业与电影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相关职能划归中央宣传部，并分别组建与内设局相对应的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电影局。二是广播电视系统重组。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职能调整并得以重组，同时三台融合后整合成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归口中宣部领导。三是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及其职能机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成立，网信职能从审查管理向信息化建设、网络生态建设转型<sup>[75][76]</sup>。这些改革标

志着中国正在形成一个更加复合、不同媒介管理形态相互协同的传媒治理体系。从比较历史视野出发，可将中国传媒管理制度的演进路径理解作为一种突出系统整合、实践创新的复合型变迁道路。借助哈林-曼奇尼的变迁类型学，可辨识出三类机制的共同作用。

其一，制度延续。中国媒介体制在结构性层面表现出强烈的路径依赖特征。哈林的研究指出，中国互联网空间的独特结构，亦即其“庞大的内部市场”与“强大的国家干预”，都是原有体制特征的延续<sup>[77]</sup>。这不仅体现于互联网领域，自全面深化改革以来，中国传媒管理体制机制的宏观架构也清晰表明，党的领导组织结构保持了高度稳定性。更重要的是，体制延续并非静止，改革进程实现了制度的系统性再整合，体现出结构内部的调适能力，制度并未被技术颠覆，而是通过再制度化实现更新。这一延续与调适并存的进程，为比较媒介体制理论中两个关键维度的更新提供经验依据。一是政治平行性。中国经验强调政党在媒介体制中的核心作用，这直接修正了哈林-曼奇尼关于“政治平行性”中“政党退场、社会主导”的理论更新方向，与其在《超越》中指出的，在非西方语境中政党体制至关重要这一认识相通。中国政党制度具备高度权威性，其引导的传媒改革并非顺应社会观念的极化趋势，而是通过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网信系统的破茧行动等着力克服该趋势。二是国家角色。中国通过顶层制度设计推进传媒管理的制度化改革，已经超越了原初理论中将国家角色局限于“所有者/管制者/资助者/首要定义者”的角色框架，与哈林-曼奇尼强调在非西方情境中，“理性的法定权威”这一理论拓展方向相契合，国家角色归根结底是一种“制度权威”，而不仅仅是外在于社会的控制者。更重要的是，这两个维度在中国实践中呈现出显著的整合特征，即“政党领导国家”，既将现代国家的制度化特征导入政党的自我革新，亦将政党固有的沟通（communication）功能深度嵌入国家治理体系<sup>[78]</sup>。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经验对“国家角色的政治性升级”的回应，

超越了传统国家理论的解释力，进入著名的“施米特之问”：政治区别于国家，其固有客观本质与自主性何在？<sup>[79]</sup>通过政党领导国家的实践，可能正是中国经验为比较媒介体制理论提供的最具原创性的知识贡献。

其二，制度偏移。中国媒介体制变迁同样呈现出显著的偏移特征，这一点在互联网民意表达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前所述，偏移的本质是“结构性空白的填补”。中国网络表达的活跃不能简单归因于技术自发性，而应被理解为在既有媒介功能格局基础上，为回应数智时代更为多元、即时的民意表达需求而进行的制度性创新与功能补位。因此，与哈林所强调的延续论判断不同，中国媒介体制变迁显示出明显的偏移特质。特别是在网信系统建立之后，民意通过直达个体的媒介接口进行表达，经由基层舆情机制的捕捉，实现具体事件诉求的属地化回应，并最终反馈至民众。这在传统媒介未能覆盖的信息流程中，系统性地构建起涵盖输入、输出与反馈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沟通机制<sup>[80]</sup>。

其三，系统创造，或者说超越自生的制度创新。中国媒介体制变迁不仅展现出延续与偏移的双重特质，更呈现出独特的制度内在的创造性。它不同于西方语境中从自由主义向极化方向的自生演进，而是体现为一种系统的重构能力，即在保持根本原则连续性的前提下，通过制度创新实现结构优化的能力。中国的媒介与政治关系由此具备突破压制—反抗二元对立叙事范式的可能性，转向国家与社会互构、整合与引导并立的创新模式。这种互构型变迁为比较媒介体制的另外两个维度，即媒介市场结构与新闻职业规范的理论更新提供启发。在中国语境下，媒介的转型路径并非走向去国家化，而是通过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实现与政治性结构的深度同构，进而发展出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并进的公共治理体系。具体而言，在媒介市场结构维度，中国实现了从传统报刊发行向平台治理的转型，通过建立平台责任制与破除信息茧房效应等网络生态治理体系<sup>[81]</sup>，重

构媒介市场的组织逻辑与运行规则。在新闻职业规范维度方面，则通过技术赋能与制度协同，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前提下强化职业实践的公共内涵。以上中国传媒治理前沿探索与西方极化多元主义预设的“社会逃离中心”的逻辑截然不同，它致力于通过制度性整合吸纳多元表达，在保持社会活力的同时有效克制“离心”倾向，推动形成更具包容性的政治发展路径。因此，中国的媒介体制类型不仅构成了自由主义模式的对照系，更是极化多元模式的替代方案，同时与民主法团主义中政治与媒体的协商治理模式在政治智慧上具有深层的互通性。

### 三、结论与讨论：迈向结构主义的历史创造论解释

理论从不是静止的文本，而是始终处于历史变化之中。比较媒介体制理论的原初问题意识在于，面对“强大的政治”现实，通过情境化研究“体面地埋葬”如《传媒的四种理论》般带有“普世”野心却未能摆脱价值判断的理论；而在数智时代，该理论面临的新挑战则是，如何应对“强大的媒介”，避免被技术变迁的洪流“粗暴地埋葬”。围绕比较媒介体制理论的争议与回应，呈现的正是理论在面对不同时代命题时的自我更新。媒介变迁不仅是技术形态的变化，更是时代变迁的“讯息”。在这一背景下，媒体的政治性结构理应被视为理解媒介存在方式的不可或缺的理论视角。政治并非媒体的外在约束，而是“在媒介之中”参与其制度性构造。本研究从两个方向论证上述观点。其一，通过系统梳理比较媒介体制研究的学界争议与作者回应，可以发现，尽管数字环境带来诸多新变数，但媒介市场结构、政治平行性、新闻职业规范与国家角色背后的比较“硬”逻辑依然成立。时代变迁淘汰了冗余的经验解释，反而使理论内核更加明确。其二，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结构中的媒介技术这一制度变迁的中观分析框架，并总结媒介体制变迁的三种模式类型，从而推动比较研究从静态的空间类型学，走向动态的时间性制度变迁分析。





中国的实践道路为这一理论转向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比较媒介体制理论虽根植于结构主义理论基础，但中国经验表明，任何理论模型都具历史条件性，而非历史终结的定论。中国传媒制度的改革方向，并非极化多元主义模式预设的“逃离国家”，而是通过能力建设与制度创新，使媒体融入国家治理与公共服务体系之中。媒体作为国家与社会间的公共行动者，在既定制度结构中所展现出的能动性，为一种历史创造论提供了生动的实践注脚，这在结构主义的规制视野中更显弥足珍贵。

展望未来，中国完全有能力、也有责任在鲜活的实践基础上，为全球媒介体制理论贡献新的知识增长点。在理论应用方面，可将结构中的媒介技术框架应用于国家传播能力建设、媒体公共服务体系、平台治理、数字国家治理接口等新兴制度场景，引领全球南方经验与西方经验之间的深度对话，以构建更具普遍性与包容力的知识体系。在概念创新层面，须在比较视野下结合全球前沿经验，推动四大比较维度中各二级概念的进一步等价升级，尤其侧重政党理论、国家治理与媒介制度等三者交叉领域的理论创新。在方法论层面，可融合比较历史分析与过程追踪方法，揭示制度与技术长时段互动中的因果机制。在实践旨归方面，数智时代的传媒治理，其走向绝非消解政治，而是融入政治，通过创造性的制度安排，引导并驾驭技术变革，从而塑造一种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融为一体，并有效支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传媒新秩序。这既是一项艰巨的理论任务，也是一条值得期待的实践道路。

（责任编辑：李韵奕）

## 参考文献

- [1] Esser F. Advances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hrough contextualization and cumulation of evidence[J].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019, 36(4): 680-686.
- [2] Norris P. Comparativ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s: Common frameworks or Babelian confusion?[J].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2009, 44(3): 321-340.
- [3][48] Nielsen R. K. The Absence of structural Americanization media system developments in six affluent democracies, 2000-

2009[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2013, 18(4): 392-412.

[4][15][29][36] Mattoni A, Ceccobelli D. Comparing hybrid media systems in the digital age: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analysis[J].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8, 33(5): 540-557.

[5][61] Perusko Z, Vozab D, Cuvalo A. Digital mediascapes,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and audience practices across Europ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5, 23(9): 342-364; 23.

[6] Flensburg S, Lai S. S. Comparing digital communication systems: An empirical framework for analys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s[J]. *Nordicom Review*, 2020, 41(2): 127-145.

[7] Flensburg S, Lai S. S. Mapping digital communication systems: Infrastructures, markets, and policies as regulatory forces[J].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20, 42(5): 692-710.

[8] Strömbäck J. Four phases of mediatiz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mediatization of politics[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2008, 13(3): 228-246.

[9] Mazzoleni G. Media logic and party logic in campaign coverage: The Italian general election of 1983[J].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87, 2(1): 81-103.

[10] 安德鲁·查德威克. 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M]. 任孟山，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23-24.

[11][14][16][18][19][20][22][27][32][35][42][43] 丹尼尔·哈林，保罗·曼奇尼. 比较媒介体制：媒介与政治的三种模式[M]. 陈娟，展江，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21,23-25；23；23-24；21；27；27-28；34-36；39；21，42，44；249-250；257.

[12][50][52] Hallin D C, Mancini P. Comparing media systems: A response to critics[M]//The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Routledge, 2013: 56; 207-220.

[13][53][59][60][63][77] Hallin D C. Comparative media studies in the digital age: Comparative research, system change, and the complexity of media system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20, 14(14): 5775-5786; 12.

[17][33][41][65][66][69] Hallin D C, Mancini P. *Comparing media systems beyond the western world*[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288; 290; 6; 5.

[21] Pas V D, Daphne J, Brug V D, et al. Political parallelism in media and political agenda-setting[J].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017, 34 (4): 491-510.

[23] Michael B., Anamaria D. S. & Duje B. Reconceptualizing Cross-Cutting Political Expression on Social Media: A Case Study of Facebook Comments During the 2016 Brexit Referendum[J].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023,40(6):719-741.

[24] Ekeoma E. U. Democracy Intercepted[J]. *Science*, 2023 ( 381 ) :386-387.

[25][26] Mancini P. Instrumentalization of the media vs. political parallelism[J].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2, 5(3): 262-280; 269.

[28][37][40][47][54][64] Mancini P. Comparative media studies

in the digital age: Comparing media systems and the digital ag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20, 14(14): 5761–5772; 14.

[30] Deuze M, Witschge T. Beyond journalism: theoriz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journalism[J]. *Journalism*, 2018, 19(2): 165–18.

[31][34] 马克斯·韦伯. 学术与政治 [M]. 冯克利,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38–39; 73.

[38] Carelli P. Media systems beyond national boundaries: Towards a new paradigm?[J]. *Journal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2014, 6(6): 85–91.

[39] 金歆. 推动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 开创网络强国新局面 [N]. 人民日报, 2025-12-2(2).

[44] Boczkowski P J, Mitchelstein E, Walter M. Convergence Across Divergence: Understanding the Gap in the Online News Choices of Journalists and Consumers in We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J].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11, 38(3): 376–396.

[45] Hallin D C, Mancini P. American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secularization: Understanding the convergence of media systems an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M]//*Comparing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25–44.

[46][57] Hallin D C, Mancini P. Ten years after comparing media systems: What have we learned?[J].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017, 34(2): 155–171.

[49] 王亮. 媒介体制的模式与变迁: 基于《比较媒介体制》的实证研究 [J]. 国际新闻界, 2022(9): 154–176.

[51][68] 苏颖, 张振娇. 突破西方情境: 比较媒介体制研究的理论适应性拓展 [J]. 国际新闻界, 2022, 44(4): 131–153.

[55] 李路曲. 比较政治传播学解析 [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 259.

[56] Christin A. Counting clicks: Quantification and variation in web journ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ance[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8, 123(5): 1382–1415.

[58] Cristian Vaccari. The news media as networked political actors: How Italian media are reclaiming political ground by harnessing online participation[J].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2011, 14(7): 981–997.

[62] Hölig S, Nielsen R K, Schröder K C. Changing forms of cross-media news use in western Europe and beyond[C]//*News across media*, Routledge, 2016: 102–122.

[64] Nechushtai, Efrat. From liberal to polarized liberal? Contemporary U.S. news in Hallin and Mancini's typology of news systems[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2018, 23(2): 183–201.

[67][70] Zhao Y. Understanding China's media system in a world historical context[J]. *Comparing media systems beyond the Western world*, 2012: 143–176.

[71] 秦汉. 中国特色新闻媒介体制——构成分析与发展前景 [M].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22: 95.

[72] 耿曙. 提升质性研究论证质量的两种途径 [J].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2023(3): 103.

[73] 西达·斯考切波. 国家与社会革命: 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185–187.

[74] Tang W, Iyengar 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China* [M].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1–4.

[75] 苏颖, 于淑婧. 权威性沟通及其变革——中国共产党百年政治传播制度变迁研究 [J]. 政治学研究, 2021(4): 50–63.

[76] 苏颖, 于淑婧. 制度化扩张: 中国政治传播机构改革研究 (2018–2022) [M]// 政治学前沿 (第2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5: 186–205.

[78][80] 苏颖. 整合型沟通: 新时代中国政治传播机制现代化走向 [J]. 南京社会科学, 2025(5): 88–97.

[79] 卡尔·施密特. 政治的概念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107.

[81] 中国网信网. 中央网信办持续加强信息推荐算法治理 [EB/OL]. [https://www.cac.gov.cn/2025-05/22/c\\_1749536203490537.htm](https://www.cac.gov.cn/2025-05/22/c_1749536203490537.htm), 2025-05-22, 2025-10-02.

##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of the Media and Its Institutional Change: Paradigm Reconstruction of Comparing Media Systems in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Age

Su Ying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of the media”, as the theoretical core of the “media system”, emphasizes that media are inherently political institutions rooted in specific power structures,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historical traditions. Although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es have profoundly transformed the media environment, the four classical dimensions of comparison—namely, press market structure, political parallelism,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 code, and the role of the state countries—remains theoretically stable, while their vitality requires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 through empirical extension and indicator upgrading. The “media technology in structure”, as a meso-level analytical framework, highlights that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of the media adaptively reconfigures emerging media technologies. It identifies three modes of media system change in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i.e., institutional continuity, institutional deviation, and institutional autopoiesis. This framework shifts the Comparing Media Systems from static spatial typologies to dynamic analyse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forming a new paradigm for explaining development and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media systems. China's media system reform, characterized by systemic integration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goes beyond explanations grounded in the original theory of polarized pluralism, and provides essential empirical support for constructing a globally generalizable knowledge system of media institutions.

**Keywords:** comparing media systems; political structure of the media; media technology in structure; digital intelligence age; paradigm reconstruction

**Author:** Su Ying, Institute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 School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Affairs,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 从书写到编程： 论弗卢塞尔的人工智能媒介思想

周海宁

**摘要** 威廉·弗卢塞尔在其媒介哲学中，通过“程序化思维”“装置”与“人工智能”等核心概念，对人类传播所经历的从“书写文明”向“程序化文明”的转型进行了深刻的探讨。他指出传统书写思维的线性、历史性、批判性特征正让位于程序化、功能性的符号编码逻辑。其中，“装置”作为程序化思维的运行母体，它吞噬历史而生成后历史（技术图像），使人成为“功能执行者”，最终导致人类主体性的稀释。特别是作为程序化装置的人工智能，它成为人类大脑功能的外部投射与模拟，从而进一步加剧这一危机。基于此，本文考察弗卢塞尔的程序化思维、装置与人工智能间的内在逻辑，归纳其人工智能媒介思想的理论图谱，并为理解数字时代技术—文化困境提供理论资源。本文进一步以现象学—生存论方法完成“二次转译”，将主体性危机转译为媒介本体论内部的生成性问题，为数字时代再访人的主体性提供理论切口。

**关键词** 弗卢塞尔；程序化思维；装置；人工智能；媒介哲学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周海宁，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讲师，山东济南 250013

近年来，ChatGPT、Sora、DeepSeek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爆发性发展，使人工智能技术已然从技术奇观迅速渗透至社会文化与日常生活的肌理中。这些人工智能技术不仅重塑着知识生产、艺术创作与传播沟通模式，更深刻地触发了关于人工智能独特性<sup>[1]</sup>、未来主体性<sup>[2]</sup>、人机关系<sup>[3]</sup>、人技关系<sup>[4]</sup>的广泛焦虑与辩论。然而，若我们的审视仅停留在技术应用的层面，便错过了问题的核心。真正亟待解答的哲学叩问在于：人工智能的崛起，是否预示着一种人类基础性思维范式的革命？人类能否获得真正的自由而得到解放？人类是否正从延续数千年的“书写文明”迈入一个全新的、运作逻辑迥然相异的“程序化文明”？

在这一宏观视域下，大多数讨论聚焦于当下或展望未来，却罕有思想资源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深邃的历史性视野，用以理解这场变革的深层文化逻辑与哲学起源。而巴西籍媒介哲学家威廉·弗卢塞尔（Vilém Flusser）犹如先知一般在其著作中进行了相关反思。他预见性地指出，传统线性、历史性的文字思维正让位于程序化、功能性的符号编码逻辑。这种转变不仅是媒介形式的更迭，更是人类感知世界与建构意义方式的根本重构。弗卢塞尔认为，技术图像与算法程序正在成为“新的文本”，而操作者与装置之间的协作，



即装置-操作者复合体<sup>[5]</sup>模式正形成当代认知的基本模式。其中,操作者为装置技术的使用者,而装置是创制技术图像等所必需的工具。这一文明转型的关键在于从对意义的解释转向对功能的执行,也就是从文字历史的书写时代跃入装置的操作时代,从而重新定义了思想本身的可能性条件。

弗卢塞尔的核心命题是字母-数字符号化书写的没落与数字符号编码的兴起,亦即听觉为主的文明(字母-文字文化)被视觉为主的文明(图像文化)所替代。他指出,以线性排列字母与文本记号为特征的“书写”已没有未来,因为它正被一种更具优势的新符号——数字符号所超越<sup>[6]</sup>。他认为这场符号体系的变迁,其意义堪比文字在历史开端时对传统图像的超越。字母-数字符号作为“启蒙符号”,支撑起了整个西方的历史意识、批判思维与进步观念,即所谓的“书写思维”。而数字符号的出现,则意味着一种后历史的、后文字的思维方式正在生成,它是与线性、过程性意识形态的对抗<sup>[7]</sup>。

尤为重要的是,弗卢塞尔并未止步于媒介比较。他以其文化人类学式的传播哲学方法,极具预见性地勾勒出了这一符号变迁下的三个关键哲学概念:“程序化思维”“装置”与“人工智能”。他精准地描述了思维如何从批判性的“书写思维”转向功能性的“程序化思维”<sup>[8]</sup>;揭示了“装置”如何成为一种吞噬历史而生成后历史,并自主运行的母体<sup>[9]</sup>;最终指出,作为程序化装置的人工智能,它在本质上并非外来之物,而是人类大脑认知过程的外部模拟与功能投射<sup>[10]</sup>。

尽管弗卢塞尔的思想极具原创性与前瞻性,但相较于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等媒介理论家,中文学术界对其的研究仍处于引介与起步阶段。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其技术图像理论(王伟<sup>[11]</sup>、焦自英<sup>[12]</sup>、李雨轩<sup>[13]</sup>、李一君<sup>[14]</sup>)、装置批判理论(于成<sup>[15]</sup>、张巧<sup>[16]</sup>)、传播及媒介哲学(刘海龙<sup>[17]</sup>、张先广<sup>[18]</sup>、周海宁<sup>[19]</sup>、李慧敏<sup>[20]</sup>)等相关论述。这些研究反应了中国学者试图以弗卢塞尔的理论工具,回应本土媒介

化现实中的紧迫问题——从技术图像对认知模式的重构,到算法支配下的主体性危机,再到技术异化中自由之可能性的探寻,等等。然而,现有研究对弗卢塞尔思想中关于程序化(编程)、装置,以及在此基础上所生成的人工智能思想的专门性、系统性研究尚显不足。弗卢塞尔的人工智能思想集中见于以“历史思维的书写-程序化思维的编程”(《书写有未来吗?》)和“程序-装置批判”(《摄影哲学的思考》)为内容阐释的著作中。此外,《传播学:历史、理论与哲学》是弗卢塞尔思想结构化的大成著作,且比较清晰地呈现出其辩证的媒介观与后历史思想等。因此,本文以此三部著作作为锚定文本,力图将弗卢塞尔关于程序化(编程)、装置、媒介等的思考,梳理为清晰的人工智能思想脉络。

本文的论述将遵循以下核心思路:以“程序化思维”为逻辑起点,揭示其运作的基本法则;以“装置”为结构核心,剖析这一思维得以运行的母体与权力架构;最终,抵达其人工智能哲学思想,论证人工智能作为装置,如何成为大脑功能的外部投射与模拟,并由此带来深刻的人类传播文化与主体性危机(弗卢塞尔同样论述过对主体性危机的超越策略及新主体登场逻辑的探求,但本文仅呈示问题意识,为后续研究留一接口)。在此过程中,本文将适时地与德国媒介理论家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与伯纳德·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等人的思想进行关键性互文,以期在更广阔的学术谱系中定位并彰显弗卢塞尔思想的独特价值。

## 一、程序化思维:功能化时代的逻辑先声

弗卢塞尔媒介哲学的革命性,首先在于他精准地捕捉到了一场发生在人类思维深处的静默革命。他认为,支配西方文明数千年的“书写思维”正走向没落,一种新的、与之截然不同的“程序化思维”随着数字符号超越字母-数字符号而诞生。这种思维范式的转向,并非简单的技术进步,而是整个文化逻辑与认知模式的

根本性变迁,构成了我们今日所谓“功能化时代”的逻辑先声。

要理解程序化思维的革命性,必先明确其前置思维——“书写思维”的基本特征。在弗卢塞尔看来,以字母-数字符号为基础的书写,绝非仅仅是记录语言的工具,它本质上是一种塑造了西方历史意识的独特思维方式,即书写方式与人的思维方式具有相关性。

书写思维是线性的。其最直观的表现形式便是“文本记号被排列(秩序化)成行,并且每一个记号都已经在这种一维的秩序中占据着一定空间”<sup>[21]</sup>。这种一维的、序列化的空间秩序,内化为了思维的秩序。思考必须沿着一条直线前进,从前提推向结论,从过去导向未来,任何徘徊、循环或多中心发散都被视为逻辑的瑕疵。这种线性结构,是逻辑推理、历史叙事和科学论证得以成立的基础。如此,弗卢塞尔确证了字母-数字作为启蒙符号的地位。

书写思维是历史性的。线性秩序天然地与时间性相结合,催生出“历史意识”,因此,书写思维是历史性的。弗卢塞尔深刻地指出,“历史是书写姿态的一个功能,也是在书写姿态中自我表现的意识的功能”<sup>[22]</sup>。在书写发明之前,事件仅是混沌循环(呈现无序、无向性)中的爆发,唯有在书写之后,事件才能被串联成具有方向性的“历史”,它是一种从过去经由现在奔向未来的发展过程。书写者与历史意识之间形成了一种反馈循环,即“书写的姿态使历史意识得以出现,且这一历史意识由于越来越多的书写而变得日益深化、强化”<sup>[23]</sup>。

书写思维是批判性与政治性的。文本是“半成品”,它“指向收信者”,并“要求他来完善它”<sup>[24]</sup>。文本意义的实现依赖于读者的阅读与解读,这一过程本身就内含了对话、质疑与批判的可能。同时,书写并公之于众“是一种政治姿态”<sup>[25]</sup>,因为书写者通过文本“施加压力……指向外部的他者”<sup>[26]</sup>,进而试图影响他人,参与公共领域的建构。所以,这就体现了“文本具有的古腾堡的动力学”<sup>[27]</sup>。

然而,弗卢塞尔断言,这种书写思维正让

位于“程序化思维”。这一转向的核心源于“规定”<sup>[28]</sup>(Vorschrift):即预先(前缀 vor-, 前面)写下的文字(schrift)指令性质的变迁。程序化思维的诞生,始于“程序”(Programm)这一新概念对传统“规定”的替代。弗卢塞尔从词源学上揭示了二者的关联与断裂:“程序”一词源于“规定”的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然而,当人们不再为他人书写,而是为装置本身书写时,书写的本质就发生了根本变化,以至于需要一个新名称——“程序化”(Programmieren),即编程。

这一命名的变化背后是思维逻辑的变革。传统的“规定”,无论是宗教诫命还是法律条文,其形式是命令性的陈述,即“你应该做……”。它预设了一个权威的立法者和一个具有自由意志、需为其行为负责的服从者,这是一种价值负载的、政治性的关系。而在程序化思维中,规定转变为功能性条件的陈述,即“如果……就……”。弗卢塞尔精辟地指出:“它们(这些规定)从命令性的命题(‘你应该干什么’)转变为功能性命题(‘如果……的话,那就去干……吧’)。”<sup>[29]</sup>也就是说,话语从“你应该”转变为“如果……就”,这标志着思维的功能化与去政治化。

“如果……就……”的陈述,排除了价值判断与道德命令,只剩下纯粹的、中立的条件与结果关系。它不关心行为本身的“善”与“恶”,只关心在给定输入下,系统是否能产生预期的输出。在电脑程序中,“所谓的‘必须做……’的道德性要求的象征并不存在……所有规定(以及整个西方历史)的倾向是所有态度的去政治化……人类与社会就像一个自动化(控制论)的系统一样,能自动、自发地调节自身”<sup>[30]</sup>。换言之,在完全去政治化的情况下,人类与社会就犹如控制论系统一样被自动操纵。如此,思维不再致力于探讨终极意义或正义原则,而是专注于设计最有效的流程、算法和解决方案。一个被完全程序化的世界,是一个去魅的、价值中立的世界,也是一个意义可能悄然消散的世界。所以,程序化思维的转变,并非一个平





等的、普惠的知识进化过程。与之相伴的，是一种新型社会排斥机制的产生，即“新文盲”问题。可以说，弗卢塞尔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在个人电脑尚未普及的 20 世纪 80 年代，就预言了数字时代的核心社会矛盾之一——数字鸿沟。

在书写文化中，“文盲”指的是那些未能掌握字母—数字符号的人，他们被排除在由文本构建的公共话语、知识与权力体系之外。书籍印刷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普遍意义上的民主化的识字能力……电脑新符号的诞生，我们正再次成为文盲”<sup>[31]</sup>。也就是说，随着电脑新符号——二进制符号——的诞生，大部分人又因尚未学习电脑符号的使用方法而陷入新的困境——电脑文盲。

弗卢塞尔将这种新文盲与文字发明之初的神秘性相类比。对于无法解码新符号的大部分人而言，电脑程序“与书籍印刷技术被发明之前的字母书写一样充满神秘感。无法解码的东西是一个令人惊讶的秘密，我们满怀恐惧地跪在那个秘密前，并努力试图逃避它”<sup>[32]</sup>。这深刻地揭示了符号权力的转移：社会的权力与资格认证，从对字母—数字符号的掌握转向了对数字符号的掌握。这意味着，批判的资格也随之转移。在书写时代，批判性阅读是参与社会、进行政治反思的基础。而在程序化时代，一个不懂编程逻辑的“电脑文盲”，即便饱读诗书，也可能在面对由算法驱动的复杂社会系统时，失去理解和批判其运作逻辑的能力，从而沦为被动的接收者。

这种后历史或曰后文字时代的文盲，并非因为能力的缺失，而是符号权力的结构性排斥。程序化思维在建立起一套新的、高效的世界运作法则的同时，也建构了一道新的门槛：装置—操作者复合体，即人—媒复合体，将使用者分为精英与大众<sup>[33]</sup>，也将社会群体重新划分为“祭司”（程序员、算法工程师）与“信众”（普通用户）。这种基于算法等符号掌握程度的新分层，是功能化时代最显著的社会特征之一，也是程序化思维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社会后果。

弗卢塞尔关于符号与思维的辩证关系、以

新文盲为标志的权力转移的论述，与基特勒的思想形成了强烈的互文。基特勒那句著名的论断——“媒介决定了我们的处境”<sup>[34]</sup>，可以作为理解弗卢塞尔程序化思维诞生的一个绝佳理论注脚。基特勒提出“文化技艺”（Kulturtechnik）这一概念来分析处理不同社会背景下的技术<sup>[35]</sup>，从传播的“物质性”视角来分析媒介技术，以“文化技术”为切入点，对技术本体、技术的使用、制度化的社会实践展开研究，以分析其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不同体现，进而“关注技术的物质结构及其对文化带来的影响，而并非技术对讯息传播带来的影响”<sup>[36]</sup>。总而言之，基特勒认为媒介并非中性的信息通道，它们以其特定的物质和技术结构，先在地决定了什么能够被记录、传输和处理，进而不同的技术媒介（如线性的字母书写、模拟的声音记录、光学的影像存储）划分并重构了人类的感官世界，甚至“过滤”了所谓的人之本质。如此证明了媒介深刻地塑造了我们的文化、知识和主体性。这一点说明基特勒延展了麦克卢汉媒介观，因为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意指媒介带来了使人的思维与行动发生改变的讯息，如此媒介技术相较于人主体性的改变就具有了“优先性”<sup>[37]</sup>。

如果将这一视角置于弗卢塞尔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从“书写思维”到“程序化思维”的转向，其根本驱动力在于主导性媒介符号的切换。字母—数字符号作为一种媒介，其物理特性（线性排列、视觉呈现）与逻辑特性（序列化、因果律）共同“决定”了历史性、批判性思维的“处境”。与之相对，电脑符号（二进制代码）作为一种新的媒介，其结构（离散的 0/1、可非线性的处理）与功能（可编程、高速运算）则“决定”了功能性、程序化思维的“处境”。弗卢塞尔俨然与基特勒一般，从后人文主义的视角对人与技术的关系展开研究，并强调了“技术的优先性”——但在此框架下，技术不仅仅是工具，也不是线性因果断言，而是以一种技术本体论的立场被重新确立为存在论的核心。同时，弗卢塞尔借助现象学还原的方法，使技术本身得以从其自身显现的方式中被重新

把握。所以，二人都洞见了，技术媒介的变迁直接导致文化技艺的变迁，并最终重构了人的认知框架与世界关系。

然而，基特勒与弗卢塞尔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基特勒更致力于揭示人如何被媒介技术所塑造，显示出媒介考古的本体论立场。弗卢塞尔在揭示技术的优先性的同时，则更多地流露出人文主义忧思——更关注技术力量所带来的异化危机，表现出生存论—媒介本体论的立场。他对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新文盲问题<sup>[38]</sup>，及批判性消亡的担忧，都体现了他既承认世界即装置—程序的媒介本体论，又关注“人如何在世存有”的生存论。

因此，弗卢塞尔思想与基特勒思想的互文，一方面印证了弗卢塞尔关于程序化起源的判断，凸显其思想的深刻性，同时也彰显了弗卢塞尔独特的理论气质——在技术优先性与人文批判的交汇点上，以现象学哲学的方法论展开媒介批判。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功能化时代的来临并非偶然，而是媒介物质性、技术优先性发展的必然逻辑。但他也警告我们，在这一逻辑之下，人类的批判精神与主体性地位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 二、装置：程序化思维的运行母体

倘若“程序化思维”构成了功能化时代的新型逻辑，那么这一逻辑并非漂浮于空中，它需要一个强大的、结构性的母体来承载并执行它。在弗卢塞尔的哲学体系中，这个母体便是“装置”，它远非我们日常所理解的简单工具或机器，而是一个吞噬历史、程序化现实并自主运行的庞大系统，是程序化思维得以物质化并施展其权力的场域。

在弗卢塞尔的文本中，“装置”（Apparat）是一个被赋予了深刻哲学内涵的核心概念。技术图像（如照片）是由装置产生的，装置的词源意义指出它“是一样东西，为某件事做好了准备”<sup>[39]</sup>，比如图像装置就是为拍照片而做的准备。弗卢塞尔指出，文字书写，即历史的开始，使“进步”得以加速；后历史时代，一种持续的书写

诞生了，“它彰显出……装置的本质，即持续且加速的进步”<sup>[40]</sup>。也就是说，在后历史时代，持续且加速化的“发展”，是由以惊人速度运转的装置来推动的。此时，装置已初显其作为一种超越人类意志的、自主运作的系统性力量的特征。

弗卢塞尔清晰地揭示了装置的本质功能：“吞噬文本的行，并将其程序化为图像（技术图像）。”<sup>[41]</sup>也就是说，装置吞噬历史并将其程序化为技术图像。书写文化所创造的线性历史——那些以字母排列而成的故事、知识和事件——在装置面前，成了被加工处理的原材料。脚本作家所书写的文本，不再是面向读者的、有待完善的半成品，而是“一半是一个用于上演戏剧的文本……另一半已经是一种机械装置的程序化（编程）……是人工智能自动计算程序的示范形式本身”<sup>[42]</sup>。因此，脚本本质上是一种“前文本”，即前装置文本，是装置将字母符号消化并转化为技术图像（如电影、电视节目）之前的一种过渡形态。所以说，“脚本作家站在历史的终结及机械装置的开端”<sup>[43]</sup>。

总而言之，弗卢塞尔的装置是一个转化器和吞噬者，它吞噬历史，并推动历史转化为后历史。这个过程是单向且不可逆的。三千年前从传统图像中爆发出来的、由书写所承载的历史，如今“通过脚本的毛细血管阶段流回了图像（技术图像）”<sup>[44]</sup>。装置成为历史的终点站，它将线性的、过程性的历史消化成非线性的、可计算的、循环播放的图像流，进而跃入了后历史。

在这个意义上，装置不再是服务于人类目的的工具，而是一个拥有自身运作逻辑和能量的自主系统。人的主体性被“稀释”，而装置的“主体性”——弗卢塞尔并没有赋予装置以确切的主体性，所谓的“主体性”仅具有“拟主体”“类主体”等特征——得以凸显。如此，装置的这种吞噬性运作，带来了一个根本性的后果：人与装置的关系被彻底重构，人的主体性在这一过程中面临着稀释的危机。弗卢塞尔通过分析“脚本作家”这一典型角色，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这一过程。因为，在传统的书写文化中，作者是



创造者，是赋予世界以意义的主体。他的书写是一种政治性和表达性的姿态，旨在与他人对话，构建公共领域并影响世界。然而，在装置的母体中，脚本作家的角色发生了悲剧性的逆转。他们的使命不再是创造历史，而是“加速了历史的产出，以提供机器所需要的输入内容”<sup>[45]</sup>。他们从历史的书写者，沦为装置的“功能执行者”<sup>[46]</sup>，甚至“饲料”。也就是说，人类与装置的原始角色设定发生了倒置——人成了装置的功能。看似是人给装置发出指令，但实际上这个指令是装置指示人发出的。这不就是当今网络世界表象的写照吗？人的意志、情感和批判性思考，在效率、兼容性和流量的要求面前，不得不被悬置。

装置不仅吞噬历史，还通过其内部程序输出一个被重新编码过的现实。装置要求被“喂养”（以脚本、数据等形式），并按照其内部程序，输出一个被它重新编码过的现实。这个被程序化了的现实，便是我们今日所处的由各种界面、算法推荐和虚拟环境所构成的“技术图像宇宙”。弗卢塞尔以充满悲悯的笔触描绘了脚本作家的处境——“从文字文化的角度来看，图像文化就是魔鬼本身。脚本作家实际上是以字母的方式服务于这个魔鬼……将自身奉献……给了魔鬼”<sup>[47]</sup>。所以，脚本作家试图服务的，不再是具有批判精神的读者，而是贪婪的、要求特定格式输入的装置。他们的创造性劳动，不再是为了生成意义，而是为了满足装置的程序化需求。

装置的这种程序化的过程，正是人类主体性“稀释”的过程。当人的创造性活动完全被整合进装置的运行逻辑，当人的产出必须符合机器的可读性标准时，人便从主动的“创造者”降格为被动的“功能组件”。因此，弗卢塞尔强调，新的文艺创作者认识到自己不再是“独创性的创造者”，而是“语言排列者”（Permutator），即置换者<sup>[48]</sup>：他们操作的语言不再是内在积累的原料，而是一个便于他者操作的复杂系统。由此，人类主体不再是一个内在充盈、向外表达的源头，而成为一个被外部系统贯穿并进行排列组合的节点。在装置的强大引力下，古典人文主义意义上的那个统一的、自主的、具有绝对创造力

的主体，正在分崩离析。

弗卢塞尔对“装置”的论述，与福柯的“装置”（dispositif）理论形成极具启发性的对话。将二者并置，不仅能深化对弗卢塞尔的理解，更能清晰地勾勒出权力技术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的演进轨迹。福柯的“装置”，通过对身体进行持续的、个性化的训练，其目的在于将人塑造成符合特定规范的主体。具体而言，在福柯的笔下，监狱、学校、医院等都是规训的装置，它们是一种复杂的权力与知识的组合结构，是多种元素构成的异质性集合<sup>[49]</sup>，其功能在于以微观物理学的方式来塑造权力。弗卢塞尔的装置也具有强大的结构性力量，旨在通过精密的程序实现自动化的组织与控制，其程序化装置一方面具有“吞噬性”，将文本的历史转变为技术图像的后历史；另一方面它具有隐蔽性与自主性，因而是自动运转的“黑箱”。只有在装置失灵，即故障出现时，其结构才得以显现。

与福柯不同的是，弗卢塞尔的装置，其功能的重点不在于肉体的规训而在于控制论式的、人工智能式的控制。通过程序化思维，即编程思维的嵌入，由长期肉身训练以建构符合社会期望的个体主体性，即福柯式的主体性逐渐让位于技术图像宇宙中功能执行者的功能性主体。例如，在如今网络平台中，实时数据采集、算法分析与模型预测已然构成技术图像的宇宙，在其中，人的行为、偏好乃至潜在的可能性都成为控制的对象。但是，它并不需要人成为一个被规训的稳定的主体，而只是需要对人的行为路径进行预测，形成一种生成式的权力，从而根据实时反馈，不断生成和调整对人行为的干预策略。这是弗卢塞尔装置批判的面向，旨在强调作为中介的媒介辩证结构：投射现实，也遮蔽现实。也就是说，媒介在人与世界之间的作用是为了简单地指示世界，发挥调解作用，而当调解作用成为阻碍，就是异化发挥作用之时<sup>[50]</sup>。人与装置的博弈就成为战胜危机的关键。因此，弗卢塞尔的媒介辩证法中蕴含着新主体的诞生动力。

从福柯到弗卢塞尔，我们见证了权力模式从“解剖-政治学”（管理肉体）到“控制-信息学”



（管理数据和行为）的过渡。福柯的装置将个体“禁锢”在特定的社会位置和功能中，而弗卢塞尔的装置则让个体在看似自由流动的环境中，被一套更抽象、更无处不在的程序装置所“控制”——这正是弗卢塞尔装置批判的逻辑出发点。比如，脚本作家沦为“饲料”的命运，正是这种控制力量的体现：他们并非被物理禁锢，而是其创作的内容、形式乃至思维，都必须与装置的编程逻辑兼容。由此，弗卢塞尔的装置模型，从输入端与输出端两个方面，对人与社会进行抽象化的控制。反观当下的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的使用，不正说明这一装置批判思想的理论阐释力吗？

总而言之，通过引入福柯的理论，我们得以将弗卢塞尔的装置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思想脉络中。弗卢塞尔的贡献在于，他以媒介哲学家的敏锐，精准地捕捉到现实与主体的全面重构——在以程序化思维为内在逻辑，以装置为物质母体的技术图像的宇宙中，我们每个人既是参与者，也是随时可能成为被吞噬与重构的对象。

### 三、人工智能：作为大脑投射的装置

当程序化思维成为内在逻辑，装置成为其运行母体，这两者的结合必然指向一个产物——人工智能。在弗卢塞尔的哲学图景中，人工智能并非凭空出现的怪物，而是人类认知过程外部化与物质化的必然结果。它是最具代表性的装置，其根源深植于人类对自身思维的理解与模拟的尝试之中。

弗卢塞尔对人工智能的思考，其深刻之处在于他为人工智能找到了一个坚实的哲学与认知科学基础，这集中体现在他对“数字符号”（digital code）的剖析上。他的论证始于一个革命性的观点：我们自身的思维，其本质并非我们一直所认为的线性、连续的话语过程。也就是，数字符号超越了历史时代的概念化的思维，使人们产生了对思维的新理解。他指出：“思考并非一个连续的、辩证的过程，而是量子化的过程。”<sup>[51]</sup>这意味着，我们意识流之下的底层运作，是由离散的、点状的“量子跳跃”构成的，而非

平滑的、连贯的线性叙述。这一认识与后来的认知科学和神经生物学发现不谋而合，即大脑的思维活动基于神经元的离散放电，是大量并行处理的脉冲信号。

基于这一前提，弗卢塞尔得出他关于人工智能本质的核心论点：装置是对人类神经系统的模拟<sup>[52]</sup>。他解释道：“装置是根据‘1和0’的结构建造的，因为它们模拟了我们神经系统的设计方式。”<sup>[53]</sup>二进制符号中的开启（1）与关闭（0），正是对神经元突触间电化学信号“放电”与“静息”状态的抽象与模拟。因此，运行数字符号的计算机，在物理结构层面就是对大脑物质基础的一种功能仿生。由此，弗卢塞尔揭示了人工智能的哲学本质：它是人类大脑功能的外部投射与自我模拟。他描述了一个精妙的、自我指涉的认识论循环：“大脑是一个装置，它为自身发生的量子跳跃赋予意义，而它现在正将自己的意义赋予功能投射到外部装置上，以便再次吸收这个被投射出去的功能。”<sup>[54]</sup>换言之，人工智能是人类心智试图理解自身、观察自身，并最终在自身之外复制自身的一个宏伟尝试。我们制造人工智能的过程，犹如大脑拿着一面镜子照向自己，并将镜中的映像实体化为一个可以自主运行的外部系统。因此，人工智能是我们心智的“他我”，是我们认知器官的延伸与客体化。

当这种作为大脑投射的人工智能开始介入文化领域时，便引发了一系列深远而有颠覆性的后果。弗卢塞尔通过对文艺创作领域的分析，精准地预言了人工智能时代文化生产与接收的范式转移。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是创作者主体身份的根本性的嬗变。在传统的字母文化中，作家是“创作者”，他们基于自身的体验、灵感与内在愿景，与语言进行搏斗，最终创造出独特的体验模型。然而，在人工智能介入后，创作者的角色从“作家”沦为“排列者”（功能执行者）：创作者不再是从无到有地创造，而是在一个由人工智能提供的、庞大的符号数据库和规则体系中进行选择、组合与排列，其工作重心从“创造”转向了“计算—选择”。

尤为突出的是，人类的体验被空前地模型

化了。弗卢塞尔认为,“文艺创作者是我们的感知器官”<sup>[55]</sup>,他们创造了我们用以观看、聆听和感受世界的模型。而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更强大的模型生成器,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精度来生产和分发这些体验模型。弗卢塞尔描绘了这种可能性:通过向电脑下达命令,我们可以“体验‘圆锥’的概念……能够将完全抽象的东西提升为具体可体验之物”<sup>[56]</sup>。这既是体验的惊人扩展,也潜藏着巨大的危机:当我们的爱情观由好莱坞电影模型塑造,我们的审美由社交媒体的算法推荐塑造,我们的认知由人工智能生成的信息塑造时,我们是在体验世界,还是在体验人工智能为我们生成的、关于世界的模型?弗卢塞尔从批判的角度确认“电脑模拟了大脑的过程……就像人类自身一样——从人的大脑中将图像投射到外部”<sup>[57]</sup>,但这种图像造成的结果是“艺术范畴与科学技术范畴的边界被这种图像消除了”<sup>[58]</sup>。也就是说,电脑生成生产的图像是科学技术的结果,并不是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光韵(aura)媒介观所观照的艺术生产。而是,科学以艺术的形式显明自身,艺术成为科学技术认知的一个条件。如此,人的体验本身虽然得以扩展,但这种体验本身并非主体主动对艺术光韵的体验,而是一种面临着以科学技术的形式,进而被预制、被标准化和被殖民的危险的体验。

最终,这一切将导致弗卢塞尔最为担忧的后果:批判性的消亡。在书写文化中,读者通过对线性文本的深度阅读,进行解码、质疑和反思,这是一种批判性的对话。然而,在人工智能生成的文化产品面前,接收者变成了被动的“接受者”。弗卢塞尔警告道:“在未来,所有的讯息,特别是感知(认知)与体验模型,将以无批判的方式被无条件地接受,而且信息革命使人类成为以无批判的方式顺应信息的接收者,即以人工智能的方式毫无保留地接受信息,成为机器人。”<sup>[59]</sup>反观当下,当体验变得即时、直观且易于消费,当信息被包装成不容置疑的技术图像,那种需要耗费心力、与文本搏斗的批判性阅读姿态便失去了土壤。社会面临着退

化为一个无批判、仅接收的“信息机器人集合体”的风险。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看到弗卢塞尔勾勒出一幅功能化时代清晰而严峻的图景:程序化思维提供了“如何思考”的法则,装置提供了“在何处思考”的母体,而人工智能则提供了“思考者本身”的替代方案。这三者构成了一个强大的、自我强化的闭环,将人类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困境。

这一困境的核心在于意义的虚无。在程序化思维的功能化逻辑中,世界被分解为可计算的数据点;在装置的吞噬下,丰富的历史与叙事被压缩为可循环的程序;在人工智能的模型化输出中,独特的、充满摩擦的个体体验被平滑的、标准的体验包所替代。弗卢塞尔描述出这一困境的隐喻:“书写者已经学会如何解码他们自己的编码。剩下的也就只有空空如也的容器而已。一旦我们知道自己在书写时只是在‘画零’(Nullen zeichnen),那么‘密码’(cipher)这一词语就能够赢回自己本初的无意义了。”<sup>[60]</sup>

弗卢塞尔提到“画零”,这里的“零”(Null)在德语中既有“零”的意思,也暗示着“虚无”或“空白”。也就是说,弗卢塞尔意识到符号化的书写行为中存在一种虚无的、空洞化的现象——书写符号(如文字、密码)在本质上是空洞的、没有固定意义的。所谓的意义生成则依赖于人的赋予。比如,密码在加密学中作为一种隐藏信息的工具,它通过加密算法将信息转化为看似无意义的符号。这些密码符号本身没有绝对的意义,符号的意义并非内在于符号本身,而是在使用者的编码与解码过程中赋予的。

弗卢塞尔通过“画零”和“密码”的比喻,表达了他对书写和符号系统的深刻反思。他认为,书写者和读者在编码和解码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符号系统的空洞性,这种认识使得符号(包括密码)回归到其“本初无意义”的状态。这一比喻在弗卢塞尔处承担了现象学还原的功能,不过这里并非胡塞尔式的先验的还原,而是一种弗卢塞尔式的“媒介现象学的还原”。具体而言,书写者首先对符号固有意义的信念悬置,

即不把数字或字母视为天然有意义的载体，而是视为可操作的标记。当书写者发现无论如何书写、如何排列，最终都只是在“画零”之时，他就直观到符号的本质结构——本身空无，而意义只能依靠使用者赋予。如此，弗卢塞尔就使人退回到操作层面，因为符号等于空壳，而意义等于使用。如此人们不必再追问“世界是什么”而是追问“我如何操纵符号去生成世界”。这样，弗卢塞尔就将胡塞尔的现象学从意识领域带离到媒介—操作领域，即生成了弗卢塞尔式的媒介—操作现象学。弗卢塞尔的这种见解不仅揭示了符号系统的本质，也反映出他对媒介和人类认知之间复杂关系的思考。

上述比喻深刻揭示了技术化社会中人类面临的困境。这种困境的比喻是人类在技术装置面前的异化（空洞化）。面对这一困境，斯蒂格勒提出的“药理学”（Pharmacology）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富有建设性的批判视角。斯蒂格勒认为，技术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毒药”，也是“解药”<sup>[61]</sup>。斯蒂格勒正是运用“药理”这一概念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特别是它如何通过技术媒介来系统化地摧毁个体的“存在之知”，使他们不知道“什么使生活值得过”。具体而言，现代传媒和数字技术导致了个体创造和参与社会象征意义的能力被剥夺，而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经济是建立在对人类注意力的剥削之上的，使注意力被捕获和商品化的现代技术，是一种典型的“药理”性毒药。

不过，斯蒂格勒的“药理”本身也需一次现象学还原。此处先把“技术是毒药或解药”这对价值判断悬置，暴露出技术之为记忆的外化——药丸里包裹的是人“怎样记得生活值得过”。当算法把记忆切成可售卖的数据点，人便发现“意义”被镂空——虚无重现。于是，重新操作这些记忆片段，使意义的赋予重新回归到人的手中，正是把“毒药”转译为“解药”的记忆再编码活动。在此，二者都要求人退到操作的位置，用重新编排来再现被技术掏空的意义。可见，斯蒂格勒所提出的技术的辩证结构与弗卢塞尔的媒介辩证法是一致的：媒介既

作为桥梁投射世界，也作为深渊遮蔽世界。

斯蒂格勒的“药理学”则为我们指明了一条艰难但充满希望的出路：在认识到技术必然的毒性之后，我们的责任不是拒绝它，而是重新编写让生活值得过的脚本。弗卢塞尔的警示在于，如果我们放弃这种努力，放任功能化的逻辑无限扩张，那么人类可能会赢得整个效率的世界，却最终失去作为人的精神家园。如此，对策就需要聚焦于媒介使用者与装置的使用上。所以，经由弗卢塞尔“画零”还原和斯蒂格勒“药理”还原，我们看到的是把意义生产权重新交到操作者手上。由此，“解毒”不是抛弃技术，而是通过操作重新编写让生活值得过的脚本——这恰恰是人类在功能化时代还能把玩的最重要的游戏。

#### 四、余论：一种现象学还原的媒介本体论重述

本文首次将弗卢塞尔散落的人工智能线索拼合成“书写—装置—人工智能”完整链条，在思想史上梳理了人工智能的历史演化维度。通过这一理论链条反观当今的媒介化现实，我们可以发现，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在当下正验证着弗卢塞尔的媒介思想。比如，以前书写，人们需要从记忆中搜寻—重点聚焦—组织排序，然后顺着思路往下写；而如今使用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我们只需通过“提示—输出”机制——“帮我写200字，突出雨天迷路的感觉”，大语言模型立刻拼出一段现成的“迷路—雨—惊喜”的模型套路。这就印证了程序化思维对书写主体的稀释，因为，输出的文本不是从记忆中流出，而是机器按照“如果输入关键词=迷路+雨，那么输出最优选择”的模式，完成弗卢塞尔所说的程序化功能：书写从顺着时间线思考，转变为按照条件调取最优片段。与此同时，创作者从“书写者”变为“提示（语言）排列者”，这就使人沦为“输入—端口”——人成为装置的功能执行者。由此，人工智能输出的并非“内容”，而是对人类“对话神经路径”的外部模拟，其结果就是人越依赖模型，就越将自身认知外包给这一外部投射。最终，出现“新文盲”，





也就是说,不会写提示词(且拒绝学习)的人被排除在公共话语的书写之外。

弗卢塞尔从媒介本体论的维度消解了技术优先性与人文主义的对立:它们是媒介本体论内部的两段必要叙事,而非外部的二元对立。首先,弗卢塞尔抛出现象学的括号,悬置“人优先”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让装置-程序作为先验框架自行显现。这是现象学还原的第一步。继而,他迈出第二步——“再访主体性”——回身追问“在装置-程序的框架下,谁在?如何在世存有?于是,就需要将人-装置的互构回旋重新纳入考察中。弗卢塞尔由此给出辩证的媒介观:同一装置既能将人降格为功能执行者,也预留了“投射-游戏”的缝隙,使“游戏的人”得以在后历史时代重耦为新主体——从而重构人的主体性(该部分超出本文论述范畴,本文只指出后续研究切口,不作详细阐述)。如此,主体性危机不再是技术与人文的二元博弈,而是媒介本体论内部生成性问题的再启动,即人与装置的互构回旋如何绽出另一种在世存有?

弗卢塞尔借用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在世存有”,使媒介本体论经过现象学还原得以展现其自身——世界如何被技术条件先行形塑,以及人如何在这一形塑中重新学会“能在”,即让自身在装置-程序的缝隙里绽出可能性。也就是说,弗卢塞尔将媒介本体论转译为可供生存论追问的框架。具体而言,他首先给出媒介本体论:世界即装置-程序的后历史场域,再以海德格尔式的生存论方法重述媒介本体论时,媒介便被转译为“在世存有如何重新生成”的问题。于是,人-装置的互构共生,不仅仅是技术描述,而是成为新的此在条件:人必须在此结构性条件下学会“如其所能地是”,即去生存、能在。如此,本文通过“媒介-生存论”的还原以及对“在世存有”的追问,从而在现象学-生存论维度上将弗卢塞尔媒介本体论二次转译。

那么,在技术图像时代,当程序化思维成为主导范式,当装置无处不在,当人工智能开始大规模地生成内容,人类的独特价值何在?——或许正在于与装置博弈,从而重新审视人与技术互

构回旋的生成问题。对此问题的探索,将决定技术文明的最终走向,也是我们时代精神的体现。

(责任编辑:徐秋染 实习编辑:尹婧雯)

## 参考文献

- [1] 王帅,张涛,吴靖.堆叠与展褶: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传播与生发机制[J].新闻界,2025(8):60-71.
- [2] 王帅,张涛.关系、逻辑与合理性:“价值对齐”的理论限度及溯源性考察[J].传媒观察,2025(5):48-59.
- [3] 刘文博,周海宁.数字化存在:后人类时代人机关系建构的可能性[J].宁夏社会科学,2024(2):208-216.
- [4] 刘文博.赛博朋克电影:一种批判性的后人类主义话语分析[J].当代电影,2024(6):118-125.
- [5][33][50] 威廉·弗卢塞尔.传播学:历史、理论与未来[M].周海宁,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120;143;81.
- [6][8][9][1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8][40][41][42][43][44][45][46][47][48][51][52][53][54][55][56][57][58][59][60] 威廉·弗卢塞尔.书写有未来吗?[M].周海宁,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4:序1;56-63;144;151;1;5;4;37;41;4;42;56;59;57;57;56;19;144;139;144;144;144;52;143;76;150;151;151;151;73;27;28;28;79;97.
- [7] 张翥,周海宁.融媒体时代技术图像符号的认知失真研究.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1(2):89-96.
- [11] 王伟.从技术性图像到媒体知觉——弗卢塞尔的媒介哲学[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2(9):22-29.
- [12] 焦自英.无维之“真”——威廉·弗卢塞尔的技术图像的本质[J].上海视觉,2025(4):96-101.
- [13] 李雨轩.弗卢塞尔论技术图像及其宇宙.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5(5):398-406.
- [14] 李一君.技术图像宇宙中的自动与自由——威廉·弗卢塞尔的图像理论及其当代启示[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3(7):64-72.
- [15] 于成.弗卢塞尔的摄影哲学与装置社会批判[J].世界哲学,2023(3):101-111.
- [16] 张巧.作为装置的摄影——以威廉·弗卢塞尔的摄影哲学为中心的考察[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0(10):97-105.
- [17] 刘海龙.媒介与媒介性:姿态理论与传播研究[J].新闻记者,2024(12):15-25.
- [18] 张先广,丁礼明.弗卢瑟与间性论[J].东方丛刊,2019(2):166-183.
- [19] 周海宁.威廉·弗卢塞尔的传播理论与其意义[J].东南传播,2024(5):1-6.
- [20] 李慧敏.弗卢塞尔论媒介:一种媒介批判路径[J].新闻界,2025(10):87-96.
- [34] Kittler F A. *Gramophone, film, typewriter*[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xxxix.
- [35] Winthrop-Young G, Gane N. Friedrich Kittler: an introduction[J].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06, 23(7-8): 5-16.
- [36] 吴璟薇,曾国华,吴余劲.人类、技术与媒介主体性——麦克卢汉、基特勒与克莱默尔媒介理论评析[J].全球传媒学刊,2019,6(1):3-17.
- [37] Kim S H. Human Position in McLuhan's Media Theory:

McLuhan, Kittler and the Priority of Technology[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 2008, 8(2): 84-121.

[39] 弗卢塞尔. 摄影哲学的思考 [M]. 毛卫东, 丁君君, 译. 北京: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2017: 21.

[49] Foucault M. The Confession of the Flesh[M]//

Michel Foucault. *Power / 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0: 194-195.

[61] Stiegler B. *What makes life worth living: On pharmacology*[M]. Hoboken: John Wiley & Sons, 2013: 4.

## From Writing to Programming: On Vilém Flusser's Media Thought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Zhou Haining

**Abstract:** In his philosophy of media, Vilém Flusser offers profound insights into the transition of human communication from a “writing civilization” to a “programmed civilization” through key concepts such as “programmed thinking”, the “apparatu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e argues that the linear,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writing are being replaced by the programmed and functional logic of symbolic encoding. Among these, the “apparatus” serves as the operational matrix of programmed thinking, devouring history to generate post-history (technical images) and transforming humans into “functionaries”, ultimately diluting human subjectivit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a programmed apparatus, further intensifies this crisis by projecting and simulating human brain functions externally.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nternal logic among Flusser's concepts of programmed thinking, the apparatu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ynthesize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his thought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media,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resources for understanding the technological-cultural dilemmas of the digital age. Furthermore, through a phenomenological-existential “secondary translation”, this paper reframes the crisis of subjectivity as a generative issue within media ontology, offering a theoretical entry point for revisiting human subjectivity in the digital era.

**Keywords:** Vilém Flusser; programmed thinking; apparatu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hilosophy of media

**Author:** Zhou Haini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 亲密连接的“数字孤岛”：县城家庭手机短视频集体驯化的协商与冲突<sup>1)</sup>

——以甘肃省 Z 县县城中小学生家庭为例

洪杰文 张丽萍

**摘要** 近年来，短视频快速且深度地嵌入到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然而因为学业期盼和家庭负担，县城家庭的“父母—子女”在短视频使用上矛盾重重。本文通过对甘肃省 Z 县县城 21 个中小学生家庭的半结构化协同访谈发现，短视频的家庭化驯化多表现出一种“全家参与、父母主导”的管理型集体驯化，工具维度的显性管理和基于短视频内容的薄弱讨论可能会让家庭成员成为亲密连接的“数字孤岛”。在表现活跃的中小学生家庭中，短视频集体驯化的规则和执行相比动机等因素更大程度地影响着协调与编排。子女的反向观察和基于数字痕迹的技术监督给短视频成瘾的父母对子女的管理带来了挑战。父母、短视频平台和家庭教育相关社会工作的三方合力或可促进家庭集体驯化短视频的效能提升。

**关键词** 驯化；集体驯化；短视频使用；管理；反向监督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洪杰文，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湖北武汉 430072。  
张丽萍，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 430072；乐山师范学院新闻与传媒学院讲师，四川乐山 614000

## 引言

短视频在未成年人互联网相关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19—2023 年，未成年人短视频使用率从 65.6% 提高到了 82.9%，上升 17 个百分点。数据显示，当未成年人遇到知识困惑需要解答时，网页搜索（73.5%）是首选方式，浏览视频或短视频排在第二位（56.6%），然后是求助同学朋友（52.9%）<sup>[1]</sup>。儿童短视频使用与各学科成绩呈现显著负相关<sup>[2]</sup>。与父母关系很不好或不太好的未成年人，经常使用短视频的比例分别为 39.6%、42.4%，比亲子关系很好的未成年人分别高出 22、25 个百分点<sup>[3]</sup>。随着手机等新的传播方式在儿童群体中的大规模普及，如何正确引导儿童在媒介实践中趋利避害，成为当代父母面临的共同难题<sup>[4]</sup>。除此以外，儿童和父母使用互联网的

1) 基金项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级社科研究项目“视听网站推送算法发展及存在问题研究”（GD231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新闻传播的人工智能实践及其反思研究”（21FXWA002）。



能力差异又给这一问题提出新的挑战。31.6%的儿童认为自己比父母懂得更多的上网知识，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认为自己比父母懂得多的儿童比例在上升，父母相对儿童的“权威”地位受到挑战<sup>[5]</sup>。2024年，国内首份《县域未成年人网络消费调研报告》发布，报告强调了要倾听未成年人的声音，不仅要保障儿童的受保护权，也要保护儿童的发展权和参与权<sup>[6]</sup>。在短视频平台用户呈现全民化趋势<sup>[7]</sup>，短视频在家庭中深度嵌入之际，如何趋利避害，需要聚焦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家庭传播等领域的调整研究快速做出回应。

家庭环境中，中小学生手机短视频的使用是在父母约束和个人自主性的共同协商下完成的，有集体驯化的特征。已有关于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的研究从风险、机会、文化资本、隐私与权力等方面做了探索，但综合数据遮蔽了具体的动态过程。家庭中“父母-子女”在子女成长过程中驯化短视频是如何展开的？各自有什么规定和策略？遇到了什么问题？深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或可为由短视频使用引发的子女和父母间的紧张关系找到答案，也能探索出媒介化家庭环境下协商未成年人手机短视频使用的可行策略。本研究基于驯化理论，从集体驯化视角出发，探索家庭中父母和中小学生在短视频使用分歧中的处理方法和达成平衡状态的路径，以期回应移动互联网环境下未成年人媒介使用的社会忧虑，并进一步推进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的相关研究。

一、文献综述

（一）驯化与集体驯化

驯化研究自1992

年被罗杰·西尔弗斯通（Roger Silverstone）用于考察人们如何将电视驯化进家庭日常生活后，便在有关媒介技术与日常生活的研究中被广泛采用。西尔弗斯通认为，“如果技术、电视和电视节目要在家庭中占据一个空间或一处位置，它必须被驯化”<sup>[8]</sup>。这一过程就像驯化野生动物一样。西尔弗斯通将驯化分为商品化（commodification）和想象（imagination）两个预驯化环节，以及占有<sup>①</sup>（appropriation）、客观化（objectification）、合并（incorporation）、转换（conversion）四个家庭驯化环节<sup>[9]</sup>。占有指被购得或被拥有，客观化指如何把媒介置于家庭空间中，合并主要关注媒介技术物被使用的各种方式，指向如何把媒介置于家庭时间中，转换则指向家庭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集体驯化（collective domestication）概念衍生于对游戏用户在线集体行为的研究，强调人们如何在当下媒体环境中合作使用某些移动服务，关注不同动机的驯化主体如何集体驯化游戏过程，游戏结果如何影响了驯化过程等<sup>[10]</sup>。集体驯化概念进一步发展了驯化理论，关注驯化中的多主体问题，且重点结合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探究了不同动机的行动主体在同一活动中如何展开合作。研究者将这一过程称为协调或编排，并发现了管理型和道德型两类集体驯化类型（表1）。在动机不一致时，驯化需要更多地协调和管理，表

表1 集体驯化的两种类型<sup>②</sup>

| 驯化类型    | 三类玩家动机    | 对动机解释的争议 | 管理程度 | 实践和意义建构的协商过程 | 游戏表现衡量的影响（绩效评估） |
|---------|-----------|----------|------|--------------|-----------------|
| 道德型集体驯化 | 硬核玩家：取胜   | 少        | 弱    | 默契           | 更努力             |
|         | 休闲玩家：社交   | 少        | 弱    | 默契           | 影响不大            |
| 管理型集体驯化 | 中等玩家：介于中间 | 有        | 强    | 广泛、明确地协商和组织  | 寻求改进，也有不满与冲突    |

① 注：在《罗杰·西尔弗斯通·电视与日常生活》（第1版）（陶庆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184）引用文献中的“挪用”改为“占有”。

② 表格说明：表格内容制作依据：Ask, K., Sørensen, K. H. “Domesticating technology for shared success: collective enactments of World of Warcraft” [J]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2018.22(1):73-88.



现为管理型集体驯化；在动机一致时，驯化通常通过默契行动完成，称为道德型集体驯化<sup>[11]</sup>。

赫尔曼·鲍辛格（Hermann Bausinger）主张将家庭中的媒体和媒体消费作为一个集体过程（collective process）来研究<sup>[12]</sup>。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儿童和青年人的电视节目进一步融入消费文化；同时，儿童和青年人被视为能够通过消费，尤其是媒介产品消费，创造自身身份的个体<sup>[13]</sup>。中小学生在逐渐形成个体性的过程中，其家庭中的媒介使用也表现出了一种集体互动的特征。集体驯化理论认为，当用户依赖于彼此驯化成果的兼容性时，驯化必须是集体的<sup>[14]</sup>。集体驯化需要增加对潜在互动的敏感性，并且强烈关注协调（orchestration）工作，即如何执行这种协调及为什么这样做<sup>[15]</sup>。这一协调过程中动机、对动机的解释和可能的争议、绩效评估、管理程度都可能影响实践和意义建构的协商过程。在使用短视频方面，父母和子女存在着不同的动机，因此，驯化过程是集体协调完成的。本研究将集体驯化视角拉回到驯化理论提出时的家庭情境，以期进一步探索中小学生学习短视频使用中的互动过程。

## （二）手机短视频与中小学生学习家庭

短视频是一种基于移动终端的新媒体视频形式，具有短小、直观、趣味性强的特点，并塑造了一种手指上下滑动的视听文化模式<sup>[16]</sup>。短视频与家庭相关的研究主要呈现出两个方向。首先，从文化视角切入，研究短视频和其他媒介及内容作为整体对家庭秩序、亲子关系、文化反哺<sup>[17]</sup>等领域的影响与重构。青少年通过手机的使用扩展了传统面对面的私人场域<sup>[18]</sup>，手机中介的亲子关系有控制与反控制、入侵与协商的特点<sup>[19]</sup>。其次，从社会问题研究切入，如青少年短视频沉迷<sup>[20]</sup>、短视频使用、父母干预与学习成绩的关系<sup>[21]</sup>等。

20 世纪 80 年代，源于家庭电视使用研究的父母干预理论（Parental Mediation Theory，PMT）也成为了家庭情境下儿童互联网使用的主要研究理论<sup>[22][23][24]</sup>。利文斯通（Sonia Livingstone）和赫尔斯珀（Ellen J. Helsper）<sup>[25]</sup>通

过对 9-19 岁的英国青少年和父母进行的一项全国性调查发现，在电视的家庭调解研究中，除了内桑森（Amy I. Nathanson）<sup>[26]</sup>总结出的三种干预之外，互联网时代的父母们还采取了互动限制和监控的技术策略，由此合并总结出父母对儿童互联网使用的四种干预措施，即积极共同使用（active co-use）、技术限制（technical restrictions）、互动限制（interaction restrictions）和监控（monitoring）。父母干预理论虽然也关注了父母行为、子女行为与认知特点等，但多数研究将关注点放在分析两者关联上，缺少对“双方为什么采取这样的行为”，以及“父母干预孩子媒介使用时父母在做什么”等问题的探索。在父母干预研究中，还发现了父母干预和子女反向干预与家庭冲突的关联<sup>[27][28]</sup>。

在我国，家庭传播起步较晚<sup>[29]</sup>，甘雨梅在留守家庭的媒介沟通<sup>[30]</sup>、朱秀凌在中学生家庭媒介使用<sup>[31]</sup>等方面做出了较为丰富的探索。2022 年，刘王平、郑欣在探索留守家庭祖孙和在外的孩子父母之间的智能设备使用时，引入了互动视角，提出了媒介调适，突破了固有的媒介干预视角<sup>[32]</sup>。2023 年，章平、于佳鑫等将家长短视频使用纳入子女短视频使用与学业成绩关系的研究，发现家长短视频使用时长较长时，儿童全年使用时长、非寒暑假平均每日使用次数均能显著负向预测学业成绩<sup>[33]</sup>。但以上研究或关注乡村留守家庭，或考察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家庭，对县城关注较少。另外，这些研究或将智能设备或手机当作整体研究，或重点考察社交媒体的问题。目前，短视频类的应用程序作为父母和子女都容易上瘾的应用程序，其在家庭使用研究上主要针对媒介育儿，即幼儿期子女展开<sup>[34]</sup>。

综上，传统驯化研究没能突出多主体的协作。家庭短视频的使用和互联网时代父母干预研究存在忽视短视频在家庭中驯化的阶段性、动态性和成员互动特点等问题。父母干预研究认为父母干预和亲子冲突有关，集体驯化研究也认为兼顾赢得比赛和社交的中庸动机因为动机不一导致更多的管理。因此，本研究将“父

母-子女”因为短视频使用产生的冲突作为研究问题之一。要说明的是,冲突在本研究中具体指“父母-子女”因为短视频使用在认知、情感、行为、态度等方面的不相容而产生的心理或外显行为的对抗状态。

中小学生在家庭生命周期的学龄期和青少年时期分别面临“鼓励子女在教育上取得成就”和“在自由与责任之间取得平衡”的家庭发展任务<sup>①</sup>,而县城未成年人沉迷手机网络游戏,浏览短视频的时间远远超过想象<sup>[35]</sup>。基于此,本研究将家庭短视频集体驯化界定为:家庭成员如何共同将短视频使用引入到家庭生活日常中。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基于驯化框架,以集体驯化为研究视角展开对县城中小学生家庭如何驯化短视频的探索,将家庭驯化各阶段父母和子女间的互动与冲突作为考察重点。研究问题主要有:(1)县城家庭中手机短视频驯化主体和短视频客体有何特点?(2)“父母-子女”在驯化各阶段如何集体协调短视频的使用?(3)短视频使用中有没有冲突,冲突的原因是什么,又是如何应对的?

## 二、研究设计

### (一)研究方法

定性方法,特别是深度访谈和人种学,是用于驯化研究的主要方法<sup>[36]</sup>。本研究以甘肃省正宁县县城中小学生的家庭为研究对象,研究家庭成员如何集体驯化手机短视频。为得到鲜活、深入的资料,研究采用了观察法和协同访谈法,即对同一家庭中的父母和子女分别进行访谈。为涵盖不同家庭类别,在家庭角色、性别、学历、职业等方面尽可能寻求多元、平衡,研究者联系了当地中小学的相关老师,在访谈对象的选择上采用了目的抽样法。

### (二)观察区域和访谈对象选取

县城中小学生的家庭“父母-子女”共同居

住的情况更多,“父母-子女”的线上、线下互动更为频繁,在这样的环境中研究集体驯化,更能发现在深度媒介化的当下,父母子女如何共同将短视频引入到家庭日常中。本研究选取甘肃省正宁县县城作为观察区域。正宁县位于甘肃省庆阳市东南部、子午岭西麓,属陇东黄土高原沟壑区,与陕西省相邻,属于西部经济欠发达<sup>[37]</sup>且限制开发的县城<sup>[38]</sup>。本研究作者之一的家乡在该县城,对县城的观察从2008年底至今,主要观察县城手机门店,以及县城街道上与“大数据”“算法”等社会展示性机构等,以作为此次访谈对象的主要外部环境。

访谈于2023年12月至2024年10月间进行,以线下面对面、微信语音或电话录音三种方式完成,时间为每人30至70分钟不等。为了聚焦家庭内部驯化过程,避免过多因素干扰,所选择的访谈家庭都已在县城居住至少3年以上。在说明研究目的,征得访谈对象同意的情况下,研究者对访谈进行了录音。针对家庭特征,本研究参考谢尔德(Anique J. Scheerder)等2019年<sup>[39]</sup>的研究,并结合实际,对家庭特征做了更为细致的梳理,用核心家庭、本地留守、流动家庭、三代同住、重组家庭等对家庭特征做了基本描述。

21组接受访谈的家庭中,父亲8位,年龄范围为32~44岁,母亲12位,年龄范围为33~45岁,奶奶1位,子女中女儿8位,儿子12位。编号为8的一组访谈对象较为特殊,该组孩子的父母离异,由爷爷奶奶抚养。访谈的21个家庭中,编号为G8的家庭监护人没有自己的智能手机,M13的智能手机是4年前弟弟给买的,其他家庭监护人都较早拥有了自己的智能手机。21位9~16岁的中小学生中,7人有自己的手机,占总数的33.3%,和“给过又收回”手机的合并计算,中小学生的手机比例达到57.14%(表2)。

<sup>①</sup> 资料来源:唐纳德·柯林斯,凯瑟琳·乔登,希瑟·科尔曼.家庭社会工作[M].刘梦,译.第4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100-147.转引自杨柳.当代家庭问题与社会工作[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20:41.杜瓦尔的家庭周期理论主要针对按部就班发展的核心家庭,本研究中受访子女非第一个子女的,可以适用这一划分。



表 2 访谈对象信息<sup>①</sup>

| 编号 | 父母  |    |    |          | 子女  |    |    | 家庭特征                | 孩子是否有手机 | 是否因短视频使用产生冲突 |
|----|-----|----|----|----------|-----|----|----|---------------------|---------|--------------|
|    | 编号  | 年龄 | 学历 | 职业       | 编号  | 年龄 | 年级 |                     |         |              |
| 1  | F1  | 40 | 硕士 | 公务员      | D1  | 9  | 三  | 核心 + 本地留守           | 无       | 无            |
| 2  | F2  | 42 | 本科 | 公务员      | D2  | 10 | 四  | 核心                  | 无       | 无            |
| 3  | M3  | 42 | 初中 | 开店       | S3  | 11 | 五  | 核心                  | 给过又收回了  | 无            |
| 4  | F4  | 39 | 初中 | 开店       | S4  | 11 | 五  | 核心                  | 给过又收回了  | 无            |
| 5  | M5  | 39 | 本科 | 老师       | S5  | 11 | 六  | 核心                  | 无       | 无            |
| 6  | M6  | 38 | 本科 |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 S6  | 12 | 六  | 核心                  | 给过又收回了  | 有            |
| 7  | F7  | 38 | 本科 | 公务员      | S7  | 12 | 七  | 核心                  | 无       | 有过（六年级）      |
| 8  | G8  | 60 | 文盲 | 务农       | GD8 | 12 | 七  | 父母离异<br>祖孙家庭        | 无       | 无            |
| 9  | M9  | 33 | 初中 | 全职妈妈     | D9  | 12 | 七  | 留守<br>（阶段性留守）       | 给过又收回了  | 有过（四年级）      |
| 10 | F10 | 36 | 初中 | 开店       | S10 | 12 | 七  | 核心                  | 给过又收回了  | 有过（六年级）      |
| 11 | F11 | 32 | 初中 | 做生意      | S11 | 13 | 八  | 三代同住                | 无       | 有            |
| 12 | F12 | 44 | 本科 | 公务员      | S12 | 13 | 八  | 本地流动                | 无       | 有过（七年级）      |
| 13 | M13 | 38 | 初中 | 做零活      | D13 | 13 | 八  | 本地流动                | 无       | 无            |
| 14 | M14 | 45 | 大专 | 开店       | D14 | 14 | 八  | 核心                  | 有       | 有过（七年级）      |
| 15 | M15 | 39 | 初中 | 做生意      | D15 | 15 | 九  | 重组家庭                | 有       | 有            |
| 16 | M16 | 34 | 初中 | 开店       | D16 | 15 | 九  | 核心                  | 有       | 无            |
| 17 | M17 | 40 | 大专 |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 S17 | 15 | 九  | 核心                  | 有       | 有（八年级和现在）    |
| 18 | F18 | 44 | 本科 | 公务员      | S18 | 15 | 高一 | 留守 + 本地流动 +<br>三代同住 | 有       | 无            |
| 19 | M19 | 38 | 高中 | 做生意      | S19 | 15 | 高一 | 流动 + 留守             | 无       | 有过（六、七年级）    |
| 20 | M20 | 44 | 大专 |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 D20 | 15 | 高一 | 本地流动                | 有       | 有            |
| 21 | M21 | 39 | 大专 | 开店       | S21 | 16 | 高二 | 本地流动                | 有       | 有（七年级到现在）    |

### 三、研究发现

通过访谈发现，短视频已经成为家长和孩子的重要消遣，既是缓解情绪和打发时间的工具，又是学习或工作中的重要助手，同时也成了孩子的兴奋剂和家长头疼的事情。除了作为学习助手，县城父母常把短视频作为孩子生活中

的“娱乐替代”。父母实施管理，孩子采用技巧，最终互相认可，达成一致；或引发不愉快、矛盾，甚至更严重的冲突。驯化中的互动和协调就在主体－客体的管理－监督、冲突－应对中展开。

（一）主体－客体：参与主体和短视频平台不同程度的纠缠

<sup>①</sup> 表格说明：1.M 代表母亲，F 代表父亲，G 代表奶奶，S 代表儿子，D 代表女儿，GD 代表孙女；2. 为了保护受访者隐私，对家人的访谈以一位家长为主，对其他家庭成员的信息涵盖在访谈内容中，不在访谈信息表中列出。

本研究所调研的 21 个家庭中，多子女家庭（非独生子女家庭）占 90.5%，对短视频的集体驯化表现出了“全家人参与”的特点。例如，M6 和 F7 在访谈中说自己不怎么看短视频或都看和工作有关的内容，被一旁的孩子直接拆穿。

“家里目前是妈妈管孩子，孩子管他”，F7 幽默地说。还有 D14 的手机被上大学的姐姐拿走，国庆节的时候才拿回来。家庭中短视频集体驯化的参与主体几乎包含所有亲近的家庭成员，这使得集体驯化表现出互动性和交叉性的特点，也增加了管理难度。在全家成员都参与的短视频集体驯化中，父母管理是主基调，且驯化大多表现出自上而下的“父母管理孩子”的管理型集体驯化方式。要补充说明的是，管理型驯化是指由于目标、群体活动的物质特征及执行这些活动的正确方式之间存在分歧，因而集体驯化可能需要领导和管理，且驯化过程必须进行明确的协商和组织<sup>[40]</sup>。当家庭周期进入学龄期，家长就开始限定孩子使用短视频的方式，其中父母管理最为常见，也最为严厉和有效。

作为驯化客体的短视频无处不在，且其平台功能不断丰富，拥有不同的风格化特征，并表现出一定的平台区隔，平台使用程度也会因为用户个体的探索深度而不同。“未成年人模式”是中小学生家庭短视频集体驯化的技术管理方式之一。国家网信办要求移动智能终端不断增强未成年人模式的服务性、易用性和实际效用，但实践中仍存在未成年人自己设置或取消“未成年人模式”<sup>①</sup>的情况，这让“未成年人模式”的现实意义大打折扣。在考察“家庭集体驯化短视频”中的成员互动时，不可忽略的是因为“父母-子女”数字素养、使用行为差异等原因，作为驯化客体的短视频平台也会呈现出可供性方面的差异，成为引发隐性忧虑的潜在原因之一。

（二）管理-监督：驯化实施与主体调适在不同阶段的表现

短视频在中小学生家庭中的集体驯化首先由父母管理；除此之外，父母和子女也发展出次级调适策略，部分子女基于数字痕迹的反向监督对沉迷短视频的父母提出了管理挑战。

#### 1. 占有与合并：父母管理的主要发力点

西尔弗斯通驯化四阶段中的“占有”阶段代表实物跨过正规经济和道德经济之间门槛的那一瞬间<sup>[41]</sup>。本研究中“占有”包含“父母管理孩子是否拥有自己的一部手机”和“用什么平台看短视频”两个方面。总体看来，孩子大致通过“父母主动给予”“和父母协商奖励”“偷用旧手机被默许”和“成功索要”等四类方式获得手机。但拿到手机后，孩子并不完全拥有手机支配权，一般都采用周内家长保管、周末返还的方式。总之，在大部分家庭中，孩子的手机都经历着有管控的游动。在使用平台方面，父母主要受亲戚、朋友、同事等影响，主要使用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而孩子使用的短视频平台更为丰富，除家长使用的这三个平台外，还有西瓜视频、小红书、B 站、百度浏览器等。孩子获知平台的渠道不仅有家长和同学，还有媒介，如通过电视广告得知 B 站，通过手机应用排行榜知道西瓜视频等。孩子对短视频平台的获知表现出了依赖设备本身的特点，这是在深度媒介化环境下成长的未成年子女们获取信息的新特点，也再次证明了媒介能为未成年人的成长带来机会。

孩子手机的游动规律反映出手机使用和日常生活“合并”阶段的时间管理。2013 年，哈登（Leslie Haddon）提出儿童增长的（小）屏幕时间可能存在与电视时间和其他活动时间之间的平衡问题<sup>[42]</sup>。S7 的妈妈在孩子六年级时，从乡镇调到县城工作，规定了儿子刷短视频的时间为每天作业完成后。“周内的话是半个小时，周末的话是作业做完后，每天可以玩两个小时，每半个小时玩一次，玩完之后歇一个小时。”因为 S7 当时沉迷于一款游戏，同时也刷短视频，母

① 注：2019 年，部分短视频和直播平台上线“青少年模式”，2024 年国家网信办在文件中将“青少年模式”改为“未成年人模式”，详见专家解读 | 从“青少年模式”到“未成年人模式”——探索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体系化升级新路径 [EB/OL]. (2025-05-21) [2025-06-29]. [https://www.cac.gov.cn/2025-05/21/c\\_1749474135325986.htm](https://www.cac.gov.cn/2025-05/21/c_1749474135325986.htm).



亲便对孩子使用手机的时间做了详细规定，如果超时了会惩罚，如第二天不许玩，或扣周末的时间等。F2 家庭严格限制女儿刷短视频，女儿使用父母手机刷短视频时会自己用手机定时 10 分钟。时间管理几乎是访谈对象中的父母都提到的管理方式，不同的是，有些时间管理严格、具体，有些是父母凭感受感知的适当时间，严格的时间计量是更能得到未成年子女认可的管理方式。

## 2. 客观化：时空回避与次级调适

客观化侧重于媒体设备的空间布局。家庭环境下短视频的客观化应包含“在家庭什么空间使用短视频”等问题。F2、M3、F10、F12、M19、M21 等都表现出较长时间使用和将短视频全效嵌入<sup>[43]</sup>生活的特点。部分家长自身也存在沉迷问题，但为了平衡孩子和个人使用需求，父母发展出次级调适策略，如他们会在孩子学习的时候在一旁看书，孩子不在家或睡觉后再刷短视频；在孩子刷短视频太多的时候，父母会带他们外出活动；另外还有父母刻意避开孩子在卧室刷短视频或孩子睡着后戴着耳机刷短视频等。通过错开时间、空间隔离、技术遮蔽等方式，父母们用自我管理规训短视频使用，在不影响孩子和满足自己放松需求之间达到平衡。

不过，子女在驯化的几个阶段中并不是完全的听从者（subservience）<sup>[44]</sup>。他们在驯化各阶段发展出自身策略、主动性、协商与反抗，形成了暗度陈仓的次级调适<sup>[45]</sup>。在假期或其他父母不在身边的时间里，他们偷偷拿着祖辈手机刷短视频，父母迫于与祖辈的亲情压力，一般较少或难以介入。疫情网课期间，他们还一边听课，一边通过分屏或切换屏幕的方式看短视频，学习成了孩子使用手机的天然掩护<sup>[46]</sup>，短视频亦如此。少数家庭中，孩子也有和父母商量并制定规则的自主行为。例如，D16 发现自己对手机产生依赖感时，主动和妈妈商量把玩手机的时间从 20 分钟调到 15 分钟。“使用短视频社交”是孩子让家长比较紧张的使用短视频的理由，D20 从初二开始就和同学通过抖音续火花直到高一。短视频平台功能的多样化、内容的丰富度和再驯化

的多种可能性让家长防不胜防，加重了父母的忧虑。但短视频的技术可供性也不断激发和满足着孩子的探索愿望，他们可以在忘带书的时候通过快手搜书（S10），在抖音上搜题并抄到本子上（D13），搜菜品制作视频学做饭（D15），通过刷短视频听懂同学说的“梗”，以类似的方式，未成年人主动将短视频驯化为自己需要的工具。

利文斯通等提出监控、互动限制等技术干预是互联网时代父母干预与电视时代的不同之处<sup>[47]</sup>。在短视频的父母干预中，父母们也尝试了用未成年人模式这一技术限制，但使用后使得孩子认为“有些信息他看不到”（M17）、“家长已经限制了，没必要再限制了”（S17），而选择自己关闭或征求父母意见关闭。部分孩子会主动设置青少年模式。从访谈中观察到主动设置该模式的孩子更加自律，对学习有着更加明确的目标，关闭技术限制的孩子则更加看重自己使用手机的权利。

## 3. 转换：薄弱的内容连接和反向监督

西尔弗斯通提出的驯化的转换阶段强调家庭与外部社会的勾连，将集体驯化运用于家庭场域，转换阶段可以理解为家庭成员之间针对短视频内容的互相指导与讨论。由于处在同样的实体空间中，父母一般知道孩子在用短视频看什么，但内容方面的指导比较含糊，讨论也有限。父母希望孩子通过短视频看“有助于学习的内容”（M15），“不要看那些过分的”（M13）和“乱七八糟的”（M15），还有“奇怪的”（M5）内容。这些模糊的字眼是父母对短视频内容可能引起孩子价值观扭曲的忧虑。然而，未成年人在短视频使用中，受引导与限制较多而获得的有效帮助较少<sup>[48]</sup>。尽管部分教育观点明确的家长也为孩子提供了他们认为应该看的内容、分享了他们认为孩子应该知道的科技发展，或告诉孩子发布和使用短视频过程中的风险规避策略，但整体占比较低。另外，“父母-子女”在短视频内容的讨论方面也各自竖起了壁垒。家庭中仍然存在着家庭教育学校化的问题<sup>[49]</sup>。整体来说，父母希望把短视频内容的分享把控在有用和安全的范围，呈现出一种谨慎和严肃的特点。父母眼中“孩



子还小”“孩子毕竟是孩子”等观点影响了父母和子女谈话内容的选择。除了共同使用之外，孩子也和父母一样采用区分内容分享的策略，且实际和父母分享的内容更少。“近在咫尺”的亲子之间面临着“在场的缺场”“交流的无奈”等尴尬图景<sup>[50]</sup>。内容方面指导的模糊和交流的薄弱也让核心家庭“父母-子女”成了亲密共同在场的“数字孤岛”。

访谈对象中的父母通过子女还手机时没来得及关闭的屏幕、视频收藏、“要求子女输入手机密码”等手段实施着对子女的技术监管，部分子女也通过查看父母视频发布时间、设置视频公开范围、设置手机密码等技术了解父母的短视频行为（S7），或刻意不让父母看自己发的内容（D15、S21）。观察或技术监督等父母干预的方式被子女使用时，沉迷短视频的父母对子女的管理呈现出了“五十步笑百步”般的无力状态。通过短视频的自我呈现和短视频观看、转发等行为留下的数字痕迹拓展了子女了解父母的渠道，当孩子知道父母和自己使用同样的短视频平台时，父母的权威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孩子也知道父母创建小号访问自己的抖音平台（S21），“父母-子女”的互相观察表现出了线上线下的交织，彼此的多面性会通过各种渠道呈现出来。子女通过数字痕迹对父母的观察让父母以一种不自知的状态被子女反向监督。

（三）冲突-应对：集体驯化中的激烈矛盾与艰难协调

短视频是高感官占用的媒介，长期使用后的失神症<sup>[51]</sup>给家庭沟通带来了障碍。访谈过程中，研究者向访谈对象提出“是否因刷手机短视频和父母（或子女）产生过冲突”的21组访谈对象中，12组曾发生过冲突，占总数的57.1%。从年龄来看，只有一位在9岁时与父母发生冲突，其他因短视频产生冲突的家庭都是在孩子11岁以后。

#### 1. 管理失控引发矛盾

在一些家庭中，管理通过父母提前制定规则，并在说明规则（小部分和孩子协商）后执行，

在另一些家庭中也表现为试探-观察-调整的动态管理驯化。访谈对象中有五个家庭的父母都曾给过子女手机，但一段时间后，发现孩子管不住自己，就又把手机收回了。M14发现孩子一心刷抖音，学习成绩都下滑了，就把手机收走了。父母意愿与孩子实际使用之间呈现出分裂式图景<sup>[52]</sup>时，手机被父母收回。学习成绩和刷短视频的时间是最直观的可以影响驯化过程的依据。没有说好规则或不按规则执行的，或随意凭感受管理的短视频驯化带来了更多的使用、沉迷或不满，引发了更多“父母-子女”矛盾。

孩子想刷更长时间的短视频或频繁地使用手机破坏了父母对子女短视频使用时间和频率的管理，引发亲子间冲突。M9在女儿上四年级前和丈夫一起在上海打工，回家专门照顾孩子后发现了D9有偷偷刷短视频的问题，于是她对D9作了时间规定，并在她身边监督。如果D9违反管理规定，M9就让D9刷一天半短视频，刷到头昏脑涨眼晕。为了检验效果，她将手机放在D9的卧室，D9经历了内心的挣扎，最终控制住了自己。但当说到因为短视频和家长产生的不愉快时，D9认为当时M9把手机放在她的卧室，让她经过的内心挣扎其实是不必要的。父母管理的失控和手机的争夺会引发“父母-子女”之间的不愉快、冷战、争吵等情感冲突。

“给手机设置密码”“想把手机放在自己身边”“把自己卧室门反锁了刷短视频”这些行为既是孩子对父母管理的反抗，也是迫切地想建立私人场域的体现，这些情况在九年级及以上学段孩子中较为明显。然而，当一道门锁起来之后，父母“不知道他在里面学习还是玩手机”（M17），实体空间的分离，让一些父母感到慌张。害怕孩子看一些不好的内容，滋长了父母的愤怒。父母创建新抖音账号以访问被孩子屏蔽了的短视频个人空间（M21），满足对子女的全知式掌控，子女虽知道父母的访问，但沉迷于虚拟空间的子女不屑于和父母表达，这让父母的“不知”和因“不知”滋长的愤怒加剧，孩子和父母之间的交流被一道实体的门



和一道虚拟的门完全阻隔。

## 2. 显性负面反馈激化冲突

孩子因为使用短视频学习成绩下降、学习态度敷衍、视力下降或出现很难静心学习的身体神态信号，以上作为显性的失败的短视频驯化反馈刺激了不太会教育的父母，教育方法失当的父母有时会打孩子。据 M17 回忆，一次她不在家，S17 考试的时候留了很多基础题的空白，这被认为与在生活中刷手机短视频或游戏有关，于是孩子被爸爸打了，这样的事情发生过三四次。S7 和 S19 因为刷短视频和妈妈吵架或冷战，S19 还曾一度自残，M14 描述他们在家各玩各的手机，互相不说话，后来女儿不喜欢和她沟通了。

本研究发现，亲子之间的短视频冲突在青少年早期<sup>①</sup>较为多发，这一期间的矛盾多是时间、频率管理失控引起，而青少年中期的矛盾则指向了孩子构建私人场域和父母期望全面掌控之间的矛盾上。从家庭特征方面，虽然本研究选取的研究对象均为在县城居住三年以上的家庭，但从驯化的长期过程来看，不少家庭仍经历了或正在经历不同程度的流动。流动在田野点所在的西部县城具有普遍性、动态性和间隔性等特点。本地流动，如孩子小时候在爷爷奶奶所在的乡镇或农村长大的情况普遍存在。还有其他流动情况，如从外地来到该县做生意逾 10 年的家庭；初中前随父母工作从深圳到河南，初中时和母亲一起回到老家正宁，初二时，母亲又外出做生意，等等。F11 和 F18 家庭中存在三代同住的情况。结合家庭手机短视频使用的集体驯化和驯化后的认同来看，核心家庭虽存在一些矛盾，但父母对孩子采用更宽容的态度，冲突后孩子也更多地对父母表示理解，出现过严重冲突的则以流动家庭、留守家庭为主，可见县城流动家庭和留守家庭也值得更多研究者加以关注。

## 3. 讲道理或不处理的应对方式

冲突的解决一般会通过不处理、讲道理、

和孩子谈心、“父母看家庭教育、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方面视频”等方式解决。在管理的动态中，大部分子女对父母的管理表示认同。然而讲道理作为动机阐释方式亦是父母权威的重申，这一过程以父母的单方面输出为主，主要内容亦是使用短视频对孩子眼睛不好、影响学习等大而化之的老生常谈，体现为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所说的限制型符码（restricted code）<sup>[53]</sup>。谈心的方式通过引导孩子自己分析使用短视频的影响，起到了更好的调解作用，但还未达到伯恩斯坦所说的精致型符码（elaborated code）<sup>[54]</sup>的效果。一味讲道理可能会引发子女的反感，进而更加逃避到短视频中去寻找虚拟满足。县城父母的调解方式处在城市和乡村的中间状态。

## 四、结论与讨论

家庭互联网、智能设备、手机使用中的矛盾或指向父母教养方式<sup>[55]</sup>、亲子关系，或指向家庭时空的再造和子女私人领域的创设<sup>[56]</sup>、家庭秩序的失序和重塑<sup>[57]</sup>，这些研究结论为本研究提供了认识短视频嵌入家庭后家庭时空、沟通等问题状态的基础。然而，从集体驯化的视角研究这一问题，却更清晰地发现了“父母-子女”在短视频驯化过程中的互动。研究发现，集体驯化中存在着可见的工具维度的管理，但“父母-子女”隐藏起来的不可见的集体驯化的价值维度也应该引起重视。中小學生家庭短视频集体驯化中的规则和执行更多地影响了协调和编排。

### （一）规则与执行组织下的短视频集体驯化

在家庭成员集体驯化短视频的场景下，制定规则和规则的执行比起使用的动机、对动机解释的争议、结果（反馈）和协调更为日常和重要。这是有未成年子女家庭和平常化游戏社区形成的管理型集体驯化的不同之处，后者的管理程度更多与动机不一致有关。以往关于子女数字媒介使用的研究常常将子女使用互联网

① 注：青春期是个体生物功能、自我认知和社会能力高速发展的时期，通常分为三个阶段：早期（10-12 岁）、中期（13-15 岁）和晚期（16-18 岁）（Sumter et al., 2009）。转引自王歆逸，刘思含，伍新春. 父母过度教养和亲子冲突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及发展性差异 [J]. 应用心理学, 2023, (1): 71-79.

的父母干预归于父母教养方式<sup>[58]</sup>，访谈发现县城家庭父母教养方式多属于权威式和专断式，这和林小英关于县中家长教养方式的研究<sup>[59]</sup>结论一致。本研究从集体驯化角度切入，将父母教养这一稍显笼统的结论细化，发现在县城中小学家庭集体驯化短视频中，除动机、对动机解释的争

议和结果外，规则与执行更大程度地影响着协调与编排（图1）。在提前说明规则、协商制定规则、严格执行规则的家庭中，通常短视频的集体驯化表现出良性的效果和较高的子女认可；在不说明规则、凭感受执行规则的家庭中，短视频集体驯化容易出现冲突。中小學生家庭和基层游戏社区、随迁老人的社区兴趣群不同，由于中小學生自制力参差，因此，管理中父母能否根据子女的自控能力、学习阶段、自身特点，制定或协商规则和严格执行规则较其他因素都更多地影响了集体驯化的协调和编排。

（二）可见的工具维度和不可见的价值维度

当短视频成为每个个体所想的和所做的绝大部分事情相互作用的最为普遍的象征环境<sup>[60]</sup>或温尼克特所说的转换客体时，和电视不同的是，每个人的象征环境是不同的，且象征环境是流动的、虚实结合的，是和身体捆绑的。拿着手机刷短视频的个体成为了一个“赛博格”身体<sup>[61]</sup>，通过姿态表达一种交往意向。父母通过占有、合并环节的规则和执实施着对子女可见的工具维度的显性管理。这种管理因为嵌入了家庭短视频使用矛盾的动机中而更为严格，这和克里斯汀（Kristine Ask）等对魔兽世界团队副本（raid）研究中的管理型集体驯化结论一致。显性管理是把短视频当作学习、娱乐或放松的工具维度的管理，在纵向驯化阶段性上，父母对孩子短视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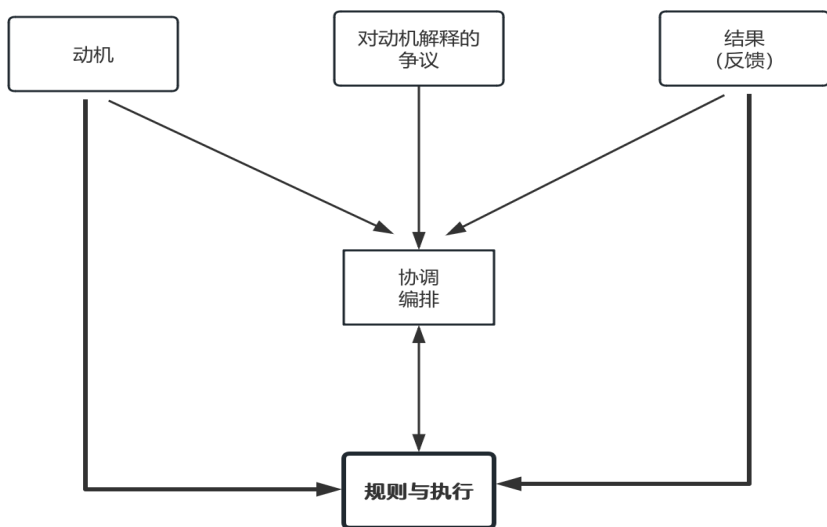


图1 中小學生家庭短视频集体驯化的影响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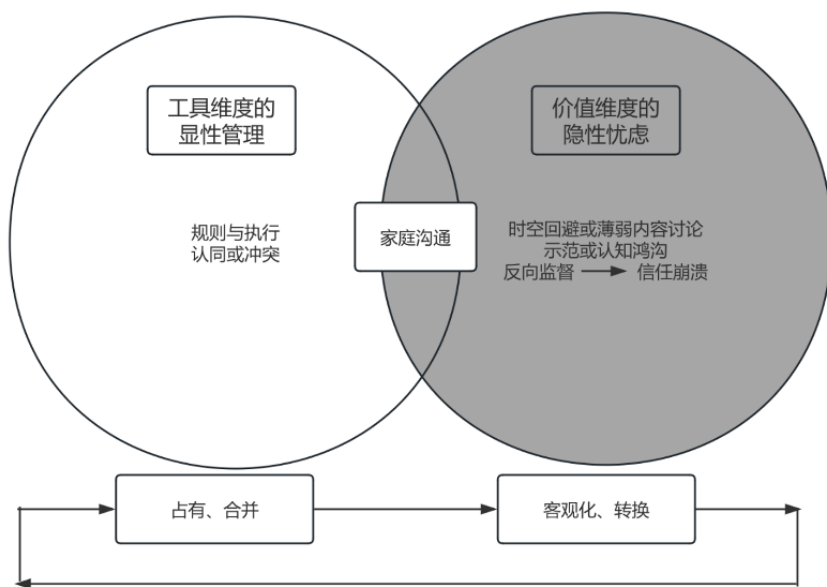


图2 县城家庭短视频集体驯化的管理和隐忧





的管理化驯化表现出了普遍性和在低龄子女家庭中的必要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家庭教育学校化的问题图(图2)。

工具是实现目的的手段,作为手段始终是短暂的、浅层的,不像价值的影响那么深入,更具有恒常性。然而,“父母-子女”互相不交流短视频内容这一问题背后却隐藏着可能的认知鸿沟、信任崩溃、父母对短视频传递价值的不确定或对孩子使用短视频负面影响的过度估计等问题,这样一来,青少年使用短视频的机会几乎因为上述隐藏的问题而被忽视了。这就是家庭化短视频集体驯化中客观化和转换环节中不可见的价值层面。价值维度的潜在矛盾和问题会引发更激烈的工具维度的管理和冲突。问题最终还是指向了家庭沟通,各自使用,又较少讨论的短视频使用方式可能让“父母-子女”成为亲密连接的“数字孤岛”。价值层面不可见可能的原因是父母对青春期子女性教育问题的不知所措和对短视频内容(如色情内容)、社交风险的忧虑<sup>[62]</sup>等。本研究发现,即便在同一县城,父母和子女关于短视频内容的探讨、父母为子女推荐的短视频也存在着较大差异。少数家长结合自己的教子观,为孩子推荐如荒野求生视频、帮助孩子探索和孩子兴趣相关的视频,这些差异与父母的过往经历和对子女教育的期望有一定关联。

### (三)短视频集体驯化效能提升需三方合力

基于研究发现和主要结论,本研究认为父母、短视频平台和家庭教育相关社会工作的三方合力或可提升西部县城中小学生学习短视频集体驯化的效能。首先,父母需要分阶段做好显性管理和隐性价值讨论的结合。对年龄尚小,自控能力还不够的小学生来说,父母可以对子女能否有手机和使用时间制定好精细管理规则,并严格执行。但在初高中阶段的青春期中,父母要更加尊重子女的自主性,尽量能够如F5所说的“光明正大”地共同使用、讨论短视频内容,和子女协商制定家庭短视频使用规则,促进青少年的媒介技能反哺和家庭沟通。其次,作为服务提供的平台也应该继续优化算法推荐机制,

加强优质内容的制作、宣传和推送,共同优化青少年的视听环境。最后,根据管理与反向监督的技术特性,父母尤其应该加强技术学习。父母要多了解关于未成年人模式、短视频平台的定位和差异等,家庭教育相关社会工作也可以增加关于媒介素养提升的父母课堂,以此让父母可以更好地作为指导者和共同使用者角色参与到家庭短视频集体驯化中,避免深度媒介化环境下家庭媒介管理差异带来的认知鸿沟。

本研究的贡献在于:首先,本研究发现中小学生学习家庭“父母-子女”集体驯化短视频中存在着显性的工具维度和隐性的价值忧虑。其次,在中小学生学习家庭短视频集体驯化的动态中,规则与执行比动机更为日常。规则与执行是更具有可效仿性、实践性的措施,这让本研究更具有社会应用价值。最后,本研究的发现之一,子女基于数字痕迹的反向监督对沉迷于短视频的父母施展的权威式管理提出了挑战,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方向。

本研究也有一定局限性,针对家庭情境如果能选择典型的家庭做参与式观察或能继续把研究推向深入。未来的研究还可以针对家庭媒介时间管理与家庭秩序、共同生活的城市家庭“父母-子女”如何集体驯化短视频,短视频中介的家庭教育“学校化”在城市有什么样的表现等问题展开研究,也可以进一步探索城市、县城、农村媒介化家庭的秩序变化和重塑差异。

(责任编辑:李韵奕,实习编辑:尹婧雯)

### 参考文献

- [1]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孙红艳.“未成年人短视频使用与学习研究报告”显示:超八成受访未成年人使用过短视频——未成年人使用短视频从娱乐逐渐转向寓教于乐[EB/OL].(2023-07-13)[2024-08-16].[http://news.cyol.com/gb/articles/2023-07/13/content\\_zxGIMZHYlq.html](http://news.cyol.com/gb/articles/2023-07/13/content_zxGIMZHYlq.html).
- [2][21][33] 章平,于佳鑫,朱凯,等.短视频使用、家长干预与儿童学业成绩之关系研究[J].新闻大学,2023(5):80-93+121-122.
- [3][6][35] 凤凰网.国内首份《县城未成年人网络消费调研报告》发布:有些数据令人震惊[EB/OL].(2024-08-02)[2024-10-19].<https://gongyi.ifeng.com/c/8bhCradKEHw>.
- [4] 郑春风.乡村家庭、儿童手机实践与父母媒介干预困境——基于GH乡的民族志考察[J].新闻记者,2022(2):71-82.

- [5] 高文斌. 儿童上网: 看看专家怎么说 [M]. 第1版. 中国健康传媒集团.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9:95.
- [7] 李岳, 范立尧, 朱短知, 等. 短视频用户发展报告 [C]//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监管中心, 中广联合会微视频短片委员会, 编. 中国短视频发展研究报告 (2023) [M]. 第1版.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23: 117.
- [8][41][60] 罗杰·西尔弗斯通. 电视与日常生活 [M]. 陶庆梅译. 第1版.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123;168;205.
- [9][43] 李锦辉, 颜晓鹏. “双向驯化”: 年轻群体在算法实践中的“人机关系”探究 [J]. 新闻大学, 2022(12):15-31+121-122.
- [10][11][14][15][40] Ask, K., Sørensen, K. H. Domesticating technology for shared success: collective enactments of World of Warcraft [J].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18.22(1):73-88.
- [12] Haddon, L. Roger Silverstone's legacies: domestication [J]. *New Media & Society*, 2007.9(1):25-32.
- [13] 施蒂格·夏瓦. 文化与社会中的媒介化 [M]. 刘君, 等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108.
- [16] 徐仁翠. 驯化: 山东D村村民的抖音实践 [J]. 新闻记者, 2022(3):86-96.
- [17][31] 朱秀凌. 青少年的手机使用、数字代沟与文化反哺——基于对福建省漳州市中学生家庭的实证分析 [J]. 新闻界, 2015(11):47-53.
- [18][19][56] 朱秀凌. 控制与协商: 手机对青少年“私人场域”的建构与入侵——基于中学生家庭的实证研究 [J]. 中国青年研究, 2015(1):48-54.
- [20][23][32][45] 刘王平, 郑欣. 手机争夺战: 智能设备监管与农村留守家庭秩序研究 [J]. 新闻记者, 2022(8):84-96.
- [22] Sonia Livingstone, Giovanna Mascheroni, Elisabeth Staksrud, European research on children's internet use: Assessing the past and anticipating the future [J]. *New Media & Society*, 2018, 20(3): 1103-1122.
- [24] 林仲轩, 张司佳. 关系视角下的父母媒介干预: 数字时代智力与发展障碍家庭父母的混合式教养策略研究 [J]. 新闻界, 2023(2):32-43+56.
- [25][47] Livingstone, S., Helsper, E. J. Parental Mediation of Children's Internet Use [J].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2008.52(4):581-599.
- [26] Nathanson, A. I. Parent and Child Perspectives on the Presence and Meaning of Parental Television Mediation [J].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2001.45(2):201-220.
- [27] Nelissen, S., Van den Bulck, J. Expanding the Unidirectional View on Parental Television Mediation: Children's Guidance of Their Parent's Television Use [J].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2018.62(2):232-250.
- [28] Valkenburg, P. M., Piotrowski, J. T., Hermans, J., et al. Developing and validating the perceived parental media mediation scale: A self-determination perspective [J].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13.39(4):445-469.
- [29] 朱秀凌. 知沟弥合: 家庭传播研究的国际前沿与自主构建 [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3,52(3):123-133.
- [30] 甘雨梅. 远程媒介化抚育中的“脚手架”、身体及物质性——以留守儿童与打工父母的视频通话研究为例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3,30(1):85-102+128.
- [34] Fan, M., Antle, A. N., Lu, Z. The use of short-video mobile apps in early childhood: a case study of parental perspectives in China [J]. *Early Years*. 2023.43(4-5):952-966.
- [36] He, Y., Liu, X., Xiong, H., et al. A gateway to acquaintance community: Elderly migrants' collective domestication of interest-oriented group chats in China [J]. *New Media & Society*. 2024.26(8):4390-4408.
- [37][38] 刘国斌.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县城的突出作用与发展机制研究 [M]. 北京: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8:104;122.
- [39] Anique J Scheerder, Alexander JAM van Deursen, Jan AGM van Dijk, Internet use in the home: Digital inequality from a domestication perspective [J]. *New Media & Society*, 2019,21(10):2099-2118.
- [42][62] Haddon, L. Mobile media and children [J]. *Mobile Media & Communication*. 2013,1(1):89-95.
- [44] 理查德·赛勒·林. 习以为常: 手机传播的社会嵌入 [M]. 刘君, 郑奕, 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0:106.
- [46] 曹玥, 郑欣. 权力的流动: 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媒介化及其结构变化 [J]. 当代传播, 2023(4):54-58.
- [48] 田丽, 彭炳辉. 未成年人短视频使用及其成长发展调研报告 [C]// 方勇, 季为民, 沈杰, 等. 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 (2024)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4:364.
- [49] 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新时期家庭教育的特点、理念、方法研究》课题组. 我国家庭教育的现状、问题和政策建议 [J]. 人民教育, 2012(1):6-11.
- [50][57] 朱秀凌. 手机对青少年家庭代际传播时空的重塑 [J]. 编辑之友, 2015(9):15-18.
- [51] 刘倩欣, 刘涛. 视频化生存时代的失神症及其时间弥合机制研究 [J]. 新闻大学, 2024(4):93-104+120.
- [52] 吕山, 李熠, 林颖. 远距离“做家庭”: 留守儿童家庭的媒介驯化与亲职实践 [J]. 新闻与写作, 2022(11):92-106.
- [53][54] 周敏, 杨玉亭, 张睿, 等. “鸡娃”抑或“放羊”: 媒介技术如何重塑阶层化教养?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4,31(3):47-59+127.
- [55][58] Livingstone, S., Mascheroni, G., Dreier, M., et al. How parents of young children manage digital devices at home: The role of income, education and parental style [M/OL]. London: EU Kids Online. 2015.14[2025-03-10]. <http://hdl.handle.net/10807/67803>.
- [59] 林小英. 县中的孩子: 中国县域教育生态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195.
- [61] 徐辰烨, 彭兰. 从“人”到“赛博格”: 技术物如何影响日常交往行为? ——以耳机为例 [J]. 新闻界, 2023(4):34-46.



**Intimately Connected “Digital Silos” : Coordination and Conflict in the Collective Domestication of short videos in the County town families** ——Taking households with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Gans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Hong Jiewen, Zhang Lipi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short videos have been rapidly and deeply embedding into common people’s everyday life. However, parents-children in county families with academic expectations and burdens are always conflicted about the use of short videos. Through semi-structured collaborative interviews with 21 familie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Z County Town, Gansu Province, this paper finds that domestication of short videos in these families mostly exhibit a kind of management collective domestication in which the whole family participates and parents take the lead. Explicit management of tool dimensions and weak discussions based on short video content may leave family members as “Digital Silos” of intimate connections. In families with engaged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rules and enforcement influence coordination and orchestration to a greater extent in the collective domestication of short-videos than factors such as motivation. Children’s reverse observation and technological supervision based on the digital trace poses challenges to parents with short-video addiction to manage their children. The tripartite collaboration among parents, short video platforms and social work related to family education may promote the efficacy of collective family domestication of short videos.

**Keywords:** domestication; collective domestication; short-video use; management; reverse supervision

**Authors:** Hong Jiewen, Research Center of the Media Development,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Zhang Lipi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 The College of Journalism and Media, Leshan Normal University.



# 时空连接与代际互通： 露天电影城市公共空间“再放映”的价值 意涵与文化记忆联结机理

马梅 李娅

**摘要** 媒介生态深度变迁下，露天电影本应在演进中逐步走向消亡，但现实图景却呈现出耐人寻味的反向张力，当下城市公共空间的露天电影“再放映”吸引了众多民众与睽违已久的观影体验形成跨时空对话。通过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与文本分析，将露天电影放映、观看视作媒介与记忆实践，提示我们思考文化记忆所依凭的媒介物质性与文化记忆的具身性。研究发现，在城市开放空间放映的露天电影让人们重识“附近”，以具身体验塑造城市地方感；其“再放映”串联过去、当下与未来，在怀旧溯源、当下集体欢腾中滋养未来；时空交叠的代际观影实践则将个体经验融入集体记忆，实现文化记忆跨代传递与共同体形塑。

**关键词** 露天电影；城市公共空间；文化记忆；代际传承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马梅，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安徽合肥 241002；李娅，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安徽合肥 241002

露天电影曾作为一种全民参与的文化活动，在人们构建社会信息网络、形塑时代认知图景与满足娱乐需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依托特定地理空间展开的集体观影行为，不仅联结了人与物理场域，更促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共鸣。而在当前数字媒介深度重构社会感知下，“地方感”的消解与现实公共交往的疏离，可能会带来社会关系的液化化与记忆时空断裂的困局。露天电影作为一种传统的公共文化实践形式，近年来在城市公共空间中又重新兴起，不再是文化下乡或是缓解城市社区空巢老人、乡村留守人士的文化渴求的公益帮扶形式，而是以开放的观影场域与共享的情感仪式，表现出新的文化消费特征，为社会提供了一种弥合可能，所以本文称之为“再放映”。

尽管露天电影在学界并非一个新话题，但既有研究多将其纳入电影史脉络，较少将放映与观看整体视作一种媒介实践，也缺乏落脚民众日常生活实践的社会意义与精神价值解读。与此同时，露天电影承载着几代人的难忘体验，因此其价值探赜必然与“记忆”这一关键要素相连，但以往对露天电影的考

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乡村文化数智化传播研究”（24BXW071）。



察囿于功能主义视角，且未能从文化记忆的角度触及露天电影的“再放映”。基于此，本文通过对安徽省芜湖市露天电影节的参与式观察、32 位观影者的深度访谈及全国多地放映活动的文本分析，试图回应以下问题：在影院普及、移动终端泛在化的时代，露天电影为何还能赢得人们青睐？露天电影的再放映具体有哪些方面的价值？传播与它相关的记忆又有何种意义？带着上述疑问，笔者引入文化记忆理论，旨在阐释露天电影“再放映”在当代城市公共空间中的独特价值与文化记忆联结机理。

## 一、文献综述

### （一）作为媒介实践的露天电影放映

露天电影是指在室外放映的电影，它是一种不同于影院封闭空间的，在特定时空内的开放的电影<sup>[1]</sup>。自新中国成立，为有效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充实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央政务院和文化部电影局多次扩大电影放映队伍、增加流动放映队，深入各地的厂矿、乡村和部队，真正建立了一个面向全国的电影放映网<sup>[2]</sup>，露天电影成为满足广大基层受众需求的放映形式。常态性的流动放映队不仅是城市文化向乡村输送的通道，也是党和政府的政策面向基层传播的重要渠道，承担着解读时事政策、移风易俗、宣传教育的职能。20 世纪 80 年代 97.5% 的生产大队都深受电影文化之惠<sup>[3]</sup>。

电影中呈现的景象给民众以生活追求方向，并且充当了民众想象自身国族身份所凭借的机制<sup>[4]</sup>。从民众间交流的角度出发，露天电影具有与生俱来的仪式感与狂欢气息<sup>[5]</sup>，它与室外场所、自然环境结合的丰富性所带来的独特心理<sup>[6]</sup>，创造了集体生产之外民众之间亲善而自在的接触场景。由此，在那个物质与精神生活尚不富裕的年代，露天电影成为诸多中国观众洞悉时代发展和塑造自我认知的一扇窗口，在新中国意识形态建构中发挥着无可置疑的作用，其生动活泼的形式与蕴含着的国家民族情怀，是露天电影至今让人感怀的重要原因。

21 世纪初的中国，虽然在农村仍有诸如

“2131”送电影下乡等工程，但在全国人口向城市流动，以及电影放映机制转型、媒介生态变迁的多重语境下，露天电影已不复早日的红火景象。自 2002 年全面推进全国电影院线制改革以来，全国影院数量呈现指数级增长态势，截至 2023 年底全国已有影院 14395 家<sup>[7]</sup>，商业影院完全可以满足高标准的视听需求。与院线制改革形成同频共振的，还有移动互联网普及带来的技术民主化进程，其彻底解构了露天电影这一观影方式的必要性，信息获取、文化消费和娱乐休闲完全可以通过个体化的移动终端实现。

在此背景下，露天电影本应在媒介演进中逐步走向消亡，但现实图景却呈现出耐人寻味的文化实践双重性。经研究者统计，近年来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开展了露天电影放映活动，可见全国露天电影再放映的广泛性与普遍性。并且不少城市诸如南京、深圳、武汉等市开展的露天电影放映活动在社交媒体上频频出圈。在当前迈向物质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语境下，露天电影作为一种电影展演形式的“没落”与民众参与度不减的“复兴”之间的张力发人深思，然而既有研究大多将露天电影放置于电影史的脉络中，未能充分解释这种悖论。因此，本文将露天电影在当下的放映与观众的观看实践相勾连，将其整体视作一种媒介实践，探讨露天电影在城市公共空间复兴这种再放映的价值意涵。

### （二）文化记忆及其周边概念

露天电影作为跨越数代人的一项集体文化活动，其价值探赜必然与“记忆”紧密相连。与之相关，“文化记忆”指涉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集体记忆力，所要回答的是“我们是谁”和“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文化认同性问题<sup>[8]</sup>，这点明了身份定位是文化记忆的重要功能：其一，承担着将集体知识世代传承的重任，以此助力后代构建文化身份；其二，塑造一个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过往，向他们传递一种整体意识与历史意识<sup>[9]</sup>。学者们倾向于将文化记忆理论视为考察群体认同构建<sup>[10]</sup>、传统延续<sup>[11]</sup>及价值

观传承<sup>[12]</sup>等一系列广泛议题的窗口。然而，社会作为一个抽象的集合概念，其自身并不具备记忆的能力，它需要借助无数个体与多样群体共同构成。因此，任何文化记忆的传承与扩散，一方面离不开物质性媒介；另一方面，记忆的建构与传播也要依赖人本身的口耳相传与身体实践，即“以人为媒”。所以在文化记忆的相关论述中，会不可避免地会与媒介记忆交叉。但本文的理论落脚点，仍然是文化记忆。

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认为，以亲身经历事件的方式传承特定的记忆，或是前往相关记忆之场开展集体纪念活动，是集体记忆传承的有效方式<sup>[13]</sup>。沿此路径，这类研究从“通过媒介进行的记忆”扩展到更广泛的记忆实践。譬如，通过参观“时光博物馆”等场域，代际之间的连接及个体经验与国家经验的桥接得以实现<sup>[14]</sup>，与之相似，观看春晚也是一种记忆实践，这一行为扮演着记忆唤起和操演的承携者角色<sup>[15]</sup>。由此可见，记忆实践的重要意义在于能够激活文化事物的内在信息和文化意涵，使之可听、可见、可被理解，让人们付诸行动并参与其中。

本文在这一脉络中，将当下城市公共空间中的露天电影放映及其观影体验视为文化记忆实践，关注溢出电影文本而走向物质性实践和关系连接的范畴。本文中的“文化记忆”，指通过露天电影再放映实践所激活的以电影文本为内容载体、以公共空间为物质场域、以集体观影为身体实践的复合型记忆形态。它既包括影片所承载的历史叙事、民族精神与价值观念，更涵盖具身观影中形成的集体情感、代际经验与地方认同。露天电影承载着个人与集体的回忆、情感，它经历相当长时间的沉寂后再度兴起，因此当下的再放映必然与一定的记忆勾连，但从文化记忆角度研究露天电影放映，将之视作媒介实践与记忆实践的研究依然相对少见。因此，本研究意图延续在特定社会情境和参与者关系中进行考察的路径，核心问题意识在于：露天电影放映如何塑造着人们的文化记忆。研究引入经验材料，旨在让承携文化记忆的观众

自己回答：在当前的社会文化生活中，人们为什么仍回忆放映露天电影的时光？回忆它意味着什么？它又是如何被我们记忆的？

##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 （一）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

研究者于2024年9月至10月在安徽省芜湖市中心的神山公园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实地观察。据统计，2024年在此地放映的露天电影总观看人数接近2万人，单次观影人数超过千人<sup>[16]</sup>。鉴于其放映持续时间较长、观众数量较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故而被选定为研究的观察地点。电影放映集中于周末与节假日，因此受众群体具有天然异质性。现场观众有的是朋友同学因社交娱乐结伴观影，有的是一家三代团聚观影，还有外地旅客前来观影。研究者选取在观影过程中较为沉浸的32名观众进行面对面访谈，受访者年龄跨度为15~68岁，能够反映代际认知差异；职业类型覆盖《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中八大类的五大类；地域分布涉及5省份十余个地市，具有一定的差异性；性别比例较为均衡。为确保研究的规范性与可追溯性，访谈对象均按照访谈顺序与姓氏首字母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编码，具体信息如表1。访谈问题围绕三个层面展开：其一，在行为与内容层面，关注受访者前来观看露天电影的动机、过往观影经历及记忆深刻的观影体验；其二，在认知与感受层面，聚焦受访者在露天观影中的身体感知，探究何种因素激发了他们的正面或负面情感体验；其三，在情感与互动层面，考察受访者与共同观影的家人朋友及身旁陌生人之间的互动情况，包括互动的形式、内容、频率及对受访者情感和认知的影响等。

研究者在观察期间同步记录影片信息，以初步建立电影内容与观众行为、情感反应的关联性。2024年芜湖市共放映15场露天电影，类型涵盖战争片、动作片、科幻片、动画片等（表2），其中既有承载中国人民抗战记忆的《地道战》、书写家国情怀的《我和我的祖国》，还有《哪





表 1 受访者基本信息

| 编码    | 年龄 | 性别 | 职业   | 所在地  | 访谈时长  | 编码    | 年龄 | 性别 | 职业    | 所在地  | 访谈时长  |
|-------|----|----|------|------|-------|-------|----|----|-------|------|-------|
| S1-W  | 29 | 女  | 家庭主妇 | 安徽芜湖 | 40 分钟 | S17-Z | 34 | 男  | 软件开发  | 安徽芜湖 | 40 分钟 |
| S2-L  | 64 | 男  | 退休职工 | 安徽芜湖 | 36 分钟 | S18-H | 34 | 女  | 文员    | 安徽蚌埠 | 33 分钟 |
| S3-X  | 29 | 女  | 公司职员 | 安徽芜湖 | 43 分钟 | S19-Z | 18 | 女  | 大学生   | 安徽安庆 | 30 分钟 |
| S4-L  | 41 | 男  | 技术人员 | 安徽宣城 | 50 分钟 | S20-H | 60 | 男  | 工人    | 江苏徐州 | 50 分钟 |
| S5-F  | 45 | 男  | 行政   | 安徽芜湖 | 30 分钟 | S21-W | 24 | 女  | 硕士生   | 山东聊城 | 45 分钟 |
| S6-Z  | 34 | 女  | 公司职员 | 安徽安庆 | 36 分钟 | S22-Z | 32 | 女  | 家庭主妇  | 安徽阜阳 | 36 分钟 |
| S7-W  | 47 | 女  | 家庭主妇 | 安徽芜湖 | 47 分钟 | S23-C | 65 | 男  | 退休职工  | 黑龙江  | 42 分钟 |
| S8-L  | 35 | 女  | 幼师   | 安徽淮南 | 30 分钟 | S24-L | 37 | 男  | 公务员   | 安徽芜湖 | 53 分钟 |
| S9-L  | 42 | 女  | 家庭主妇 | 山东   | 45 分钟 | S25-X | 35 | 女  | 老师    | 湖南   | 48 分钟 |
| S10-G | 32 | 男  | 经理   | 安徽芜湖 | 37 分钟 | S26-S | 53 | 男  | 公司职员  | 安徽芜湖 | 30 分钟 |
| S11-Z | 30 | 男  | 工人   | 安徽芜湖 | 35 分钟 | S27-F | 35 | 女  | 自由职业  | 安徽芜湖 | 30 分钟 |
| S12-X | 62 | 男  | 退休职工 | 安徽黄山 | 46 分钟 | S28-J | 38 | 女  | 未知    | 安徽芜湖 | 31 分钟 |
| S13-W | 36 | 男  | 个体   | 安徽芜湖 | 44 分钟 | S29-L | 30 | 男  | 运营    | 安徽芜湖 | 30 分钟 |
| S14-P | 15 | 女  | 中学生  | 安徽芜湖 | 35 分钟 | S30-L | 43 | 男  | 房产经纪人 | 安徽芜湖 | 32 分钟 |
| S15-G | 18 | 男  | 大学生  | 安徽宣城 | 52 分钟 | S31-C | 68 | 男  | 退休职工  | 安徽宣城 | 33 分钟 |
| S16-Z | 19 | 男  | 大学生  | 安徽滁州 | 51 分钟 | S32-L | 55 | 男  | 个体    | 山东济南 | 47 分钟 |

表 2 2024 年芜湖市露天电影放映信息

| 序号 | 片名           | 类型     | 放映时间     |
|----|--------------|--------|----------|
| 1  | 《战狼 2》       | 动作片    | 8 月 30 日 |
| 2  | 《哪吒之魔童降世》    | 动画片    | 8 月 31 日 |
| 3  | 《夏洛特烦恼》      | 喜剧片    | 9 月 1 日  |
| 4  | 《孤注一掷》       | 反诈骗犯罪片 | 9 月 6 日  |
| 5  | 《长安三万里》      | 动画片    | 9 月 7 日  |
| 6  | 《地道战》        | 战争片    | 9 月 8 日  |
| 7  | 《流浪地球 2》     | 科幻片    | 9 月 14 日 |
| 8  | 《飞驰人生 2》     | 喜剧片    | 9 月 20 日 |
| 9  | 《熊出没·伴我“熊芯”》 | 动画片    | 9 月 21 日 |
| 10 | 《长津湖》        | 战争片    | 9 月 22 日 |
| 11 | 《我和我的祖国》     | 剧情片    | 10 月 1 日 |
| 12 | 《姜子牙》        | 动画片    | 10 月 2 日 |
| 13 | 《热辣滚烫》       | 喜剧片    | 10 月 3 日 |
| 14 | 《湄公河行动》      | 动作片    | 10 月 4 日 |
| 15 | 《功夫》         | 喜剧片    | 10 月 5 日 |

吒之魔童降世》等蕴含中国传统文化的动画片，这些影片的强公共性、强情感共鸣性及内容类型的多元化、经典性，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老年、中青年、儿童等不同年龄段人群的观看需求，并且每场电影播放片单均由民众投票产生，更彰显了露天电影的全民性、普适性的特点。

#### （二）文本分析法

经梳理各地新闻报道发现，近年来城市露天电影放映可覆盖 31 个省级行政区（港澳台地区除外），部分信息如表 3。为有效弥补因访谈地域相对单一化可能带来的研究局限性，研究者在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文本分析法，将各地的新闻报道及社交平台帖文作为本研究的二手材料。通过对这些文本资料进行梳理，旨在补充与完善全国范围内城市公共空间露天电影放映的开展情况，包括不同地区的放映特点、观众反馈、文化影响等方面。

### 三、连接空间：露天观影对“人-城”关系的重塑

露天电影再放映对人-城关系的重塑，既

表3 近三年全国部分主要城市露天电影放映情况

| 序号 | 放映地点    | 放映日期            | 序号 | 放映地点 | 放映日期            |
|----|---------|-----------------|----|------|-----------------|
| 1  | 陕西西安    | 2025年7月11日      | 16 | 新疆昌吉 | 2024年8月3日       |
| 2  | 甘肃武威    | 2025年6月27日      | 17 | 四川成都 | 2024年8月1日       |
| 3  | 湖南长沙    | 2025年5月23日      | 18 | 湖北武汉 | 2024年7月24日—8月4日 |
| 4  | 辽宁沈阳    | 2025年5月21日—6月3日 | 19 | 河南濮阳 | 2024年7月20日      |
| 5  | 青海西宁    | 2025年5月18日—25日  | 20 | 山东济南 | 2024年7月19日      |
| 6  | 河北廊坊    | 2025年5月16日      | 21 | 宁夏银川 | 2024年7月18日      |
| 7  | 黑龙江哈尔滨  | 2025年5月1日       | 22 | 浙江杭州 | 2024年7月11日      |
| 8  | 重庆      | 2025年2月28日      | 23 | 吉林通化 | 2024年7月4日       |
| 9  | 海南海口    | 2025年1月25日—2月4日 | 24 | 山西太原 | 2024年6月15日      |
| 10 | 广东广州    | 2024年11月23日     | 25 | 江西九江 | 2024年5月29日      |
| 11 | 西藏拉萨    | 2024年10月26日     | 26 | 北京   | 2024年5月4日—6月23日 |
| 12 | 江苏苏州    | 2024年10月6日      | 27 | 广西百色 | 2024年5月2日       |
| 13 | 贵州安顺    | 2024年9月20日      | 28 | 云南丽江 | 2024年4月26日      |
| 14 | 内蒙古呼和浩特 | 2024年8月19日      | 29 | 上海   | 2023年8月2日       |
| 15 | 福建龙岩    | 2024年8月15日      | 30 | 天津   | 2023年7月21日      |

源于其开放的场域，也在于播映的影片内容将日常场所转化为具象的情感与思想场域，为地方感的生成提供文化动能。

（一）作为第三场所的露天电影放映场

在地理学和建筑学领域，可达性（accessibility）被认为是公共空间中的重要属性<sup>[17]</sup>，然而现代城市对空间功能的严格分区，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社会肌理中的可达性与公共性潜能。具体而言，现代的娱乐活动已不可避免地染上了消费主义的色彩——商业综合体、院线影城等付费场所构筑起参与的门槛，致使低收入群体或行动不便的人群在付费文化中陷入边缘化境地，这种空间正义的失衡，恰恰反衬露天放映场以零成本准入机制重构社会参与的平等性。一位来芜湖务工的建筑工人谈道：“在这里看电影

不用花钱呀，我平常不怎么去商场，因为到处都要钱。”（S20-H）在城市公共空间放映的露天电影多由各地政府部门牵头主办，活动向所有人开放，不存在实体、可见的准入或筛选手段，无论城乡、收入、职业、本地/外地、常住/暂住，只要在放映的时间来到放映地点便可参与其中。本次活动的组织者——芜湖市委宣传部公共文化服务项目负责人在接受笔者访谈时，提到露天电影所具有的连接性与可达性特点：“露天电影放映旨在满足群众多元化需求，依托公共文化场所，搭建百姓交流平台，丰盈城市文化记忆，让更多群众享受文化惠民的丰硕成果。”当放映幕布在开阔区域徐徐展开时，一种不同于传统拘谨环境的全新观影场景呼之欲出，在这里无须正襟危坐，更不必遵循严苛的礼仪，人们拥有着更为自由的姿态。“当微风吹过，隐约能闻到一丝江水特有的味道，幕布则泛起微波波浪，有观众禁不住感慨：‘风吹银幕太松弛’。”<sup>[18]</sup>露天电影与生俱来的与自然紧密相连的特性，以天幕为被、以地为席，人们在与天地星月共处中，获得一种最原始的宁静。

公共空间的可达性除了物质层面的意涵，更体现为在其间展开的活动和文化元素的开放性，以及对人们作为公众成员所述说的话语、发生的关联的容纳<sup>[19]</sup>。奥登伯格（Oldenburg R.）提出“第三场所”<sup>[20]</sup>这一概念，认为在家庭和工作地这两点之间，人们对开放空间的需求同样存在，人们在此交流互动，进而收获一种如同“在家”（at homeness）般的自在体验。例如，当《流浪地球2》在公园的夜空下放映时，影片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探讨，将公园绿地重构为关乎家园存续与未来的沉思空间。在此，



影片内容为空间赋予意义，电影中的“家园”意象与脚下的城市土地产生互文，促使观众将影片探讨的宏大归属感内化为对城市这一“小家”的珍惜与认同，从而深刻体验露天放映场作为第三场所的精神包容性。

## （二）嵌入与连通：重识作为缓冲区的“附近”

“附近”可被视为极近与极远两端之间渐变的层次区间，也是人们日常活动的区域，本质上是人与陌生之间的缓冲地带<sup>[21]</sup>，它既代表着地理意义上的空间，同时又意味着人与地方的连通性和内渗性。项飙认为“附近”是人们摆脱对生活失控感的抓手，是重新建立对生活的可控感、可知感的基础，其价值在于有个空间能让人稍作喘息<sup>[22]</sup>。这种理论洞见为我们理解城市公共空间露天电影的空间价值提供了重要启示。

城市公共空间的露天电影放映场俨然是处于极近的家庭与极远的社会中间的地带，其与观影者的日常活动空间是高度交融的<sup>[23]</sup>，使得观影者与“附近”的人、事、物编织出动态的意义联结，这种便利性与即时性的文化体验，正是“附近”价值的生动体现。从这个角度上讲，城市公共空间露天电影再放映的价值，即在于日常生活中可能因琐务缠身而显得“遥远”或未能充分照面的天地星月之壮美、集体情感之共鸣、影片精神之启迪得以生动地近前来，进入观众的感知与意识视域，如其所是地展现其意义。与之相反，在影院等封闭空间环境内，观众的感知维度呈现显著的收缩状态——其注意力主要聚焦于电影文本的显性信息，对所处空间的物质性存在与隐性意义网络则缺乏感知，难以激发超越影像内容的情感互动与意义再生产，这与露天电影的开放性体验形成本质差异。

恰如段义孚所说，“作为一种心灵的状态，真正的荒野只存在于不断蔓延的大城市中”<sup>[24]</sup>，露天电影放映场所通常选址公园、海滨、城市绿地等自然环境优美且富含生态美学价值的区域，使得观众无须进行大规模的行程规划或长途跋涉，只需在日常空间内进行短距离位移，即可实现精神的短暂休憩与超脱。“去看（露天）电影，关键在于‘去’。这意味着让更多人走出家门，

走到城市的各个空间。”<sup>[25]</sup>露天电影带来的联结不仅重构了人们被现代性割裂的空间感知，更使个体得以在具身化的观影体验中重新发现“熟悉的附近”所蕴含的文化记忆与情感能量。如果说“附近”的建立意味着家与社会之间“最后一公里”的打通，那么这一沉浸感与归属感将会进一步扩展至人们与城市的链接。

## （三）地方感的回归：具身体验下的城市情感脉络铸造

爱德华·苏贾（Edward W. Soja）认为，“物性的物质空间与人性的意念空间这两者均必须被视为是由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sup>[26]</sup>。质言之，由于空间并非仅仅是个体活动的静态背景板，个体在空间中的实践行为亦塑造着个体的意义与特质，所以只有当个体在城市空间中展开具身实践时，城市方能超越其物理实体，创造此地和彼地的区别，完成向家园意象的转化与升华，也即地方感的塑造。“在这看电影让我感觉很真实，不仅仅只关注到电影，而是也能注意到周围的环境。”（S21-W）露天电影放映恰恰为地方感的培育提供了理想的实践场域，事实上，正是露天电影恰如其分地嵌入“附近”所构建的场景，为意义的生成提供了土壤，它使得原本空旷的场地被赋予故事性、社交性及情感共鸣性。“我是第一次到外地上学，来学校旁边看露天电影感觉跟这个城市的距离拉近了，让我感觉不那么孤独了。”（S15-G）在孙玮看来，城市的特定实体空间不仅是人们互动的平台，还催生了城市居民的集体记忆和地方感，这种蕴含在日常场景中的实体环境对城市生活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sup>[27]</sup>。观众沉浸于城市的一隅细细品味其中氛围，进而对所在之地有了更为具象的感知，这一过程不仅是美学体验的深化，更是在电影情节所唤起的情感基调中，通过身体的在场与实践，完成地方感与文化记忆的协同塑造。

基于主体的身体操演以及带有能动意识的实践行为，露天观影所衍生的个人记忆、情感触动等，构成了观众独特的个人体验与经历，这些元素汇聚为一种坚实的地方认知，能够增强观众对城市文化品格的认同感。与此同时，在个体借



由露天电影与城市空间互动联结的进程中，自我在地化意识悄然萌生。“（露天电影放映）这是给我们的福利呀，芜湖在人文关怀上做得还是蛮好的，我发了朋友圈，还挺自豪的，其他人都说他们附近没有。”（S8-L）当个人的身体实践与城市空间紧密衔接时，个体不再是城市的匆匆过客，而是主动转变为城市故事的书写者、城市记忆的守护者，自发且热忱地去捕捉、记录个人与地方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结瞬间。彼时，城市也不再只是钢筋水泥的简单堆砌，而化作人们安居乐业的温馨巢穴，更成为镌刻个人记忆、延续情感脉络的媒介。在此过程中，民众方能跨越疏离，与城市构建起深度且密切的情感纽带，城市也由此真正成为个体心灵深处的归属之地。

#### 四、连接时间：三维向度下的情感与记忆纽带

城市公共空间露天电影放映既与公共空间等现代生活场景相连，同时，影片本身即为穿越时间的文化记忆载体。无论是经典影片重映所凝固的怀旧记忆，还是主旋律爱国电影所书写的集体奋斗历程，每一次放映都是一次对集体记忆的调用、对历史情感的激活，并在当下的具身实践中面向未来进行传承。

（一）怀旧溯源：露天电影承载的记忆回溯与乌托邦想象

正如弗雷德·戴维斯（Fred Davis）所揭示的，怀旧多与过去温暖的时光、快乐的童年等相关联<sup>[28]</sup>，即怀旧不仅是对特定时空的追忆，更是萦绕其间的一种自我意识的情绪状态。循此路径，露天电影的怀旧经验则呈现出双重内涵：既包含对具体经验的复现，也涉及对记忆图景的理想化生产。

一是有关过往岁月的狂欢记忆。在巴赫金笔下，狂欢节通过暂时悬置日常秩序，建构出理想与现实交融的阈限空间<sup>[29]</sup>，人们平等而亲昵地交往、对话与游戏，尽情狂欢<sup>[30]</sup>，在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的岁月，露天电影放映的日子便恰如其分地承担了类似狂欢节的功能。“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村里只要一来放电影的，小孩们高兴的呀，飞一般就跑出去，占座的占座、吆喝的

吆喝。开场前人们都说说笑笑的，但只要电影一开始，大家就都全神贯注看电影了。那些没占上好座位的，有的到幕布后头看，有的站在长凳上面看。看场电影和过年似的！”（S32-L）如今，人们既在回忆观看露天电影的过往时光，也在回味当时苦中作乐、真实确切的满足感和幸福感。那些经由岁月沉淀的观影记忆，已然成为人们回首往日时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代人永恒的文化印记，见证了他们从青涩走向成熟的成长历程。

二是怀旧本身带来的乌托邦想象。回忆并非绝对意义上的现实再现，而是一种经过理想化改造后所构建的桃花源式的、充满特殊意义的记忆<sup>[31]</sup>，这种不可直观的时空重构往往才符合怀旧主体的审美期待。“当时能看场露天电影是非常奢侈的事情了，虽然条件赶不上现在，但看电影那种简单真实的快乐，还有它给人的盼头，太珍贵了。”（S7-W）因此每当人们提起露天电影，心中所想并非物资匮乏年代的艰苦日子，而是难以言表的温暖与感动，它“充满了对过去的美、快乐、喜悦、满足、善良、幸福、爱等主题情感的假设和积极影响”<sup>[32]</sup>。过去已经历，而未来尚未到来，怀旧本质上是一种时空错位的记忆，给人们带来的恰恰是确知的安全感与舒适感，是在变化中求不变，在发展中求稳定，在须臾间求永恒的社会心理冲动<sup>[33]</sup>。露天电影带来的欢乐和集体记忆深植于社会情感之中，即便岁月流转，依然能在人们心中唤起强烈的怀旧之情，承载着人们对简单而纯粹生活的怀念，成为人们追溯往昔、找寻情感根源的重要载体。

（二）当下语境：具身参与下的集体欢腾

无论是农耕时期的集体劳作，还是自18世纪始由于劳动分工而形成的彼此依赖，都在强调人与人、人与公共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结。然而随城市化而来的，是人口的高速流动弱化了人际连接，是现代社区结构强调个体独立性和隐私性，进而出现了社会原子化现象。以往熟人社会的联结机制的解体或缺失，前所未有地限制了个体融入社会公共空间的渠道，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当下集体生活散佚的忧悵。

社会成员文化身份的构建有赖于特定的文



化活动与文化记忆，从这个角度出发，露天观影带来的一重价值即在于使个体摆脱孤立状态，融入充满共鸣的集体环境，在具身感知下塑造集体意识与认同感，这无疑可被视为某种形式的“集体欢腾”。譬如在观看《长津湖》中艰苦卓绝的战役时，观众同步产生紧张、感动等情感反应，并一齐伴随情绪流露与肢体语言变化，其情感内核源于影片所传递的英勇、智慧与集体主义价值观，正是电影文本的爱国叙事、公共空间的聚集特性与观众身体的情绪共鸣三者叠加所产生的效应，让文化记忆在瞬间被激活。“这么多人一起看非常热闹，也能让大家有集体的感觉，特别是放爱国电影的时候，在现场的共鸣感很强！”（S24-L）身体实践的操演性、纪念性，确保了记忆体系的效用及连续性<sup>[34]</sup>。一名 8 岁的小朋友说：“露天电影的屏幕很大、人也很多，还能和很多小朋友一起玩，比自己在家看电视和玩手机有趣多了。”<sup>[35]</sup>年轻一代被带入充满生活气息的集体环境，打破了他们日常所处的相对封闭、个体化的生活空间，在这个露天的公共空间里，电影放映中蕴含的时空秩序、集体观影仪式等非文本要素，实质上构成了濡化年轻世代的文化语法，这让社会情感并不局限于观影的短暂时刻，而是在长期的文化遗产和记忆中得以稳定存在。

沿着这一路径，露天电影放映作为一种“仪式”，通过突破个体属性的社会性身体实践，有力地唤醒了群体性的情感，强化了群体成员间的内在联系与共同体的自我想象，进而催生了一种基于共同观影体验的集体意识。正是借助集体生活，社会这一抽象概念才在个体认知中落地，也为个体提供支持与力量，实现从“我”到“我们”的身份转译。

### （三）未来展望：精神滋养与文化延续

时间的连接不应只是回顾性的，而更应是前瞻性的，通过“未来将来”的想象性整合再造对世界的感觉，找到行动的动力和希望。具体而言，对于年轻一代，尤其是未曾经历过 20 世纪露天电影放映盛况的孩子们来说，露天电影所蕴含的精神慰藉以及集体感回归的力量，

将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并在未来得以延续，“去年我和爸爸、妈妈就常来古城看露天电影，和在家看感觉完全不同，大家一起欢笑、鼓掌，特别有趣。爸爸、妈妈还会跟我讲他们小时候看露天电影的故事，真让我觉得新奇”<sup>[36]</sup>。多年之后，当这些孩子长大成人，回忆起曾经的露天观影时光，或许能从中汲取勇气、温暖与团结的力量，这种基于共同记忆和体验的社交互动，在现代快节奏、数字化的生活中显得尤为珍贵，此种力量将伴随他们今后的人生旅程。单个人的记忆存储空间毕竟有限，不少观影者在社交媒体上传了自己的露天观影经历，借助这些保存下来的数字记忆，人们能迅速勾连到过往露天观影时的惬意时光，将记忆与城市的某个位置、身边的某个人或某段时光通连在一起。

当下与过去因露天电影放映彼此连接并构成了一个连续统，过去始终会在当下被不断唤起、呈现与更新，借由持续的连接和互动得以扩展，延续至未来。在纵向上，无数的人都向前翘首或向后追忆，那么，有关我们民族特定时期的记忆、事件则在一代代人之间传承，绵延不断；对所处同一文化时空中的人来说，成员置身于饱含同一情感的集体场域中，当下的观影经验会融入个体的意义世界。如此一来，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时间线相互交织，使得人们在共享的文化体验中找到相同的情感基础和价值认同，如同一根根经纬线编织成一张致密的网，而露天电影则是这张网上承载精神力量与延续集体感的重要节点。

## 五、代际互通：文化记忆跨代传递与民族共同体形塑

露天电影的再放映不单纯是一次文化展演活动，更是一次记忆的代际传承。年轻一代或许不难获得有关露天电影放映盛况的二手记忆，却很难共享在物质条件匮乏的年代，电影放映所带来的期盼、狂欢感的记忆，倘若没有亲身经历便很难体会个中滋味，而露天电影当下的再放映使得情感经验在代际对话中完成了记忆转译。“现在生活好了，每家每户都有电视电脑，

肯定是比我们小时候选择多。但坐在公园看露天电影，让我回忆起了小时候跟小伙伴围坐在一起的时光。这次之所以带着我家小孩来，也是想让他了解下他老爸的童年。”<sup>[37]</sup>当长辈以口述史方式向晚辈讲述观影记忆时，电影内容与生活细节的交织叙述构建出立体化的记忆之场，这些故事让孩子们借此理解父辈对露天电影的情感及那个年代的风貌。父辈祖辈对后辈的每一次讲述，都是对历史的一次回溯与重述，使得民族文化记忆在代际之间得以传承和发扬，家族和民族的文化基因得以延续。“以前光听爸爸妈妈说（露天电影），现在终于也有机会体验他们那个年代的快乐了。”（S14-P）这种跨越时空的情感传递，使得那些本不可能被后代亲身经历的文化事件、文化记忆得以重新彰显，来自身边人的故事塑造着更加立体、温暖的记忆之场，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个体记忆在观影过程中融入集体记忆，同时集体记忆也在个体的体验中得到丰富和传承。

相较于其他环境，家庭作为以血缘为纽带的生活空间，年轻一代在其中接受的思想品德与一举一动的教育往往会引发更深刻的认知，最终养成的行为习惯也更稳固<sup>[38]</sup>。那么，当露天电影介入家庭观影实践时，长辈们不仅讲述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图景，更将潜藏于影像文本中的价值判断传递给子辈：“我将儿子班上的十几个小朋友都邀请来观看红色电影，孩子们通过观看这部电影，学习和感受老一辈的奋斗精神，也会更加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勤奋学习。”<sup>[39]</sup>电影的题材与内容通常具有鲜明的历史性与公共性，如《地道战》《我和我的祖国》等影片，通过露天放映将民族奋斗历程、历史记忆嵌入当代城市空间，直接唤醒了观众对抗战、新中国建设等重大历史事件、历史时期的集体记忆，使得再放映的时空连接不再是空洞的行为，而是有内容、有情感的记忆过程。露天电影搭建起一座沟通几代人记忆与认同的桥梁，将浸润其中、虽不易体察却客观存在的族群共同价值观，稳稳地传递至子辈孙辈。对年轻人来说，这也是他们习得行为规范、价值

伦理，进而融入社会的基石。长辈引领子辈参与露天观影活动，使得这种记忆跨越代际传递，不再仅仅依靠家庭内部的讲述，而是在集体互动中强化对民族记忆的感知与理解，进而实现民族文化记忆的有效传承，让子辈在集体体验中对国家和民族产生更为强烈的归属感。

如此一来，无论是对露天观影经历的回溯还是价值观与集体感的承袭，家庭都作为记忆的核心锚点承载着情感体验。一代又一代的家庭成员在后续的生活轨迹中，持续对这些符号进行传承与再演绎。借助露天电影这一媒介，每一参与个体都成为记忆链条中的活性节点，在个人经验与集体记忆的交互中，完成民族文化基因的转录与表达。值得强调的是，这种传承机制的有效性，源于其将抽象的文化记忆转化为可体验、可参与的具身实践，不仅为个体记忆提供了归属与定位，更为从家庭到国族的文化认同提供了坚实的情感与价值基础，从而确保文化共同体的代际延续。

## 六、结语：文化记忆依凭的媒介物质性与具身性

在研究者的观察与访谈中，几乎每个受访者在谈到几十年前的露天观影经历时，眼神中都闪烁起光芒，那么，当人们谈论露天电影时究竟在回忆什么？有人提起了童年与父母共度的美好时光、观影时发生的趣事，有人提起了逝去多年的亲人、好友，还有人提起“那个年代”人与人相处的纯真……

本文从文化记忆的视角切入，考察城市公共空间中露天电影再放映现象，认为露天电影所建构的文化记忆是一种依赖于文本载体、空间场域与身体实践三方互构的复合形态，并尝试在物质性和具身性两个维度上拓展文化记忆理论。在物质性层面，本文将露天电影放映活动视为一种记忆实践，突出其空间性和场域性。周围的自然环境、公共空间、观影人群及其所承载的情感氛围，共同整合为一个复合的“场媒介”。这一场域参与着文化记忆的生成，而既有研究大多聚焦于传播媒介和内容作品，如大众媒介、数智技术或特定文本等狭义媒介形式。





本文拓展了文化记忆所依凭的媒介物质性内涵,使其从“物”的载体转向“场”的生成与再生产。

在具身性层面,比起个体于室内默观下的符号与文本的传递,观看露天电影这一动作天然地要求身体的参与,体现为“主体-客体-场域”三维互动的“记忆实践”:主体通过集体性、情感性的具身参与,与作为客体的电影内容发生互动,在露天放映空间中完成记忆的激活与传递。观众置身于放映现场才能体会到的情感氛围、集体观影引发的情绪感染,一同塑造了全感官投入的身心体验,使个体通过身体栖居于记忆之场,让文化记忆对人的影响程度更深。由此,文化记忆不再仅仅是被回忆的“内容”,而是转化为可被身体感知乃至习得的状态,通过集体的体化实践写入个体的感知与情感。这不仅回应了记忆如何通过身体实践得以“活化”与“固化”,也突破了将记忆视为精神范畴的表征,从而在具身性层面推进了文化记忆理论。当前,不少学者关注到了主体在特定场域中的记忆实践,但有关研究仍稍显匮乏,这需要将身体观念、场景传播与文化记忆的理论结合起来,这也是后续研究可以着力的议题。

(责任编辑:孙尚如)

## 参考文献

- [1] 邵培仁,杨丽萍.电影地理论:电影作为影像空间与景观的研究[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0(5):111-118.
- [2] 马石骏.我国电影发行放映工作的回顾与展望[M]//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事业三十五年(1949-1984).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5:336.
- [3] 刘君.谁的话语空间?中国电影与公共领域的建构[D].福建师范大学,2011.
- [4] 朱戈.电影下乡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社会政治化[J].文艺研究,2017(12):94-102.
- [5] 刘润坤.互动仪式链:“十七年”时期农村电影放映的社会传播学机制——以延边州和龙县第一放映队为例[J].当代电影,2023(1):116-123.
- [6] 李道新.露天电影的政治经济学[J].当代电影,2006(3):97-101.
- [7] 2023 中国电影院线影院发展备忘[EB/OL].中国电影报,(2024-1-17)[2025-12-20].<http://chinafilmnews.cn/Html/2024-01-17/13764.html>.
- [8] 王霄冰.文化记忆、传统创新与节日遗产保护[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1):41-48.
- [9] 赵静蓉.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M].北京: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2015:5.

- [10] 冷淞,刘旭.“新国风”综艺节目的叙事路径与美学特质[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2,44(12):89-96+113.
- [11] 晏青,沈成菊.从空间赋值到关系嵌入: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播转向[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0,41(1):153-158.
- [12] 王若衡,郭海莉.融合·传承·建构:《国家宝藏》的传播策略探析[J].传媒观察,2021(6):57-62.
- [13] 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M].黄艳红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60.
- [14] 周海燕,吴晓宁.作为媒介的时光博物馆:“连接性转向”中的记忆代际传承[J].新闻界,2019(8):15-20.
- [15] 谢卓潇.春晚作为记忆实践——媒介记忆的书写、承袭和消费[J].国际新闻界,2020,42(1):154-176.
- [16] 芜湖神山公园,又爆了![EB/OL].芜湖传媒中心,(2024-9-8)[2025-12-20].<https://mp.weixin.qq.com/s/IQvMhFvqdpqKS5GrdG3qLg>.
- [17] 陈竹,叶珉.什么是真正的公共空间?——西方城市公共空间理论与空间公共性的判定[J].国际城市规划,2009,24(3):44-49+53.
- [18][25] 钟菡,施晨露.文化艺术“加持”,实体商业的流量新密码[N].解放日报,2024-09-13(005).
- [19] 於红梅.数字媒体时代城市文化消费空间及其公共性——以苏州平江路为例[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23(8):30-48+126-127.
- [20] Oldenburg R, Brissett D. The Third Place.[J] *Qualitative Sociology*, 1982, 5(4): 265-284.
- [21] 董山民,赵英.“附近”的消失与再造——反思技术扩张时代的社会团结[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3):33-43.
- [22] 项飙,康岚.“重建附近”:年轻人如何从现实中获得力量?——人类学家项飙访谈(上)[J].当代青年研究,2023(5):1-9+21.
- [23] 黄典林.从流动放映到都市影城:当代中国电影展演的场景流变与空间配置[J].当代电影,2021,(2):139-144.
- [24] TUAN Yi-fu.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102, 112.
- [26] 爱德华·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M].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83.
- [27] 孙玮.作为媒介的城市:传播意义再阐释[J].新闻大学,2012,(2):41-47.
- [28] Davis F. *Yearning for yesterday: A sociology of nostalgia*[M]. New York: Free Press, 1979: 4.
- [29]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六卷[M].李兆林,夏忠宪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12.
- [30] 胡春阳.网络:自由及其想象——以巴赫金狂欢理论为视角[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115-121.
- [31][33] 胡智锋,祝明.加速社会中的减速地带:综艺怀旧的记忆生产与文化景观[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4,46(10):97-106.
- [32] Davis F. *Yearning for yesterday: A sociology of nostalgia*[M]. New York: Free Press, 1979: 14.
- [34] 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25.

[35] 赵黎浩,徐静.老电影放出新花样“小银幕”打造“大影院”[N].工人日报,2024-12-01(004).

[36] 新春走基层 | 春节假期 露天电影添彩文化生活 [EB/OL].安顺日报融媒体中心.(2025-2-7)[2025-12-20]  
<http://asxw.net/c/2025-02-07/718622.shtml>.

[37] 烟火通辽 | 在通辽看一场露天电影,是怎样的体验? [EB/OL].通辽市融媒体中心.(2025-2-7)[2025-12-20].

[https://mp.weixin.qq.com/s/hL-5x\\_ANCWLkk4IwcOnZVA](https://mp.weixin.qq.com/s/hL-5x_ANCWLkk4IwcOnZVA).

[38] 赵露,王阿舒,徐强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家庭教育的实践逻辑与进路——基于助推理论的视角[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50-58.

[39] 红色电影走进幸福小区,长春市自由大路社区露天电影放映人气旺! [EB/OL].吉林日报,(2023-6-16)[2025-12-20].<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68788260895773328&wfr=spider&for=pc>.

## Spatiotemporal Connect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Values and Cultural Memory Connection Mechanism of Open-air cinema "Re-screening" in Urban Public Space

Ma Mei, Li Ya

**Abstract:** Against the deep transformations of media ecology, open-air cinema should have gradually faded from cultural evolution, yet reality reveals an intriguing contradiction. The contemporary "re-screening" of open-air cinema in urban public space fosters cross-spatiotemporal reunions between the residents and their long-forgotten viewing experiences. Through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interviews, and textual analysis, the study views open-air cinema screening and viewing as a medium and mnemonic practice, prompting us to reflect on the media materiality on which cultural memory relies, and the embodiment of cultural memory. Such practice enables residents to rediscover "nearby" and construct a sense of place through embodied engagement. The "re-screening" process bridge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nurturing the future through nostalgic recollection and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The intergenerational viewing practice integrates individual experiences into collective memory, achieving cros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cultural memory and shaping national community formation.

**Keywords:** open-air cinema; urban public space; cultural memory; intergenerational communication

**Authors:** Ma Mei,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Li Ya,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 战斗性实践与党报理论的地方生成： 对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报刊的考察<sup>1)</sup>

曹培鑫 宋启明

**摘要** 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报刊《满洲通讯》与《满洲红旗》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近代东北地区复杂形势下的革命斗争。借由向党内动员宣传的《满洲通讯》与向外联系人民群众的《满洲红旗》，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报刊立足“近代东北”这一历史情境，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党报地方实践，丰富了中共党报理论的“战斗性”内涵：一方面，多重势力的压迫使其不得不隐秘地开展办报工作，复杂斗争环境中的秘密出版发行本身具有了鲜明的“战斗性”特征；另一方面，与中央的持续互动更将其深度嵌入中国共产党的广泛斗争过程，以对内和对外相结合的战斗方式为中共党报理论与实践贡献了独特的“满洲经验”。

**关键词** 《满洲通讯》；《满洲红旗》；东北新闻史；党报理论；战斗性

**中图分类号** G215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曹培鑫，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北京 100024；宋启明，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24

20 世纪 20 至 30 年代的中国东北地区处于极为复杂的社会历史情境之中，民众深受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国民政府与军阀的剥削与压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也面临着严峻的舆论宣传形势。1927 年“八七会议”之后，为加强东北地区的党组织工作，领导东北人民进行反日反封建反军阀斗争，中共中央决定派陈为人到东北筹建中共满洲省委。从 1927 年 10 月 14 日中共地下党组织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成立到 1935 年前后撤销，中共满洲省委历经陈为人、刘少奇、陈潭秋等 14 位书记，克服重重困难，始终是带领东北人民群众反抗奉系军阀统治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主导力量。在此期间，作为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报刊的《满洲通讯》与《满洲红旗》先后创刊，通过办报活动动员人民群众参与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当中，深刻反映了早期中共党报的地方实践，锤炼了党报工作的战斗属性，并为延安时期党报理论的体系化贡献了独特的“满洲经验”。

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新中国本土传播学的在地实践与思想生成研究”（24YJA860001）；中国传媒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博士科研托举项目“国际传播视野下近代中外新闻界交往研究”（CUC230D032）；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资助。



## 一、补正中共东北新闻史与机关报刊研究

在近代东北地区的革命背景之下,面向党内的《满洲通讯》与面向党外群众的《满洲红旗》在宣传党的政治主张、揭露帝国主义,以及国民政府与军阀的罪行、动员群众参与革命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成为传播革命斗争文化的重要媒介。然而,学界对于这段地区报刊史至今并未厘清,近代东北新闻史尤其是近代中共东北新闻史研究中仍存在一些历史模糊与视野遮蔽的问题。

东北地区新闻史研究近年成果渐丰,如有学者基于《泰东日报》《盛京时报》等报刊个案与相关报人展开探讨,或针对重点城市如哈尔滨、沈阳的新闻业进行宏观考察<sup>①</sup>,也有黑龙江日报社所编《东北新闻史(1899-1949)》一书问世。然而以中共党报理论范式进行观照,东北地区新闻史研究仍存在两方面的缺失。

其一,缺少以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的革命新闻传播活动为主体的历史考察。清末民初的革命派与保皇派、割据军阀、日俄帝国主义等<sup>②</sup>众多势力在近代东北地区的新闻传播活动形成了丰富的“主流”研究空间,但研究者对处于地下活动的中共党组织新闻传播活动着墨不多。事实上,《满洲通讯》《满洲红旗》等中共党报党刊始终在隐秘中蓬勃发展,并领导各类红色刊物如《南满抗日联合报》等抗联报刊、《关外》等文艺刊物及陆续出现的23家群团报刊<sup>③</sup>繁荣生长。以上述内容为主体展开研究,将揭集中共党报实践更广阔的面向。

其二,缺少基于东北地区的新闻传播实践与中央及其他地区新闻活动关联的探讨。中国

各地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决定了各地新闻事业发展的差异与独特之处,由此,诸如《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等著作应运而生。但该书主要侧重各地区内的分省比较<sup>④</sup>,少有对地区与地区间新闻业沟通与交流的论述。然而近代中国尽管地方割据混战频仍,统一政权在名义上始终存在,中共地下党组织也曾建立秘密交通网,并持续向各地派出中央干部。因此,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新闻工作本应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结。满洲省委就曾如此指示其与中央的互动关系:“须将中央通告指示,须随时使各个同志得到深刻的了解。须将当地群众斗争状况,随时照实报告中央。”<sup>⑤</sup>

中共东北新闻史的缺位,使得两大机关报刊在学术研究中有问津,相关讨论甚至出现史实错误:有关《满洲通讯》和《满洲红旗》的史实阐述极为罕见,《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只用“辽宁曾出版《满洲红旗》”<sup>⑥</sup>九个字记载,《民国新闻史研究(2014)》中也仅有不到100字的叙述<sup>⑦</sup>。此外,田雷对二者各有一篇梳理相关史实的文章,其余论文无论属于党史研究领域,还是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提到二者时均一笔带过,甚至连《满洲通讯》与《满洲红旗》的发行日期、停刊日期、发行期数,以及二者在发行过程中的更名历程等史实如今均存在多种说法<sup>⑧</sup>。

研究的缺失与史实的模糊很大程度上在于现存的原始资料非常稀少。在长期秘密发行和敌人的围剿之下,这些报刊往往无法按时出版发行,刊物本身也难以留存。以《满洲红旗》为例,目前可查阅的原件仅存三期,更名为《东

① 上述代表成果可参见梁德学. 灰暗处的“寄居者”:“关东州”日人报纸中的中国报人群体——以大连《泰东日报》为中心(1908-1947)[J]. 新闻记者, 2019(8):82-96; 焦润明. 《盛京时报》广告所见日本对东北的奴化与掠夺[J]. 社会科学战线, 2007(1):180-183; 梁德学. 近代日本人在华中文报纸的殖民话语与“他者”叙事——以《盛京时报》《泰东日报》的伪满洲国“建国”报道为例[J]. 新闻大学, 2017(3):46-55+149; 王翠荣. 伪满洲国成立前日本对东北的新闻侵略及东北新闻界的抵制[J]. 民国档案, 2010(3):107-113; 赵建明. 近代辽宁报业研究(1899-1949)[D]. 吉林大学, 2010; 等等。  
② 如《满洲通讯》发行期数,有13期、15期、16期之说。分别可参见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中国共产党辽宁历史简明读本[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2020:42; 田雷. 中共满洲省委机关刊《满洲通讯》研究[J]. 新闻爱好者, 2021(9):72-74; 刘秀华, 张旭东, 主编. 中共满洲省委史话[M]. 沈阳:沈阳出版社, 2013:148。又如《满洲红旗》(后为《东北红旗》)1933年的更名情况,史料普遍记载其更名为《东北民众报》,但也有史料认为其更名为《东北人民革命报》。见赵冬晖, 孙玉玲, 主编. 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上[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5:531。



北民众报》之后更是难觅其踪。然而，一方面，《满洲通讯》与《满洲红旗》作为机关报刊，在满洲的党建活动中无疑发挥着核心作用——在中共作为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并与多重压迫展开抗争时期，党委机关报刊必然成为宣传战斗思想、开展斗争实践的前沿阵地；另一方面，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权建立之前的办报实践和早期党报理论的重要一环，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报刊创办于“东北”这一独特的地理范畴内，拥有着独特的政治与历史身份，成为参与中共革命的独特战斗主体。以此而论，蕴含丰富意涵的《满洲通讯》与《满洲红旗》不应被已有研究如此草率而简单地呈现。那么，在党报理论的视野下，我们应如何检视与重新评估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报刊《满洲通讯》与《满洲红旗》的历史地位？在近代东北地区高度复杂的政治格局中，《满洲通讯》与《满洲红旗》坚持创办与发行，形成了怎样独特的党报“战斗”实践，并贡献于中共党报理论体系化的进程？本文将通过对《满洲通讯》与《满洲红旗》仅存的原始档案进行细致的情境化考察，重新评估在逆境中坚持斗争的两份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报刊的办报实践和经验。

## 二、《满洲通讯》与《满洲红旗》史实再考察

（一）《满洲通讯》：在报告、信函与决议案之外

1927年“八七会议”后，中央向各地派出干部加强地方组织建设。为加强党的政治宣传和鼓动工作，中央宣传部要求各级支部创办对内对、外刊物<sup>[7]</sup>。10月24日，陈为人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前往哈尔滨主持召开东北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大会决定成立以陈为人任临委书记兼宣传部长的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办事机关设在沈阳。12月1日，中共满洲省临委机关刊《满洲通讯》在沈阳创刊，陈为人任主编。1928年，省临委改设省委，《满洲通讯》随即成为省委机关刊，暂定以油印方式每月发行一期，并计划根据形势改用铅印每月出两期<sup>[8]</sup>。12月23日，满洲省委遭敌人破坏，陈为人及其

他主要负责人几乎全部被捕，《满洲通讯》被迫停刊。

《满洲通讯》以东北地区的广大党员为宣传对象，发行期间曾作为在党内开展革命舆论工作的有力抓手。作为一份党内刊物，《满洲通讯》在满洲省（临）委创立初期的党建工作与东北革命斗争工作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显示出鲜明的“以自己国家的事为中心”<sup>[9]</sup>的党性特征。在发刊词中，省临委表明了对《满洲通讯》主要内容的明确要求，即“在中央新政策指导之下（一）公布临委的政策，重要决议及一些政治上、工作上的指示；（二）转载中央或北〔方〕局的重要通告；（三）登载各级党部重要的报告，各级同志对党的各种意见”<sup>[10]</sup>。《满洲通讯》的刊载内容基本执行这一要求，具体包括满洲省临委给中央的政治报告、党务报告；省临委政治任务决议案与通告；各地、市、县党组织工作报告、调查报告、决议案及省临委复信；中共东北党代会文件等。《满洲通讯》所传达的党内文件秉持“肯定成绩，指示缺失”的原则，对于宣传革命思想、揭露敌人罪行有较强的针对性。然而在众多“上传下达”之外，我们发现《满洲通讯》中仍在当时某些重要的原则、议题与体裁上存在一些看似超越其应刊载范畴的内容，并与相关文件相互配合，以更为丰富的内容样貌进行革命战斗思想的宣传。

第一，在报道原则上，《满洲通讯》在其办刊活动中强调党内民主，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开展党内斗争工作。例如，1928年2月发行的第四期刊登了《某同志对省委负责人批评的信》，指出省委负责人即陈为人在工作中“对一般同志接触时，似乎是特‘排大架子’……或者你以前是一位惯于统治黎民的老官，旧日镇压下民的威风，一时难于忘却吧”<sup>[11]</sup>。尽管陈为人当时是因为以英国烟草公司高级职员身份在沈阳作掩护，在白色恐怖下无法经常接触群众<sup>[12]</sup>，但《满洲通讯》还是正式地刊发了回复这位“某同志”的信，并表明“省常委很热烈的欢迎接受，并希望今后你与其他的同志有更多和更深的对省委的批评……不但是他个人

的错误，同时也是团体的，我们惟有努力的去改正之”<sup>[13]</sup>。这一方式不仅表明了《满洲通讯》对党内民主的拥护，也在党内树立了更强的影响力与可信力。此外，《满洲通讯》曾数次展开党内交流。如该期《冻同志给中共满洲省临委的信》《中共满洲省临委复冻同志的函》，以及1928年3月的第五期同时刊载的《之同志对中共满洲省临委决议案的质疑》《中共满洲省临委复之同志的信》，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满洲通讯》能够提供党内沟通交流的渠道，也与满洲省临委提出的“避免在支部讨论中妨碍‘讨论的自由活泼’”<sup>[14]</sup>这一要求相符合。

第二，在重点议题上，《满洲通讯》重点关注东北地区的民族问题。1928年4月15日发行的第七期，在传达《中共满洲省临委告满洲朝鲜农民书》的基础上，刊登了题为《满洲的朝鲜农民问题》的评论文章。这是现存《满洲通讯》中可查的唯一一篇评论文章。满洲省临委曾指出，“整个满洲的革命工作，必定领导中国农民联络朝鲜农民”<sup>[15]</sup>“亲爱的满洲朝鲜农友们：我们早已看见你们先后的由朝鲜境内失耕或被逐出逃……遭日本资本帝国主义政府的打击和受中国军阀官厅地主无情的压迫与剥削……我们对于你们实在表示无限的悲痛……表示最大最后的援助”<sup>[16]</sup>。基于中共对朝鲜人民尤其是朝鲜农民在东北处境艰难的认知，满洲省临委始终强调处理中朝人民关系的重要性，认为满洲朝鲜农民是战斗的“主要革命要素”和“土地革命的主要动力”<sup>[17]</sup>，并陆续通过发表《中共关东县委新决议案》《东边道工作决议案》等文件从而有效动员“中、鲜、日工人联合起来”<sup>[18]</sup>。其中，《满洲通讯》所刊《满洲的朝鲜农民问题》的表述最为具体。文章列举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与奉系军阀压迫满洲朝鲜农民的现实问题，包括入籍易服、禁止收容、加重盘剥、没收房屋土地、驱逐出境、任意捕杀等，进而提出“朝鲜农民是我们反日的友军”，需要“与中国农民一律享有土地所有权和居住权，一律享有革命政权，没收一切土地，没收日本资产阶级在满洲所经营的一切产业和附属地……这样，

满洲的朝鲜农民问题才是真正解决”<sup>[19]</sup>。由此，评论文章与“告书”中“中韩俄日工农联合起来！打倒中日军阀资产阶级”的号召相互映衬，突出满洲党组织负有领导东北各族人民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的责任，强化其作为党机关刊物的战斗导向作用。

第三，在文章体裁上，《满洲通讯》尝试通过典型人物报道进行革命动员与宣传。除了陆续刊载的几则开除党员党籍的决定，1928年11月刊发的第十五期还发表了《追悼姜朝风同志》一文，此文亦是现存的《满洲通讯》中唯一一篇乃至东北地区党报党刊第一篇典型人物报道<sup>[20]</sup>。中东铁路工人姜朝风曾先后组织东铁总工会、三十六棚地包青工协进会，领导哈尔滨、满洲里等地工人运动，1928年2月被捕入狱。《满洲通讯》的报道中写道：“北满工人唯一的革命领袖——姜朝风同志于本年十月间在吉林监狱死了！……他的全部精神，完全为谋北满工人阶级的解放而奋斗……以一病体而又受尽冷热饥饿囚笼的痛苦，一伟大北满革命的领导者，便惨死在反动黑暗的狱中，实在令我们悲愤。”<sup>[21]</sup>如毛泽东所说的“无证民不信，不信民不从”<sup>[22]</sup>，《满洲通讯》通过对姜朝风事迹的回述，“给宣传对象提供具体的、典型的形象示范动作、举止言谈、步骤方法”<sup>[23]</sup>。经由对人物证据详尽而感情浓烈的表述，以及对其兼备战斗性、先进性和高尚性的理想人格的褒扬，姜朝风的人物报道体现出这位革命领袖标准的民族—阶级身份，并从实然的个体走向应然的宣传，使报道结尾——“我们的同志死在敌人手中的又何只姜朝风同志一人……我们要领导工农群众起来，替我们的死者复仇……解放全满洲的工农群众！同志们前进！！！”<sup>[24]</sup>——更具号召力。

（二）《满洲红旗》：从党内宣传到面向群众

尽管《满洲通讯》发行时间较短，但客观上也为中共满洲省委积累了办报经验。“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共满洲省委面临着东北地区更为艰巨的抗争与宣传任务，新的机关报《满洲红旗》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1930年8月，中共



中央派陈潭秋化名为“陈杰”前往沈阳担任满洲省委书记。8月6日,满洲省委贯彻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精神,决定撤销满洲省委,成立“满洲总行动委员会”。为加强宣传工作,陈潭秋和时任宣传部长的赵毅敏等人创办了《满洲红旗》,将其作为准备武装暴动的总行动委员会的机关报,于9月15日发行第一期。

然而受时局影响,《满洲红旗》的办报历程十分曲折。发行不久,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即决定停止左倾的“立三路线”,总行动委员会撤销,《满洲红旗》随即停刊,直到1931年2月满洲省委历经数次改组,才作为省委机关报重新出版。“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沈阳沦陷,赵毅敏等办报集体成员先后被捕,《满洲红旗》被迫停止发行。1932年1月,中共满洲省委迁至哈尔滨,《满洲红旗》在时任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的罗登闲与负责宣传工作的何成湘<sup>[25]</sup>、聂树先<sup>[26]</sup>等人促成下再次复刊。9月,在“九·一八”事变一周年之际,为表明坚决反对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政权,《满洲红旗》更名为《东北红旗》,并逐渐形成更为群众化的办报风格,直至1935年前后满洲省委撤销,《满洲红旗》编辑部随之解散。

在复杂而严峻的政治局势下,《满洲红旗》的发行具有突出的时效性与隐秘性。首先,《满洲红旗》及时报道东北地区乃至全国各地发生的重大事件。在1930年10月10日第三期“双十节特号”中,《满洲红旗》不仅刊登了“双十节”与拥护苏维埃政权运动之关联的政治评论,还紧密结合当前时局,号召作为辛亥革命纪念日的“双十节”应成为“使广大劳苦群众为完成辛亥革命还未完成的任务而奋斗的日子”,必须坚决彻底消灭军阀战争,反对国民会议,建立苏维埃政权<sup>[27]</sup>。1932年3月14日,时值中日军事冲突“上海事变”发生不久,《满洲红旗》在头版头条刊载长篇社论《论上海事变》,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与罪行,批判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并对“十九路

军士兵的英勇的抵抗”予以声援<sup>[28]</sup>。此外,《满洲红旗》还及时大量刊登诸如《鄂北红军大获胜利》《纪念“三一八”》《义勇军袭击奉天》《反日便衣队扰乱长春》等短篇通讯,持续发挥机关报推动革命高潮的作用。

其次,《满洲红旗》在白色恐怖之下不得不秘密发行。中共“八七会议”上强调党当前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造成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sup>[29]</sup>。《满洲红旗》不仅有对封面的伪装,如第一期封面为《国民必读》,第三期封面为《工商周刊》等,在稿件的通联方面,第一期发布的征稿启事指出,“来稿请由各赤色工会、互济分会、共产党支部及一切革命团体转本报编辑部”<sup>[30]</sup>,从而保护记者和撰稿人。在《满洲红旗》及后续《东北红旗》中,几乎全部来稿作者都以化名或笔名进行署名。前文提及的“双十节特号”,其中两篇评论文章作者分别署名为“可朋”和“秋”;以“旭”“萍”“进攻”等为化名的几位作者也多次为《东北红旗》供稿。

《满洲红旗》与此前党委机关刊物《满洲通讯》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宣传对象从党内人员扩大到广大人民群众,也因此具有了更坚定的无产阶级战斗属性:“不仅要將全国各地以及国际的革命争斗,介绍给满洲的劳苦群众,它也不仅仅是满洲劳苦群众的喉舌,而且它是满洲劳苦群众的灯塔……它是阶级斗争的武器。”<sup>[31]</sup>在刊载内容上,《满洲红旗》第一期明确指出,本报刊登的稿件主要为:“(一)各处工农兵革命斗争的消息。(二)工农兵劳苦群众生活状况的描写。(三)短小的评论。(四)有趣而富刺激性的诗歌曲词,或短篇小说。(五)政治漫画。”<sup>[32]</sup>在此基础上,《满洲红旗》的写作风格呈现出鲜明的通俗性特征,力图用工农群众的口头语言来阐释深奥的马克思主义<sup>[33]</sup>,强化其对民众的感召力。如1931年3月21日出版的第十五期即对于诸多社会状况进行了浅显易懂的解读:针对国民党奉系军阀的腐败,编者表达为“一套破军装,三餐高粱米,此外什么也没有……甚至长官高兴的时候,无缘无故的就把你送回老家!你看:这比起南方的红军

来，是多么痛苦的一回事啊”<sup>[34]</sup>！对于在龙井村残杀工农的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军警，编者将其比作“吃人”的“野兽”，将国民党军费称作“杀人费”，等等<sup>[35]</sup>。更名为《东北红旗》后，报纸还时常通过车轮诗、小寡妇调等<sup>[36]</sup>人民群众中间广泛流传的通俗文化形式对有关灾民生活状况、日本侵略事实等问题进行描绘。

作为团结工农兵及一切劳苦群众“夺得我们的土地、面包、自由和政权”的“赤光普照的红旗”<sup>[37]</sup>，《满洲红旗》超越了《满洲通讯》的党内宣传范畴，形成了面向广大人民群众发行，有效动员人民群众广泛参与革命斗争活动的办报实践。在满洲省委指示的《满洲红旗》应该“是党的群众工作的有力领导者，是扩大党在群众中影响的有力工具”这一办报宗旨<sup>[38]</sup>下，即使是刊登强政治属性的《拥护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宣言》《满洲红旗》也提出，“这政治宣言的内容非常丰富，非常重要，读者如能细心阅读，最好是采用多数人共同讨论的方式，必能获得很大的利处”<sup>[39]</sup>。

具体到群众参与方面，《满洲红旗》基于革命主要领导者的社会关系，建立起既包含报人，又包含文艺工作者，甚至还包含普通民众的广泛的报人网络。在1933年前后以姜椿芳为中心展开满洲城市地下抗日活动期间，他负责管理作为秘密机关的地下印刷所，刻画报刊蜡版、制作报纸和各种传单、标语，其母则主动请战承担秘密印刷所交通员的任务，以“老太婆探亲做客”的身份经过敌人的岗哨，躲避密探对稿件的搜查<sup>[40]</sup>。姜椿芳还秘密联络文艺家金剑啸负责报纸版面设计和绘画工作，并以《满洲红旗》为阵地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文艺运动的作家群。据不完全统计，在《满洲红旗》发行期间，以金剑啸、舒群、罗烽等人作为中心，至少有包括萧军、萧红、方未艾、白朗、丁宁、刘宾雁等在内的17位文学青年组成左翼作家群体持续为《满洲红旗》供稿<sup>[41]</sup>。同时，金剑啸打入日伪报刊《大北新报画刊》《黑龙江民报》内部，以诗文、漫画的形式在敌报上曲折影射地讽刺日伪统治者的行动<sup>[42]</sup>。1933年之后，报纸编辑部“根据新的

路线，把《东北红旗》改变成更群众化的刊物”<sup>[43]</sup>，其主要内容更为明确地转向以通俗易懂的文字对人民群众“解说革命的策略问题和党目前的中心口号，登载群众革命斗争消息（主要关于满洲的）”，致使人民群众经常自动发行张贴、争相传阅这唯一的宣传材料，甚至“把报纸抢破”<sup>[44]</sup>。

### 三、复杂的局势，持续的斗争：近代东北地区作为党报理论的独特实践情境

借由党内宣传的《满洲通讯》与向外联系人民群众的《满洲红旗》，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报刊以继承发展的关系先后参与革命进程，形成了在近代中国独树一帜的党报实践传统。在“近代东北”这一瞬息万变的独特历史情境与冲突中，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报刊在探索“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基础上坚持斗争，在面临多重斗争对象的过程中，通过与中央的互动、与其他地区的通联及与群众的交流，彰显了独特的战斗性质，也成为中国早期无产阶级党报理论继承布尔什维克党报“五性”并形成自身“战斗性”内涵<sup>[45]</sup>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一）在复杂局势中的“战斗者”

正如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机关报《解放日报》所指认的“帮助各种群众运动和工农大众的斗争”<sup>[46]</sup>这一办报任务，《满洲通讯》与《满洲红旗》作为党的机关报刊同样肩负着重要的战斗使命。然而，《满洲通讯》与《满洲红旗》的发行过程始终面临着复杂的局势。这种复杂性首先体现在众多问题与矛盾交杂的情境上，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二者先后作为机关报刊需要承担的宣传任务。

和关内地区革命根据地类似，中共满洲省委始终面临着尖锐的农民问题与工人问题。一方面，近代东北地区向来是大地主与农民集中之地，是“中国唯一封建军阀兼最大地主与佃农、雇农、失业农民并农村最多最集中的区域”<sup>[47]</sup>：不仅农民身份复杂——除了本地人外，还包括来自关内和朝鲜的难民，大地主阶级也在张作霖等人的领导之下发展成一股强大的势力，并拥有强大的新式武装。在日本帝国主义与地主军阀的压

迫下，满洲农民运动亟须有组织地展开。另一方面，矿产资源丰富的东北地区作为中国重要的工业区，因其处在日俄斗争之间，分别受日俄压迫的南满与北满工人身处不同的困境，也使得工人群体更加难以争取自身权益。基于此，1927年12月1日发行的《满洲通讯》第一期全文转载了中共东北第一次党代会发布的《我们在满洲的政纲》，其中有近一半的内容涉及了满洲工农问题，此后若干期也陆续发布了中共满洲省（临）委对各地农民运动与工人运动的指示及巡视员巡视工农地区的报告。在《满洲红旗》发行期间，也有《顾乡屯油房工友同盟罢工》《沈阳市人力车夫又增三千余名》《张学良积极准备屠杀工农》《珲春县教员全体辞职》等号召工农群众深入开展革命的通讯与评论。

与普遍存在的工农问题相比，中共满洲省委需要面临的“满洲问题”则更为纷乱。首先是民族的多元。“满洲是与苏联，外蒙革命国家接近，并与朝鲜被压迫民族接近和相处的区域”<sup>[48]</sup>，工农群众革命行动不可避免地要与这些国家人民发生关系。而中国官僚对待他们的残暴程度，较之对待本国农民可谓赏赉有加<sup>[49]</sup>。因此，满洲省委在朝鲜革命势力较为高涨的东满地区发展朝鲜群众党员，并将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根据一国一党的原则，编入中国党的组织，但是照顾民族的特别关系，虽为中国党所属，也应取特别组织的办法”<sup>[50]</sup>的同时，还在机关报刊上宣传“中、俄、日工人平等待遇，同样工作，同样工资，并一律按物价之高涨而增加工资”“由山东、直隶、朝鲜去的难民，与本地的佃农、雇农、自耕农等一律享有土地所有权”等政策<sup>[51]</sup>。前文提到的刊载于《满洲通讯》的《中共满洲省临委告满洲朝鲜农民书》亦是处理民族问题的重要文件。

其次是胡匪与大刀会的猖獗。在满洲地区尤其是文化相对落后的东边道，农民难以找到正当的反抗压迫者的出路，加之依旧被“信仰真龙天子”“崇拜英雄豪杰”等封建思想束缚的心理，胡匪和继承自义和团的大刀会等民间组织迅速兴起，尤其是更成组织体系的大刀会，“发现尚

不满三个月，附和者已达五、六千人，散布五、六县之广”<sup>[52]</sup>。因其以反帝反军阀为行动出发点，奉系统治阶级对其进行残酷镇压。中共满洲省委为实现对大刀会的领导，通过机关报刊向党内党外传达了诸多重要指示。《满洲通讯》指出：“这是农民自卫的原始的组织，我们必须加以指导，使此等组织成为农民协会武装的组织（农军）。万不可袖手旁观，使此等组织落到豪绅资产阶级指导与利用之下。”<sup>[53]</sup>1928年，满洲省委进一步通过《满洲通讯》指示：“使大刀会土匪对官军不投降，不受骗，坚持到底……煽动土匪大刀会杀富济贫，不扰贫民，反抗官吏。”<sup>[54]</sup>最终，在省委机关报刊的舆论宣传工作下，东北的革命战线具有了全民族的性质：不仅由汉、满、朝、蒙、赫哲、达斡尔、鄂温克等民族形成民族团结的局面，还体现出包括共产党、工农、大刀会等多元社会阶层的广泛性特征<sup>[55]</sup>。

复杂的局势还体现在中共满洲省委始终面对多重斗争对象。大革命时期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因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中原地区革命根据地长期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国共两党的围剿与反围剿，诸如《红色中华》等机关报也重点发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sup>[56]</sup>的领导作用。然而相较于关内地区，满洲省委从始至终都同时在地主、二房东、富农；高利贷、商业资本及国民党官厅、土豪劣绅；帝国主义；韩人反动统治团体等<sup>[57]</sup>“多重大山”中艰难生存。《满洲通讯》曾刊登省委对满洲形势的分析，认为1928年的张作霖之死不但无法消除对满洲人民群众的压迫，反而使满洲“不是无条件的向国民党军阀投降，挂青天白日旗，便即是日本帝国主义一贯的侵占主义，挂红日日本旗”<sup>[58]</sup>。

因此，满洲省委机关报刊必须始终“同一切反动势力与言论作斗争”<sup>[59]</sup>。帝国主义方面，正如宁树藩所言，“东北的报业是帝国主义军事、经济入侵不断深化的结果”<sup>[60]</sup>，帝国主义报刊在东北地区长期占据着重要地位。俄帝国主义在东北的地位逐渐衰微之后，日伪当局不仅大肆创办或控制《满洲日日新闻》《哈尔滨日日新闻》《盛京时报》等中文日文报刊，还严厉查禁国内各地



报刊的流入。奉系军阀方面,军阀政权在自办《东三省公报》《吉林公报》《黑龙江公报》的同时,对民间舆论肆意蹂躏,导致当时民间组织的报纸生命极为短暂。也正因为奉系军阀的镇压,国民政府的报纸在东北也难以产生较大的政治影响。直到1931年7月,东北地区才出现第一份国民党报纸《民国公报》。然而尽管其自身政治影响力微弱,却始终对中共报纸予以严密搜查和破坏,也使得《满洲通讯》与《满洲红旗》即使十分注重秘密发行,参与办报的陈为人、金剑啸、朴殷赫等人还是相继被捕,报刊也不得不跟随省委辗转驻地,数次停刊,且遗存罕见。甚至如今我们可考的部分原文,亦是通过国民政府东省特别区的检查报送,作为“反动”的“赤化宣传信”<sup>[61]</sup>才得以留存至今。正如中共满洲省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党务报告》对东北地区宣传局势作出的判断:“帝国主义有若干机关报杂志通信社,军阀也很认真建立自己的宣传机关,组织宣传队在城市和乡村间皆遍贴标语(反赤的),国民党收买资产阶级的报社,组织东北文学社吸收广大青年小资产阶级群众在他的号召之下。我们没有指导的中心刊物。”<sup>[62]</sup>

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复杂的局面恰恰创造了斗争的绝佳环境。面对多方强大的宣传势力,中共满洲省委自然拥有更为紧迫的发行自身机关报刊的必要——发行工作本身就构成了一种重要的政治斗争<sup>[63]</sup>:“反日工作应在任何工作中都要注意其宣传。满洲此刻虽无国民党的统治,但国民党将来是否有暂时统治满洲的事实,此时很难预料……在一切工作进行中都应向工农及一切民众面前宣传,以防止将来的恶影响。”<sup>[64]</sup>特别是随着奉系军阀势力日趋衰弱,东北地区斗争的主要矛盾趋于明朗,满洲省委文件随即指出,过去“我们的同志认为奉张的统治过于稳固,消极不努力工作……悔悟过去,痛心现在,

应即时努力,充实的准备于最近的将来”<sup>[65]</sup>。1931年9月21日,省委还特别强调“党报应多出,这样才能普遍”<sup>[66]</sup>,足见其对革命宣传工作的重视。

(二)与中央互动的东北党报:中共党报理论体系化的“满洲经验”

《满洲通讯》与《满洲红旗》不仅作为革命环境中的独特战斗主体,更作为“子系统组织”与作为“母系统组织”的党中央<sup>[67]</sup>密切沟通,嵌入更广泛的中国共产党革命战斗体系。时值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在全国逐渐建立起来,中共满洲省委尽管偏居于远离中原的东北地区,但这一地下党组织显然无法以孤立的个体身份活动,而是更大范围的全国性政党组织——中国共产党的一员。正如中共中央在这一时期的要求:“党报不是几个作者私人所编的杂志,乃是我们整个党对外的刊物。”<sup>[68]</sup>因此,作为在这一党组织领导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建立前后的党报实践,在独特的“东北情境”中曲折发展的满洲省委机关报刊始终与中共中央紧密相连。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办报信息流通,满洲省委党报在持续完善自身办报工作的同时,其办报实践也成为早期中共党报理论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经验来源。

一方面,“自上而下”地,中央的办报经验为满洲省委机关报刊提供了借鉴,延续并发展了中央办报工作中的战斗意涵。满洲省临委自成立之日起,即接受了中央“八七会议”决议案的指导<sup>①</sup>。中共中央持续委派代表抵达东北指导办报工作,《满洲通讯》与《满洲红旗》也因此体现出已有机关报刊的特征。如《满洲通讯》在创办初期即以中共《中央政治通讯》为摹本,后者长期刊登中共方针政策性文件,包括领导人的工作报告、党内文件等内容;《满洲红旗》

①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八七会议”通过《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决议案中包括了“按期出版秘密的党的政治机关报”“设立出版机关及传播秘密宣传品传单”“建立全国的秘密交通机关,与出版委员会的散布宣传品的工作相联络”等有关办报工作的内容。可参见本书编委会.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 上[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3.

的发刊辞中“满洲劳苦群众的喉舌”“阶级斗争的武器”等也是借鉴了在其创办一个月前发行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发刊词中“报纸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全国广大工农群众之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喉舌”<sup>[69]</sup>等表述。此后，东北地区各地党报党刊均对其有所遵循，并出现了众多以“红旗”命名的报刊。

此外，中共满洲省委积极与中央进行通联。在省委创办初期，1927年12月22日发行的《中央政治通讯》第16期曾刊登《陈为人关于中共满洲省临委工作情况给中央的报告》，其中指出“五日短篇的通讯已发出自一期至五期，满洲的通讯（致中央通讯）已发出自一期至二期”<sup>[70]</sup>。

“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共东北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直到1933年中共针对东北抗战的统一战线问题发布《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东北地下党组织活动才逐步恢复。这一时期，指导《满洲红旗》工作的姜椿芳曾被派往英亚社（苏联塔斯社在哈尔滨的掩护机关）负责俄文编译<sup>[71]</sup>，从而为其与第三国际远东部的通联提供了便利条件，更有效地指导了《满洲红旗》的办报工作。

共产国际和苏联在通讯工作上的经验也对中共开展党报通讯工作产生过显著的影响。共产国际六大通过了莫斯科《真理报》编辑部与共产国际宣传鼓动部共同发布的有关共产国际在工人通讯运动实践经验的决议案<sup>[72]</sup>，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于1930年5月10日对其进行全文刊发。随后，《红旗》又刊登了《中央党报通讯员条例》，以中国化的立场详细解读了“工农通讯员”这一概念<sup>[73]</sup>。这一名词迅速广泛地出现在各地党委党支部的各类决议和指示中，满洲省委发布的题为《关于党报通讯员工作》的通知文件，就直言了党报通讯员对党报工作与众工作的重要作用<sup>[74]</sup>。

另一方面，“自下而上”地，满洲省委机关报刊在办报实践中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为中共党报理论体系化贡献了实践智慧，深度嵌入中国共产党的广泛斗争过程。“全党办报、群众办报”

作为中共办报方针，至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两次谈话才有其明确的文本来源<sup>[75]</sup>。然而，满洲省委机关报刊早在20世纪20至30年代就已经积极地践行群众路线，并形成能够与“全党办报、群众办报”产生时空呼应的办报观念：《满洲通讯》作为党内机关刊物，主要负责人站在政治家的高度致力于党员与党报的密切联系，要求“各级同志接到此通讯后务须详加研究与讨论或批评”<sup>[76]</sup>，积极开展党内民主建设，这正是“全党办报”的生动表征；后继的《满洲红旗》则不仅面向人民群众，更号召全体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探索了“党性与群众性相统一”的办报路线。

此外，中共领导人在东北地区的办报实践经验，对其日后在中央根据地开展工作具有相当程度的借鉴意义。1929年7月至次年3月，刘少奇曾在东北地区从事地下秘密工作，并主持指导了短期作为中共满洲省委机关刊物的《政治通讯》，作为《满洲通讯》被迫停刊之后的重要补充。刘少奇在东北地区的办报工作经历为他日后领导各地区革命斗争积累了丰富经验。1939年，刘少奇在苏北担任中共中原局书记，在此期间，他创办了中原局机关报《抗敌报》（后更名《江淮日报》），并要求该报重点解决党内思想问题<sup>[77]</sup>。而这一办报观念，正是在其主持《政治通讯》工作时的一条重要方针。《政治通讯》第一期《告白》即指出：“希望各地同志读此通讯后，应切实讨论，如有异意，即报告省委。”<sup>[78]</sup>遗憾的是，《政治通讯》目前仅存一期，更多相关的历史细节我们无法从中窥见。

在缺乏体系化理论指导的时期，满洲省委机关报刊的“群众路线”探索其实存在诸多不足。在《满洲红旗》更名《东北红旗》后，由于办报的长期停滞，省委缺乏更充分的办报经验，使得《东北红旗》第一期中对伪满洲国地位合法性、工农斗争的最新消息等人民群众切实关心的问题并未详细说明，更多是口号性质的刻画。此外，限于实际技术情况，《东北红旗》第一期的印刷也存在着不少瑕疵。曾有读者在满洲省委党内教育期刊《战斗》发表“读后感”，指

出阅读“我们的《东北红旗》后在人脑子中的印象……是敷衍了事的官僚主义，这是脱离群众的严重现象”<sup>[79]</sup>！但满洲省委机关报刊领导人并非彻底偏离对群众思想的坚守。事实上，满洲省委始终将群众宣传工作的要旨深刻付诸实践。满洲省委曾举办过三场对内教育宣传工作训练班，并尤其针对农民运动宣传出版了相关培训教材。尽管工作中存在教材欠通俗、训练实践不足、缺少对工人运动宣传的关注<sup>[80]</sup>等问题，但从某种角度来说，这种初具雏形的传播实践不仅是东北地区“近代新闻教育中社会教育实施机构的重要形式”<sup>[81]</sup>，也为中共早期党报理论的体系化贡献了实践智慧。此后十年间，这种在职党报工作者“再教育”在晋冀豫区、太行山区、西柏坡等中原根据地蔚为大观地发展，形成党报理论与实践的勾连。

#### 四、结语：在逆境中战斗，在实践中完善

《满洲通讯》与《满洲红旗》生长在东北地区20世纪20至30年代波诡云谲的历史转折中，其发展历程就像这片土地一样命运多舛。《满洲通讯》在大革命失败的节点前后发行不过一年，许多创办初期的计划事实上并未得到实现；发行时间相对更长的《满洲红旗》也经历了数次停刊与办报地点的辗转，甚至其办报初衷都是中央政治局在1930年制定的左倾错误路线与一整套错误主张的产物。此外，其发行过程亦面临诸多挑战，身处军阀割据混战的政治漩涡之中，既不被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所容，又不得不在国民政府严密的搜查与控制中艰难求生。《满洲通讯》与《满洲红旗》的办报实践，折射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共党报工作者在革命逆境中坚持办报的独特实践。在严峻的革命斗争现实下，满洲省委机关报刊能够秘密地坚持发行，这本身就构成了党报“战斗性”的重要内涵。

作为中共满洲省委机关刊物与机关报，《满洲通讯》与《满洲红旗》在满洲党建中起到了

核心作用，其向内进行党员宣传与向外联系人民群众相结合，探索“群众办报”的实践路线，并通过革命宣传以动员民众参与到革命斗争中，致力于成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及一切反动妥协思想之战斗机关”<sup>[82]</sup>。这种办报方式也暗合了中共在更大范围的办报工作实践中形成的“战斗性”的双重含义——对内，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保障党和国家的民主化、加速社会进步；对外，尖锐地揭露一切黑暗和腐败、揭露敌人，同时以鲜明的态度、正确的立场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sup>[83]</sup>——前者曾在1925年出版的中央机关报《布尔塞维克》发行宗旨中有所体现，后者则与20世纪50年代中共中央办报政策相呼应<sup>①</sup>。

更进一步地，《满洲通讯》与《满洲红旗》处在独特的历史时空中，适应历史转折时期的满洲省委组织所需，推动了全党的思想统一与精神振奋，也树立了东北地区的办报典范，在行动上以“战斗性”对党报的党性进行了诠释。中共满洲省委存续的九年间，出版发行了《白话报》《关外》《北满红旗》《满洲工人》等种类繁多、数量可观的针对不同阶层的革命刊物，成为传播革命文化、号召全民族斗争的重要媒介。

“九·一八”事变后，在伪满洲国的统治下，国民党政府的报刊陆续绝迹，民办报刊相继停刊或在“新闻整顿”中消亡，使得满洲省委报刊及后续东北党组织发行的红色报刊成为东北地区仅存的国人报刊<sup>[84]</sup>，更构成中央与地方党组织互动与沟通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满洲通讯》与《满洲红旗》积极响应党中央的指示，又以对“群众办报”的深度探索，为中共党报理论与实践提供了丰富的“满洲经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地区党委、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通过广泛参与办报，建构起历史大转折时期一条重要的斗争战线。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以后，东北地区党组织进行改组，中共满洲省委随之撤销，受命于危难之间的机关

① 有关“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九日）”的记载，可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 中 1950～1956[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5-8。



报刊《满洲通讯》与《满洲红旗》完成了其所肩负的阶段性历史使命，并将中国共产党在白山黑水间艰苦奋斗的革命斗争精神传播下去，延续至今。

(责任编辑:李韵奕)

## 参考文献

- [1] 方汉奇.《东北新闻史》序[J].新闻传播,2002(5):9.
- [2] 何村.伪满洲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与体系的构建[J].新闻大学,2012(3):28-33.
- [3][60] 宁树藩,主编.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 上[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3;258.
- [4][32][39][57] 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一九三〇年五月—一九三〇年十月[G].沈阳:辽宁美术印刷厂,1988:11;189;187;45-47.
- [5]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 第2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277.
- [6] 倪延年,主编.民国新闻史研究 2014[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262-263.
- [7] 柯华,主编.中央苏区宣传工作史料选编[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8:2-3.
- [8][10][11][13][15][18][47][48][49][51][52][64][70] 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一九二三年—一九二八年三月[G].沈阳:辽宁美术印刷厂,1988:182;182;309-310;306-307;219;261;217;219;357;220-221;355-356;229-230;209-210.
-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 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362.
- [12][38][43] 梁利人,主编.沈阳新闻史纲[M].沈阳:沈阳出版社,2014:43;24;25.
- [14][16][19][21][24][54][58][62][65][80] 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一九二八年四月—一九二九年二月[G].沈阳:辽宁美术印刷厂,1988:161;9;13-18;273-274;274;56;88;205;88;206.
- [17] 杨昭全,李铁环,编.东北地区朝鲜人革命斗争资料汇编[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479.
- [20][26][42] 黑龙江日报社新闻志编辑室,编著.东北新闻史 1899-1949[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196;281-282;312.
-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M].北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344.
- [23] 向在仁.宣传学概论[M].成都:四川省科学院出版社,1988:129.
- [25] 辽宁报业通史编委会.辽宁报业通史 第1卷 1899-1978 上[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6:92-93.
- [27][34][35][61] 黑龙江省档案馆,编.黑龙江报刊[M].哈尔滨:黑龙江省档案馆,1985:408-418;404-405;406;398.
- [28] 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黑龙江省志 第50卷 报业志[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74-75.
- [29] 王晓岚.中国共产党报刊发行史 中共新闻思想与时俱进的历史考察之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98.
- [30] 本报征稿启事[N].满洲红旗,1930-9-15.
- [31][37] 发刊辞[N].满洲红旗,1930-9-15.
- [33] 徐信华.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85.
- [36] 中央档案馆,编.中央档案馆馆藏革命历史资料作者篇名索引(个人部分) 第三册(七画)[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5.
- [40] 杨哲,宋敏.中国现代百科全书奠基人 姜椿芳传[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43.
- [41] 刘威.中共满洲省委革命出版物历史评介[J].出版发行研究,2016(7):98-101.
- [44] 黄进华.场域视野与马克思主义在东北的传播 1872-1948[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6:157.
- [45] 王敏.列宁的党报“战斗性”理论:斗争关系、话语策略与统一逻辑[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29(7):5-24+126.
- [46] 博古.致读者[N].解放日报,1942-4-1.
- [50] 范丽红,主编.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编.“九一八”研究 第15辑[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6:186.
- [53] 尉常荣.抚顺地区人民抗日斗争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294.
- [55] 东北沦陷十四年史总编室,编.1931-1945 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 第1辑[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254.
- [56] 发刊词[N].红色中华,1931-12-11.
- [59] 刘建明,等.中国媒介批评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446.
- [63] 问友.发行革命报纸是一种群众政治斗争[N].红旗,1930-5-27.
- [66] 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一九三一年四月—一九三一年七月[G].长春:吉林省工商联印刷厂,1988:63.
- [67] 李晓灵,王晓梅.渊源与化变 延安《解放日报》的传播体系及其当代价值之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59.
- [68][69]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 1921-1949 年 下[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33;21-22.
- [71] 曲晓范,赵欣.吉林城镇通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5:297.
- [72] 徐杭燕.党报通讯员制度:从何而来,如何形成[J].新闻战线,2021(11):60-64.
- [73][82]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 上 1921-1949[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64;25.
- [74] 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一九三一年一月—一九三一年四月[G].长春:吉林省工商联印刷厂,1988:121-123.
- [75] 朱清河,王青.“全党办报”与“群众办报”的历史缘起与逻辑勾连[J].国际新闻界,2021,43(5):142-157.
- [76] 张璐.《满洲通讯》:中共满洲省委创办的第一份刊物[J].共产党员,2015(22):36-37.
- [77] 潘德利.中国新闻出版史上光辉的篇章——刘少奇与报

刊工作[J]. 党史纵横, 2003(4):29-30.

[78] 告白[N]. 政治通讯, 1929-10.

[79] 中央档案馆, 辽宁省档案馆, 吉林省档案馆, 黑龙江省档案馆.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一九三二年八月 -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 [G]. 哈尔滨: 哈尔滨呼兰印刷厂, 1988:400-401.

[81] 许晓明. 中国近代新闻教育发展史研究 1912-1949[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6:17.

[83] 陈力丹, 吴鼎铭. 党报的战斗性[J]. 新闻前哨, 2016(9):93-94.

[84] 田雷. 抗战时期东北地区红色报刊考察[J]. 红色文化学刊, 2020(2):66-74+111.

## Combative Practice and the Local Formation of Party Newspaper Theory: An Examination of the Publications of the CPC Manchuria Provincial Committee

Cao Peixin, Song Qiming

**Abstract:** “Manchuria Newsletter” and “Manchuria Red Flag”, which are organ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of CPC’s Manchuria Provincial Committee, witnessed the revolution experienced by CPC under complex situation in the modern Northeast China. Through “Manchuria Newsletter” promoting party members internally and “Manchuria Red Flag” connecting with the masses externally and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situation of “modern Northeast China”, they formed a unique local practice of party newspapers and enriched the “combative” connotation of the CPC’s Party newspaper theory. On the one hand, the oppression of multiple forces led them to carry out the work of newspaper in secret, which shows a distinct “combative” feature.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ntinuous interaction 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d deeply embedded them into the extensive fighting process of the CPC, and contributed unique “Manchurian experience” to the CPC’s newspaper theory and practice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struggle.

**Keywords:** Manchuria Newsletter; Manchuria Red Flag; journalism history of CPC in Northeast China; party newspaper theory; combative character

**Authors:** Cao Peixin, School of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Song Qiming, School of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Missouri School of Journalism, University of Missouri.



# 从“人类的延伸”到“分布式身体”： 可穿戴技术的媒介史考察

任依瓯

**摘要** 长期以来，“可穿戴”技术被理解为“身体与感官的延伸”，但这种理解已不足以把握当代人与技术关系的根本性变化。由此，本研究采用媒介考古学方法，考察可穿戴技术媒介史的两大时期：其一是以“身体的延伸”为核心的时期，涵盖从史前史到可穿戴设备初现的过渡，其间技术自主性的萌芽开始撬动传统主客体二元结构；其二是可穿戴技术通用与普及的时期，缔合环境趋于基础设施化。媒介史的断点发生在可穿戴技术普遍接入互联网的時刻，它们由此化为通向庞大而隐蔽的巨型结构的界面。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提出“分布式身体”的概念，作为理解身体与技术关系的新视角，以进一步探索“作为湿件的人类”的存在方式，解构“人机共生”的神话。该概念揭示了当下的可穿戴媒介如何重塑身体的边界，使其呈现为非二元、开放、关系性的生成过程。

**关键词** 可穿戴；身体；缔合环境；湿件；媒介考古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任依瓯，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 210023

## 引言

在机械时代，我们完成了身体的空间延伸。今天，经过一个世纪的电力技术发展以后，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又得到了延伸，以至于能拥抱全球。就我们这颗行星而言，时间差异和空间差异已不复存在。我们正在迅速逼近人类延伸的最后一个阶段——从技术上模拟意识的阶段<sup>[1]</sup>。由此，谈及可穿戴设备，感官与身体是不可回避的核心议题，可穿戴技术本身似乎更是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60年前“媒介是人的延伸”这一论断最具像化的例证。事实上，自人类的祖先披上兽皮直至“可穿戴”一词被概念化之前，眼镜与助听器这样的可穿戴技术已作为人类视觉、听觉的延伸而存在。20世纪中期，现代技术意义上的“可穿戴”概念<sup>①</sup>由计算机的到来而被催生出来<sup>[2]</sup>，史蒂夫·曼恩（Steve Mann）在《人机交互百科全书》中给出了一种代表性定义，他将“可穿戴计算”（wearable computing）界定为“发明、设计、制造或使用迷你体（miniature body-borne）计算和感官设备的研究或实践”，并认为“可穿戴计算机可以穿在衣服下面、上面，或者就是衣服本身”<sup>[3]</sup>。类似地，萨德·斯塔纳（Thad Starner）认为，“可穿戴计算”通过将计算机嵌入衣服

① 传统“可穿戴”一词最早可追溯至公元16世纪末期，用于描述服饰的特性。



(如鞋子),或创造像衣服一样使用的形态(如太阳镜),从而使得计算机真正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一部分<sup>[4]</sup>。

两位学者都自然地将衣物作为“可穿戴”技术的对应物,与麦克卢汉媒介理论中服装作为“延伸的肌肤”形成呼应,暗含着“可穿戴”物与人类及其身体间的深刻关系。服装本就是人类用以应对与改造自然的技术物,几乎总是在促成人类的经验行为。它是麦克卢汉笔下“热量控制的机制、社会生活中自我界定的手段”<sup>[5]</sup>,更构成了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意义上“容纳、定义人类存在的微型环境”<sup>[6]</sup>。作为“皮肤的皮肤”,衣服调动人类的感官,实现官能平衡,并与人体形成多层次的互动关系。这正是“可穿戴”一词所呼应的地方:它的代表性定义凸显了技术与身体、感官之间的紧密交织,从而区别于其他技术。

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从可穿戴技术的初现到现在变成一个最热闹的产业,人与技术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今天的我们似乎并没有如麦克卢汉所言“逼近人类延伸的最后阶段”,相反,我们看到了一种反向的倾向:技术不再仅仅是人类的延伸,而人类也逐渐被纳入技术的延伸网络之中。对于当下的可穿戴设备,更关键的意义已不再是它们对于人类身体与感官的直接作用,前述“可穿戴”的代表性定义对身体与感官的强调恰恰遮蔽了这一点。小至脑机接口芯片、降噪耳机,大到等身体感衣、具身机器人,它们都只是很小的界面(interface),发挥着约翰·彼得斯(John Peters)生动比喻中“门”的角色,通向更为庞大而隐蔽的基础设施<sup>[7]</sup>。

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可穿戴技术与人类关系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这一变化是如何发生,我们又该如何描述这些历史过程呢?在这一过程中,人类被纳入到更大规模的技术之网的运作中,从而呈现出被“延伸化”的趋向,究竟意味着什

么?这并不意味着身体的消失,而是传统主客二元身体观的瓦解。因此,以“身体”作为线索,本研究从媒介史的视角出发,聚焦于“可穿戴媒介如何重构身体与技术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

不同于传统延伸论,本研究提出“分布式身体”概念,旨在提供一个理解当下可穿戴媒介与身体关系的新视角。需要指出的是,“分布式”(distributed)这一概念前缀并非首次被引入理论语境,它在不同知识传统中早已被使用,相关讨论散见于网络工程、认知科学、后人类研究与媒介研究的语境中<sup>①</sup>。不论是“分布式网络”还是“分布式认知”,不同的思想传统对于“分布式”相关理论的建构存在一定的共通之处,它们都拒绝将功能、能动性或结构还原为单一中心性,或简化为以对立关系为前提的解释框架,而是将其置于多重行动者、装置与环境的关系中加以探究。

“分布式身体”这一概念受到这些理论谱系启发,但并非由既有理论推演而出,而是在对可穿戴技术相关的媒介史材料分析中,通过揭示人与媒介关系的流变,进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理解视角。

本研究采用媒介考古的方法,旨在超越标准的媒介历史叙事,探究媒介的发明、载体、机制、设备、空间在时间中的流变,以及其如何作用于人类经验,并参与身体、感官与认知的构成<sup>[8]</sup>。具体而言,文章通过重访媒介史中的两个时期和一个断点,逐步分析媒介与身体关系的演变,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分布式身体”这一概念。首先,本文聚焦于断点前的“前互联网”时期,将史前史与可穿戴设备的初现并置讨论,分析可穿戴技术在史前史中作为“人类的延伸”的基本特征,并进一步探讨可穿戴设备的初现如何在延续这一传统的同时,显现出技术自主性的倾向,从而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身体观与立场构成挑战;第二,在可穿戴技术通用与普及的时期,本文通过将其拆解为技术元素、个体与组合的方式,重点分析其缔合环境如何数字

① 关于该概念在不同知识传统中的使用,可参见:1. 分布式系统与网络研究(e.g. Paul Baran); 2. 分布式认知理论(e.g. Edwin Hutchins); 3. 后人类研究(e.g. Katherine Hayles); 4. 媒介学(e.g. Mark Hansen, Alexander Galloway)。此处仅举代表性例子,本文不拟对上述理论作系统梳理。



基础设施化，进而瓦解了二元的身体观，构成媒介史的断点；第三，基于上述“两个时期、一个断点”的历史分析，本文提出“分布式身体”这一新的身体观，作为理解媒介如何重组人类身体边界、感知方式与行动结构的新视角。

### 一、从“人类的延伸”到技术自主性萌芽：前互联网时期的技术与身体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类的匮乏与可穿戴技术的补偿似乎构成了一种不言自明的主客体关系，因此，我们确实可以像麦克卢汉一样从身体的角度，思考可穿戴技术从史前史到可穿戴设备初现的过渡，以此为起点“理解媒介”。首先需要明确的是，麦克卢汉理论背后存在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偏向，他表明，“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物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sup>[9]</sup>。他并未点明的是，这里的“尺度”虽由技术引进，归根结底仍是以人类为尺度而界定，从而在无形中构成了人类延伸论的前提。不过，从当下的媒介环境来看，我们并未如麦克卢汉所言走向“官能平衡”或“人类延伸的最后阶段”，所谓“人的延伸”终究只是一个大而笼统的概括，要厘清这其中无法被一言以蔽之的人与技术间关系的流变，还需要回到那些微观的历史和散落的东西当中去。

回到可穿戴设备的“起源”，这是事物与关系悬而未决的时刻，我们可以聚焦其中一些相对重要且典型的案例。1955年，数学家爱德华·索普（Edward O. Thorp）开始设计一台伪装在鞋内的小型计算机，随后与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合作完成该装置，用于预测赌场轮盘结果；1961年，费尔科（Philco）公司研发头戴式显示器 Headsight，并与遥控闭路视频系统配合使用，该头显后被用于军方训练，并催生了名为“达摩克利斯之剑”（1968）的计算机头显系统；1968年，汉密尔顿钟表公司（Hamilton Watch Company）与电子数据公司

（Electro Data Inc.）共同开发脉冲星（Pulsar）手表，这是一款使用发光二极管（LED）、以数字格式显示时间的手表，也是第一款没有机械可移动部件的全电子手表；1970年代以来，曼恩致力于发明 EyeTap 电子眼镜及相关计算机系统，通过计算来改变光线，以不同的应用程序、数据叠加生成媒介化“视觉现实”。

类似上述早期原型的、实验性的案例数不胜数，它们也许转瞬即逝，又或是改头换面，融入新的媒介当中。表面上看，它们似乎只是分散且未通用化的“离群值”，但是它们实际上承载着某种复杂的张力。一方面，它们和光学眼镜、声学助听器相似，延续着史前史中“技术作为身体的延伸”的传统：以人类身体为起始点，又回到人类的身体，服务于主体的感知；另一方面，它们作为技术物的存在具有内部连贯、一体化的倾向性，即呈现出技术的自主性，由此人类主体的意向不再具有绝对的宰制力，开始受到撼动。这种张力正体现了人与技术关系悬而未决、开始发生变化的关键时刻。

所谓“人的延伸”这一史前史传统，可以概括为可穿戴技术要么放大、增强，要么模糊、截断人们的感官，而这个过程，在“可穿戴”及“可穿戴设备”概念尚未成型的时间里便已开始。光学镜片“可穿戴化”的过程正是这段史前史的代表性缩影。六个世纪以来，“眼镜”以不同的物质形态与人体器官发生互动。起初只能手持，而后被设计成可架于或夹在鼻梁之上，最终以丝带或金属支撑固定于耳部<sup>[10]</sup>。眼镜对于视觉感官的补足，体现一种趋向于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意义上“在手状态”的透明化。这个过程由人类“看见”（并维持清晰可见状态）的欲望和需求为底色，与之相伴的是感官的遮蔽与截断——有色镜片减少眩光、缓解光敏症状，同时遮蔽了眼睛这一关键的“情绪器官”，他者的感官因此也被引入太阳镜与佩戴者的关系中<sup>①</sup><sup>[11]</sup>。总而言之，在史前史中，

① 譬如，清朝时期，佩戴墨晶、茶晶的人在接待客人时会摘下它们以示尊敬，而在任官员出行时，则会刻意佩戴它们，使行人无法观察官员的神情，从而彰显官员的威严。

技术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意义上的“居间”（in-between），居于人类于自然之间；人类的感官在“去自然化”的意义上得到了延伸，人类征用技术，而技术补偿了人类的匮乏。

而后，早期真正被称作“可穿戴设备”的技术物，生发于由史前史所构成的思想、技术环境之中。在这一意义上，它们在“身体的延伸”方面确实可以被视作史前史的延伸。以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可穿戴设备为例。索普与香农所设计的赌博作弊计算机由十二个晶体管、两个置于鞋内的微动开关、微型扬声器及连接其间的电线组成。装置运作时，使用者以脚趾触发开关输入轮盘数据（转子与球的计时），计算机再以八个不同音阶向耳道中的扬声器传输预测信息<sup>[12]</sup>。触觉在此通过装置转化为听觉，计算技术补偿了人类无法精准感知轮盘时间的匮乏。类似地，曼恩的 EyeTap 眼镜装置通过程序调控和数据叠加来操纵视觉现实，以屏蔽广告等外部干扰。“选择性的看见”相较于光学眼镜的“看见”或有色眼镜的“不可见”，无疑都是视觉器官的进一步延伸。

在这些案例中，技术持续回应着人类因为先天不足而产生的感知需求。以恩斯特·卡普（Ernst Kapp）（延伸论的思想先驱）的思想概而言之，从史前史到可穿戴设备真正初现的这段历史过程，是产生人类用来定义技术的概念和人工制品的基本过程，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恐怕仍然是人类作为主体，人体器官向外投射的过程，即人类将身体的形态、功能外化并延展为技术物<sup>[13]</sup>。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些原型与实验性的可穿戴设备在被理解为“人类的延伸”的同时，也已开始呈现出技术自主性。所谓“技术自主性”，是从吉尔伯特·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的技术哲学中所提炼的概念，指技术物在具体化过程中构建其“缔合环境”（milieu associé），并与之形成因果循环的反馈回路，

从而获得自我调节的相对独立运作能力。其中，最为核心的过程即是技术存在从抽象走向具体化，“抽象形式”代表着西蒙东理论中技术物的基本形式：原始的、抽象的技术物“只是一些在根本上被分隔开来的科学概念和原理在物质上的翻译”<sup>[14]</sup>。例如，眼镜作为某种意义上的可穿戴设备“起源”，可以被视作是抽象的：镜片、镜架、鼻托、铰链等部分彼此相对孤立，一个结构只对应一种功能，它们被组合在一起是因为它们的聚合能产生预期的效果。

与之相对，曼恩的 EyeTap 眼镜则是更具具体化的技术个体。装置中存在计算系统、摄像传感系统、分光（diverter）模块以及反向相机（Aremac）<sup>①[15]</sup>，各个部分之间不再是机械意义上的聚合，一个结构可以具有多种功能，结构与结构之间彼此耦合，形成控制论意义上的因果反馈机制，动态聚合成有机的整体。这种具体化的倾向“趋向于内部连贯性，采纳了循环的因果系统（régimes de causalité），另外，它也结合了自然世界的某些部分，后者变成了功能的条件，成为因果关系系统的一部分”<sup>[16]</sup>。

也就是说，技术自主性显现的重要方面同样体现在，这些具体化的技术物在维持内在结构运作的同时，将外界环境纳入其运作之中，由此它们创造了自己的运行环境，即西蒙东所言的“缔合环境”<sup>[17]</sup>。以曼恩 EyeTap 眼镜装置为例，其计算系统凭借分光以及摄像传感模块的信息反馈，可以与外部环境进行数据耦合，实时适应环境变化并调整显示成像。Pulsar 手表根据光线传感器调节显示亮度，以及 Philco 头显系统利用磁力传感器将用户头部运动转换为电信号，使远程摄像机保持同步<sup>[18]</sup>，都说明技术物如何将外部环境纳入其运作之中，由此形成了新的缔合环境。由此可见，缔合环境存在于技术个体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之间，兼具技术性与自然性，它不仅向“内”趋于技术连贯性，而且向“外”协调人类、物与环境，构成循环因果关系的稳态，

① 分光系统用于将朝向眼镜的光线分流到测量系统中，实现重定向；反相机所做的事情与相机相反，用于重建偏导光线。





技术物因此只有与它自己新创造的缔合环境共存时才存在。

综上所述，在可穿戴技术普遍接入互联网之前，技术与身体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延续着“人类的延伸”这一历史传统。不过，从史前史到可穿戴设备初现，这一过渡同样标志着技术物具体化所呈现的自主性开始显现，并由此对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发起挑战。西蒙东的技术物具体化理论为理解可穿戴技术的自主性提供了一条重要的路径：对技术对象的识别和理解，不应再以某种主体的标准或尺度为前提<sup>[19]</sup>。在这一意义上，身体与技术的主客体二元关系开始逐渐被撬动，可穿戴技术不再只是在参与人类感官、身体与认知构成中服务于主体的工具与手段，正如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对麦克卢汉的批判那样，单从生理学的视角去思考技术是狭隘的<sup>[20]</sup>。人类的身体与姿态早已不再是技术物唯一的缔合环境，人类通过技术的具体化，与技术物的缔合环境形成新的关系，而技术物通过内部与外部的耦合生成着新的结构、功能与秩序。由此，身体不再天然居于人与技术关系中绝对的中心位置，既有的结构性关系开始动摇，而新的关系仍悬而未决。

## 二、缔合环境的数字基础设施化：“互联网断点”后的技术与身体

可穿戴设备的初现，标志着人与可穿戴技术间维持了数个世纪的主客体二元结构开始被撬动的时刻，不过，笔者认为这段媒介史的断点发生在可穿戴设备普遍接入互联网时。此时，最为关键的问题已不再围绕着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关于“媒介是人的延伸”的论断而展开，媒介理论家尤西·帕利卡（Jussi Parikka）提醒我们，应当将媒介看作是地球的延伸<sup>[21]</sup>，地球的原材料不仅聚合成为技术物本身，更构成了托举技术物运行的可计算基底。帕利卡的地球延伸论所隐含的、而被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讲明的是，媒介个体都不再是它们自身，它们只是通向更庞大技术体系的“门”。如前文所述，任何新的技术物出现都不是孤立的个

体，总是需要一个缔合环境与之对应。也就是说，如今那些名为“可穿戴”的技术物曾经拥有的缔合环境都逐渐被打碎，而后重组为更大的、更复杂的缔合环境。新的功能、结构以及秩序持续不断从中涌现。

我们并不能以当下可穿戴设备纷繁复杂的形式与应用场景为出发点，因为这些表面特性是不稳定的，再多元的呈现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数字基础设施二进制排列组合的结果。我们可以像西蒙东一样将技术物分层次理解，剥离出构成可穿戴设备的基本技术“元素”（élément）、由元素聚合而成的技术“个体”（individu）及进而组成的技术“组合”（ensemble），那么，构成可穿戴技术个体的关键性技术“元素”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计算与通信技术、传感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所谓技术“元素”（在此语境中指代的是传感器、计算芯片、通信模块这样的东西）是“技术性的真正载体”，它们所承载是“具体化的技术现实”，并且具有转导性（transductivité），“就好像种子一样，它们承载了物种的特性并会重塑新的个体”<sup>[22]</sup>。

也就是说，可穿戴设备可以被视作这些关键性技术“元素”的载体，元素们根据特定的方式组织在一起，呈现出多样化的个体形式。更加不可忽视的是，技术物的个体化（individuation）（即个体在未完成的潜能与环境的关系中生成的过程）并不会真正“完成”，只会“从一个亚稳态到另一个亚稳态”<sup>[23]</sup>。可穿戴技术个体作为媒介，始终处于技术与自然、内部与外部之间的交汇点，并且进一步被嵌入数字时代更大的技术“组合”，这个庞大的缔合环境是技术性的保存者。在组合的层面，可穿戴技术“个体”通过与其他技术物、系统及人类个体的协同运作发生持续的个体化，在关系中持续生成着动态的“亚稳态”。这是由于无数的人类和机器共同嵌入这张技术之网，可穿戴设备的通用与普及才得以实现并逐渐常态化，而这也正是新的媒介关系不断生成的过程。

不难发现，可穿戴设备通用化过程中的关键性技术元素（计算与通信技术、传感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有着共同的可计算基底。第一,根本上来说,这意味着它们的缔合环境由数据库、算法和网络协议这样的东西构成。那些受结构或方案(schema)管理的数据、元数据、“本体”及其他处于语法化进程中的形式,它们凭借相互关系和其他物体彼此交织。许煜在讨论数码物(digital object)的存在模式时,将数码化过程视为“数据的物化”和“物的数据化”这一双重过程<sup>[24]</sup>。这一过程表明,可穿戴设备的存在方式已不同于传统的技术物,它是数码化的。

第二,更具体来说,可穿戴设备同样成为了可以通过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巨机器”(megamachine)概念来理解的庞大技术体系的一部分。芒福德认为,现代技术的问题并不在于机器本身,而在于机器背后的巨机器,巨机器是制造整齐划一秩序的系统<sup>[25]</sup>,现如今在可穿戴技术背后的便是一种覆盖全球的巨机器体系。本杰明·布拉顿(Benjamin H. Bratton)的“堆栈”(stack)理论为理解这一抽象结构提供了更加直观的框架。在他看来,所谓互联网,并不是一张“网”,计算基础设施也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巨大实体,它们是由数十亿台我们视为一个事物的微小机器组成的概念集合,因此,他从技术中提炼出一个形式模型将巨机器分解:计算(computation)产生了“行星尺度计算”的巨型结构,横跨六个相互依存的层级——地球层、云层、城市层、地址层、界面层、用户层<sup>[26]</sup>。

以此为基础,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关键技术元素是如何重塑了可穿戴技术个体。

第一,表面上看,计算与通信技术的发展似乎只是将蓝牙、无线路由、蜂窝移动网络、云计算等具体的技术引入,可穿戴设备因此由可以物物相联到接入全球互联网。然而,不可忽视的是,这个引入的过程亦完成了可穿戴技术成为地球延伸的关键转化,行星的能量、金属矿石和化合物构成了技术运作的外部环境的

基础,“没有将物质转化为能量、能量转化为信息就没有计算”<sup>[27]</sup>,硅与锂这样的元素是可穿戴背后巨机器运作的“燃料”。在此之上,云的层级通过服务器、数据库、海底光缆、分布式应用等基础设施不断吸收、留存、调用数据,使“无处不在”的计算成为可能。可以说,计算与通信技术是堆栈与实体物交叉、堆栈层级之间实现可互操作性的重要前提,“任何一种连接都会调用(invoked)与激活(activated)起整个系统;整体被‘折叠’至每一个单独的激活实例中,使普遍性与特殊性相融”<sup>[28]</sup>。

以 Apple Vision Pro<sup>①</sup>为例,它的内部含有计算组件,本质上已经是一台小型计算机,但接入互联网基础设施才是它作为技术个体的颠覆性重塑所在,以它为代表的智能眼镜所共有的技术走向是将云端算力与本地算力相结合。比如,英伟达(NVIDIA)公司的 Omniverse 平台可以在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为 Apple Vision Pro 终端提供流式传输基础设施,这意味在头戴屏幕中实现实时 3D 画面的计算任务并不在用户与之发生互动的头显设备内部发生<sup>[29]</sup>。设想这样一个场景,当一位来自南京的建筑师在自己的书房里戴上头显,进入 Omniverse 的渲染引擎,她动手手指打算为自己的 3D 设计模型打造一个红色的屋顶,关于“红色屋顶”的数据经由摄像头和传感器的手势捕捉,首先会被设备内部的计算芯片转化为计算机编码,在本地完成编码后的数据通过本地交换机,经由互联网传输到位于北京的亚马逊数据中心(AWS)被进一步处理和打包,再经由跨太平洋光缆传输到位于加利福尼亚的英伟达公司服务器,更新后的 AI 模型数据被计算芯片渲染成图像或视频流,最终再经由北京传输回建筑师的书房,在头显中生成“红色屋顶”。

更进一步地,这个可以被较为准确描述的过程也只是冰山一角,它的每个细节背后都可以进一步向外延伸,其中还包括一些难以追溯、厘清的“供应链”,比如来自玻利维亚西南部

① 头戴式显示器,由苹果公司生产的首个“空间计算设备”。



盐沼或是西澳大利亚沙漠地区的元素、金属与矿物大约经由挖掘、加工、混合、冶炼和物流运输最终到达旧金山湾区，聚合成网络路由器、电池和数据中心等事物组成的基础设施，共同构成了可穿戴技术物运作的缔合环境<sup>[30]</sup>。换言之，建筑师的一个手势，其实调用、激活了“堆栈”行星网络的整个系统，计算与通信技术的发展将用户与可穿戴设备共同接入其中，围绕着这个巨型结构生成着新的关系与秩序。

第二，传感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构成了可穿戴设备的另外两项关键性技术元素，它们的发展代表着可穿戴技术向数字基础设施系统提供数据、整合数据的能力。其一，传感技术是“堆栈”模型中用户与系统互动的“界面”，可穿戴设备因此在“堆栈”内部被媒介化。传感性质的演化意味着新的数据不断从人类身体流向计算装置——从赌博机器脚趾的按压互动，到 Philco 头显的运动捕捉，再到当下运动手环对心率、血氧与睡眠周期的检测，智能眼镜对手势与眼动的追踪，乃至脑机接口将神经生物信号转译为可计算的信号形式；其二，可穿戴设备内置以及云端部署的人工智能技术，则以这些持续生成的数据为训练基础，使健康分析、运动捕捉与脑电解析等算法得到持续的优化。简言之，传感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向数字基础设施提供、整合并增强数据流，这一数据逻辑正是理解二者如何共同重塑可穿戴技术个体的关键。

对于数字基础设施来说，数据是一种不言自明的核心资源与驱动力。从计算系统诞生之初，数据和处理系统之间就是一种无休止的消耗关系。比如，二战末期，由女性操作员组成的团队向计算机（ENIAC）持续输入指令与数据，以提高弹道计算的准确性；此后，IBM 团队通过收集并整合大规模语音与文本数据的方式来训练计算模型。在长期的技术实践中，更大规模的数据集通常意味着更高表现、更复杂的计算模型，“更多的数据就是更好的数据”<sup>[31]</sup>，这个理念同计算机器的存在一样古老。当下，预计在 2024 至 2028 年间，全球数据总量将至少达到此前五年总量的 2.9 倍，近一半的数据将直接产生

于云端，且超过 60% 的数据会存储于云端<sup>[32]</sup>。庞大的数据通过数字基础设施被存储、传输和处理，系统内部的各类数据不仅构成模型的训练素材，同时也不断推动着基础设施自身的运转、扩张与自我优化。具体而言，“堆栈”中的云层建立在分布式服务器和终端架构的基础上，通过全球网络共享计算资源与数据流，数十亿台设备所产生的数据流向各自的中央处理器，在数据中心完成处理后，再重新分配给嵌入这一技术网络中的人类与机器<sup>[33]</sup>。云层不断吸收数据，通过数据整合人群、传感器、服务与设备的同时并分散它们，在这个过程中，云层达成一定的稳态并保持进化。

面对重构后的可穿戴技术个体，表面上看，人类似乎仍在与智能眼镜的数码旋钮或运动手环的微型屏幕交互，但实际上是与庞大而又隐蔽的数字基础设施发生关系——“任何一个用户在不同的时间点都会启动数百万个不同的列目（columns），从而执行不同组合的嵌套位置”<sup>[34]</sup>。这一事实暗含着一个重要而隐蔽的趋势：可穿戴设备的终端或界面的具体物质形态正变得日益次要，像框架眼镜那样特定的物理形态与结构不再是必要的。上述三个关键技术元素已重塑了可穿戴技术个体，使其脱离了传统技术物的存在模式，呈现在人类面前的物质形态只是关系的物质化表现，“数码物的具体化带来了由已形成的关系构成的技术系统，在此之中任何事物都有与其他事物连接的可能”<sup>[35]</sup>。尽管我们仍将不同的可穿戴设备称作智能手表、头戴式显示器、智慧型戒指，将它们视作具有差异化的个体，但是它们本质上都一样，都成为了自己在其中运作的巨型结构的外延。

综上所述，在通用与普及这一时期，身体与技术间的主客体二元关系正逐渐被瓦解，曾经人类身体与媒介物所构成的一对一控制回路，正在让位于分布式、无中心的技术耦合。在技术组合的层面，人类个体与由计算与通信、传感与人工智能等技术元素组织并重塑而成的可穿戴技术个体协同运作，在运作关系中发生持续的个体化，由此生成并维持动态的“亚稳态”。正是在



共同嵌入“巨机器”的“跨个体”（transindividuelle）关系中，被转化成数据流的身体，又重新聚合在一起，形成了在技术组合和群体参照交织中的“身体”形态。值得追问的是，当我们不再从身体出发思考技术，而是从巨型结构、“跨个体”关系的视角反观身体时，身体究竟是如何被重新组织与界定的？又应当如何理解这一新的身体形态所蕴含的理论意涵呢？

### 三、分布式身体：作为“湿件”的人类

这段媒介史的真正断点在于，身体不再只是个体性的生物单元，而被重新分配进分布式的技术网络中。在早期的可穿戴技术装置中，身体与技术之间往往构成一种相对封闭的、单一的控制回路，要么是身体与技术物之间的简单链条；要么仅限于身体—技术物—局部环境三者之间的反馈。这种“一对一”的反馈关系曾是“人—媒介”联结的基本形式，然而，随着计算过程的空间化，身体被纳入到新的缔合环境之中，“分布式”便是其典型特征。传感器、算法与网络节点在不同的层面上捕捉并再分配有关身体的信息，使得身体不再居于中心，中心的位置由一张持续生成的拓扑网络所替换，能量、信号与意义在其间流动与转换。当然，身体始终是可穿戴技术运作缔合环境的组成部分，只不过它不再是唯一的，身体与技术在个体化的过程中不断生成着新的边界。

因此，“分布式身体”并不具备本质主义的定义，而是一个只能从其生成与运作机制中加以理解的身体观——它在由多种个体构成的“跨个体”关系中生成，这一关系既体现为人类个体之间的关联，也体现为人类个体与技术个体及技术组合之间的关联。其中，可穿戴技术物所生成的庞大缔合环境支持着跨个体化的动态关系，关系的构成“存在着因果与相互调节的关系”<sup>[36]</sup>。比如，对于使用可穿戴设备的个体来说，“我的身体”不再等同于孤立的生物身体，而是一个始终与“我过去的身体”“我未来的身体”“他人的身体”“群体平均标准的身体”相关联的身体，在技术系统、算法模型与群体

参照的作用下，“我的身体”只能在跨个体的关系中显现。

此外，在很大程度上，身体成为了“分布式身体”意味着身体成为了数字基础设施的延伸，与软件、硬件并行，我们可以借用“湿件”（wetware）概念来说明这其中的动态关系。“湿件”为计算机科学术语，指计算机系统中与生物体相关的部分。这个概念本身便是一个颇为矛盾的表达，一方面它是以“ware”这一词根（可供使用的物品）为基础创造的词，将人等同于计算系统的组件；另一方面它又强调那些无法与人类剥离的特征，将其视为重要且特殊的，比如，它的常见定义有“活细胞内所有信息丰富的分子过程的总和”<sup>[37]</sup>，或是“存储于人脑之中，无法与拥有它的人分离的知识（能力、信念等）”<sup>[38]</sup>。但是，在“湿件”的内在悖论中——人类的可能性与机器的可能性之间——具有一种打破原有平衡的倾向性，人类的可能性日益与机器的可能性相勾连。

事实上，用“湿件”这一概念来肯定人类在计算系统中的位置并不新鲜。然而，人们往往忽视了一个关键点，“湿件”并非一个固有的标签，而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只有当它跟计算有关时，它才建构了人的因素”<sup>[39]</sup>。当然，湿件并不预设人类本质上即为机器的部件，而是指出在特定技术条件下，人与硬件和软件的共鸣如何生成新的反馈机制与行动结构。因此，所谓“作为湿件的人类”要揭示的正是这种被条件化的存在状态，以及身体是如何被重新组织的。可以说，“湿件”概念所揭露的便是“分布式身体”正在生成的有力证明。

在这个意义上，身体的功能、感知与行动被拆分，分布于空间性网络的不同层级，身体成为了“分布式身体”，是不同节点与信息流聚合的界面。脑机接口实验正是这种再组织的典型场景，脑科学、神经科学同计算机一起将人类自身对象化。当大脑神经元的模拟信号被转译为可处理的数字信号后，个体的感知、意图与动作的循环不再仅由生理回路维持，而是分布到一个包含传感器、模型与执行器的系统



中。以智能手环为代表的可穿戴媒介更能说明“分布式身体”如何在日常的移动性中实现空间化。心率、步数、睡眠、GPS等多模态数据被采集后在本地经过初步处理,随后被上传至云端与更大的数据集进行聚合、模型训练与分析,最终以个性化预测与反馈的方式传回。移动的个体成为一个存在于物理空间中的流动“数据节点”,他们的生理状态与行为轨迹在城市、平台与系统之间不断分散又聚合。

机器的可能性重塑了身体的边界,但是,这并不是“人机共生”的完美案例,看似“合作性”的物种共生实则并不平衡。就脑机芯片最基本的工作原理来说,识别人类行为、神经元活动及其相关性高度依赖于统计学方法。不得不承认,针对脑电信号的解读只是一种依赖于特征提取和机器学习的概率模型,“即使最大的数据库也无法避免在一个无限复杂的世界被简化和分类时出现的基本滑移”<sup>[40]</sup>。同时,湿件的概念从计算机的角度来反思人类,人类相应地也逐渐内化这种反观的视角,大脑与神经科学的发展正是有力的证明。在过去的20年中,我们对大脑、身体的了解也许比之前人类历史所了解的总和还要多。人类对计算机非常熟悉,以至于常常透过计算机的工作方式,来解释人类身体的运作与功能,我们将大脑的机制类比为“网络拓扑结构”,以神经细胞为电路元件,将神经递质在突触间传递信号视作存储记忆的反馈电路,等等<sup>[41]</sup>。

更进一步地,“分布式身体”恰恰解构了“人机共生”的想象性叙事。正如基特勒的论断,“在媒介提供模型与隐喻之前,我们对我们的感官一无所知”<sup>[42]</sup>。从这一意义上说,“分布式身体”正是一种由媒介条件生成的身体隐喻,它以一种非对称的关系结构规定了身体被重新理解的方式,打破了“共生”神话中人类与机器“像两个不同的物种彼此合作性地紧密结合”<sup>[43]</sup>的错觉,人类与机器在共同被编织进技术之网的过程中都被改变了。在一定程度上说,人类确实需要以被机器限定的方式与它发生关系,借用列夫·马诺维奇(Lev Manovich)的比喻,

人类就像计算机鼠标被一条线连接到计算机上,用户的身体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操纵杆<sup>[44]</sup>。曾经名为“达摩克利斯之剑”的头显因质量沉重需要由管线吊在天花板上,使用者必须把头部固定在金属装置中,这与今天人类被接入基础设施系统的情形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但从目前来看,这并不意味着人类主体性就此消解、技术就此具有绝对的统摄力。基特勒的论断无疑是一个振聋发聩的提醒,然而如果将这一洞见推向极端,认为主体性丧失或是彻底反转,则又回到了“分布式身体”概念意图打破的传统主客二元的身體观,遮蔽了其中更复杂、动态的交互。“我们对我们的感官一无所知”所代表的激进媒介观,是基特勒处在20世纪末数字技术浪潮之中旨在打破传统人文主义窠臼的理论姿态;在今天,我们需要在他的基础上,发展更富韧性的理论来面对已然常态化的“人机纠缠”。西蒙东的“个体化”强调技术的生成是一种动态的、持续的、未完成的过程,可穿戴技术物同样是这样一种过程性的存在,而“分布式身体”正是在这一动态之中浮现。这种过程性不仅引导我们走向一种对身体与技术更为开阔的理解,而且指向了一种新的伦理与感知政治。

#### 四、余论

回到最初“可穿戴媒介与人类关系的根本变化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笔者重访了可穿戴技术的媒介史,给出的回答并非关于人类如何消失、技术如何宰制,而是跳出“二元”,关注媒介如何重新组织技术与技术、技术与身体的关系。基于“两个时期、一个断点”的媒介史梳理,本文提出“分布式身体”这一概念,作为理解关系变动的新视角。它揭示了可穿戴技术物逐渐基础设施化的缔合环境,以及身体在其中与技术个体所构成的跨个体关系。由此,身体与技术的关系不再以传统二元的方式界定,而是在不断的延展、拆分与重组中呈现出关系性的、未完成的生成过程。所以,“分布式身体”既不将可穿戴媒介简化为“人机共生”的一体

化隐喻，也拒绝从“人类中心”滑向“技术中心”的二元框架，转而提供一种更开放、动态的理解方式。

从媒介史的写作层面来看，“分布式身体”不仅是一个描述“可穿戴”经验与技术演化的概念，该概念的提炼过程也为媒介考古学提供了一种以身体作为线索的媒介史书写视角。就时间的维度而言，本研究关于“可穿戴”媒介史的书写摒弃了简单的、进步主义式的线性时间观，以身体与技术的关系作为“时光机”，在历史的多个时刻停驻，挖掘这些时刻之间的联系。正如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Siegfried Zielinski）所言，媒介的历史天然具有“多重时间性”，是无数线索交织堆叠的、根茎化的生成状态<sup>[45]</sup>。就空间的维度而言，本研究将分析重心从单一装置与局部缔合，推进到分布式、基础设施化的庞大缔合环境。在其中，关系取代了位置、生成取代了固定，媒介史的书写也因此呈现为一个开放的拓扑关系场域。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提出的“分布式身体”概念主要建立在可穿戴媒介这一特定技术谱系及其媒介史材料之上，理论解释力与边界在更广泛的媒介讨论中仍有待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检验与完善。未来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将该概念置于其他同样以身体为界面的媒介中加以探索，比如讨论可以延伸至脑机接口等神经媒介技术所涉及的身体乃至意识层面的问题，也可以将电子游戏等媒介中的人机交互问题纳入考察；另一方面，也有必要补充更多元的经验材料与方法组合。与此同时，伴随“分布式身体”而来的权力、治理与伦理问题也值得被更系统地纳入讨论。

（责任编辑：孙尚如）

## 参考文献

- [1][5][9] 马歇尔·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M]. 何道宽,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9: 作者第一版序, 150, 17.
- [2]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wearable” [EB/O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4) [2024-07-12]. [https://www.oed.com/dictionary/wearable\\_adj?d=true](https://www.oed.com/dictionary/wearable_adj?d=true).
- [3] Steve Mann. Chapter 23: Wearable Computing, in *The Encyclopedia of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2nd Edition* [M]. 2012: 1.
- [4] T. Starner. Human-powered wearable computing[J]. *IBM Systems Journal*, vol. 35, no. 3&4. 1996(1): 618-629.

- [6] Peter Sloterdijk. *Bubbles: Spheres. Vol. 1: Microspherology*[M]. New York: Semiotext(e). 2011: 28. 转引自 Christofer Laurell. Fashion spheres - from a systemic to a sphereological perspective of fashion[J]. *Journal of Fashion Marketing and Management*, 20(4), 2016: 520-530.
- [7] 约翰·杜海姆·彼得斯. 奇云: 媒介即存有[M]. 邓建国, 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0: 36-37.
- [8] 施畅. 视旧如新: 媒介考古学的兴起及其问题意识[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9, 26(7): 33-53+126-127.
- [10] Neil Handley, “The history of spectacles” [EB/OL]. British Optical Association Museum, (2024)[2024-07-18]. <https://www.college-optometrists.org/the-british-optical-association-museum/the-history-of-spectacles>.
- [11] 徐珂. 清稗类钞: 第四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1737.
- [12] Edward O. Thorp. The invention of the first wearable computer[J]. *Digest of Papers. Seco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Wearable Computers (Cat. No.98EX215)*, Pittsburgh, PA, USA, 1998: 4-8.
- [13] Ernst Kapp. *Elements of a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On the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Culture*[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8: 27-34.
- [14][16][17][22][23][36] 吉尔伯特·西蒙东. 论技术物的存在模式[M]. 许煜,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4: 32-35, 33, 41-42, 54-55, 139, 216-221.
- [15] Steve Mann. EyeTap Devices for Augmented, Deliberately Diminished, or Otherwise Altered Visual Perception of Rigid Planar Patches of Real-World Scenes[J]. *Presence*, vol. 11, no. 2, 2002: 158-175.
- [18] Uruthiralingam, U., Rea, P.M. *Augmented and Virtual Reality in Anatomical Education - A Systematic Review*, in Rea, P. (eds) *Biomedical Visualisation*[M]. Cham: Springer: 89-101.
- [19] 蓝江. 从自然物到思辨实在论——当代欧洲对象理论的演进[J]. *社会科学家*, 2018: 18-25.
- [20][42] Friedrich Kittler. *Optical Media*[M]. Cambridge, Oxford, Boston, New York: Polity, 2009: 34.
- [21] Jussi Parikka. *A Geology of Media*[M].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5: 7-11.
- [24][35] 许煜. 论数码物的存在[M]. 李婉楠,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29-30, 22.
- [25] 刘易斯·芒福德. 机器神话(下卷): 权力五边形[M]. 宋俊岭,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7: 263-295.
- [26][28][33][34] Benjamin H. Bratton. *The Stack: On Software and Sovereignty*[M].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2016: 89-93, 107-108, 186-191, 598.
- [27] Cosimo Accoto. *In Data Time and Tide: A Surprising Philosophical Guide to Our Programmable Future*[M]. Milan: Bocconi University Press, 2018: 96-97.
- [29] Max Bickley. “NVIDIA Omniverse expands worlds using Apple Vision Pro” [EB/OL]. NVIDIA Blog, (2024-03-18) [2025-01-15]. <https://blogs.nvidia.com/blog/omniverse-apple-vision-pro/>.





[30][31][40] 凯特·克劳福德. 技术之外 [M]. 丁宁, 方伟, 李红澄, 译.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4: 26-29, 86-91, 83-86.

[32] IDC Research. Revelations in the Global Data Sphere, 2024: Key Trends and Takeaways[R], 2024.

[37][41] Dennis Bray. *Wetware: A Computer in Every Living Cell*[M].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age x, 211.

[38] 克莱·舍基. 未来是湿的: 无组织的组织力量. 沈满琳, 胡泳,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4.

[39] 杰弗里·温斯洛普-扬. 硬件 / 软件 / 湿件. 媒介批评术语集 [M]. W.J.T. 米歇尔, 马克·B.N. 汉森, 主编. 肖腊梅, 胡晓华,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151.

[43] J. C. R. Licklider. Man-Computer Symbiosis[J]. *IRE Transactions on Human Factors in Electronics*, vol. HFE-1, 1960: 4-11.

[44] 列夫·马诺维奇. 新媒体的语言 [M]. 车琳, 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20: 108-110.

[45] 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 媒体考古学: 探索视听技术的深层时间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1-13.

## From “The Extensions of Man” to the “Distributed Body”: A Media-Archaeological Inquiry into Wearable Technologies

Ren Yiou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wearable technologies have been understood as “extensions of the body and the senses”, a framework that is no longer sufficient to capture the fundamental changes in contemporary human-technology relations. This study adopts a media archaeological approach to examine two major periods in the media history of wearable technologies. The first period centers on the “extension of the body”, spanning the transition from prehistory to the initial emergence of wearable devices, during which the germination of technology autonomy begins to challenge the traditional subject-object dichotomy. The second period centers on the generaliz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wearable technologies, in which the associated milieu undergoes infrastructuralization. The critical breakpoint in this media history occurs when wearable technologies become ubiquitously connected to the Internet, and act as interfaces that lead to a concealed yet vast macrostructure. Building on this, this study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the “distributed body” a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ody and technology to further explore the modes of existence of “human as wetware”, and deconstructs the myth of “human-machine symbiosis”. This concept reveals how contemporary wearable media reshape the boundaries of the body, presenting it as a non-dual, open, and relationally generative process.

**Keywords:** wearable; body; associated milieu; wetware; media archaeology

**Author:** Ren Yiou,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公益广告



四川省生态环境  
宣传教育中心

新闻界

宣

欢迎  
订  
阅

# 新闻界

- 中文核心期刊
- CSSCI 来源期刊
- 中国人文社科综合评价(AMI)核心期刊
- 四川省品牌期刊

思想影响传播  
媒介推动文明

## 征订方式:

1. 通过当地邮局订阅, 邮发代号: 62-334。

2. 通过《新闻界》发行部订阅(一年起订):

《新闻界》为月刊, 每期 20 元, 订阅费: 336 元/年(含杂志费 240 元/年, 邮费 96 元/年)。

开户名称: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银行账号: 51001890836051508414

开户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城支行

【注】: 转账时请务必注明“《新闻界》订阅 × 年 × 月——× 年 × 月”字样, 转账后请尽快将您的汇款凭证、收刊人的姓名、电话、地址、邮编等详细信息发送至《新闻界》微信公众号后台, 以便您及时收到期刊。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微信号: ixinwenjie

主管主办单位: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发行部电话: (028) 86969774 (028) 86968876